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17 年第 11 期 (总第 161 期)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毛昭晰

主 任 叶 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晓军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徐晓军

副 主 编 刘晓清(常务) 邓咏秋 潘杏梅 赵继海

陈益君 池晓波

编 辑 部

主 任 朱小燕

编 辑 李 芳 郑秀花 王晓琳

编 务 茅珍艳

英文编译 孙正芳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投稿邮箱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11-10

■ 专题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			
文化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刘 鑫 洪伟达 姚 赛	5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发展模式研究*		王 政	10
完善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洪伟达 王 政	15	
区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探索			
——以重庆市北碚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为例		谭 玮	20
■ 探索与创新 -----			
认知盈余时代的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研究		井春兰	23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的逻辑意义和策略研究	王娟娟 李 力	27	
地方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探索*	周 频 吕元康	32	
“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新型电子阅览室建设探析		梅国栋	37
■ 知识管理与服务 -----			
国际图书情报学发展态势研究(2013—2017)*			
——基于19种高影响力外文期刊的计量研究	朱红艳 都平平 邓志文	40	
基于H指数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教育现状分析	徐 芳 何雯卓	45	
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研究热点分析	成锡潮 吴景海	51	
■ 阅读文化 -----			
顶层设计文献视角下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框架探析		李子峰	56
基于WCI的高校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研究*			
——以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为例		张 婷	62

县级图书馆绘本亲子阅读推广的实践与思考

——以云和图书馆“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为例

陈丽红 67

■ 工作研究 -----

“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应用与思考

——以厦门市图书馆为例

汤青 71

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与服务研究

——以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为例

韩小亚 75

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华东杰 79

■ 文献学研究 -----

论《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

——兼论《四库全书》的修书用意

顾一凡 82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的学术价值及其缺陷

廖章荣 87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调查与思考*

袁硕 92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8年征订启事

70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MAIN CONTENTS

No.11 2017 (SerialNo.161) Monthly

- Research on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ights
Liu Xin Hong Weida Yao Sai 5
-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Wang Zheng 10
-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of Consummat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Hong Weida Wang Zheng 15
-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y and District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ak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Beibei District of Chongqing Province for
Example
Tan Wei 20
-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Cognitive Surplus Era
Jing Chunlan 23
- A Study on Logic Significances and Strategies of Public Library Makerspaces Wang Juanjuan Li Li 27
- Researching on the Embedded Disciplinary Service Mode of University Library
Zhou Pin Lü Yuankang 32
- An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New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in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Mei Guodong 37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Recent Five
Years—A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19 Foreign Journals with High Impact
Zhu Hongyan Du Pingping Deng Zhiwen 40
-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aster Education in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Based on H index
Xu Fang He Wenzhuo 45
- Analysis of Internet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and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a
Cheng Xichao Wu Jinghai 51
- An Exploration of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ystem Framework in Literatures on Top-level Design
Li Zifeng 56
- Research on WeChat Reading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WCI: A Case Study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Libraries in Guangdong
Zhang Ting 62
- Practices of and Thinking on Parent-child Reading Promotion of Picture Books in County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Yunhe Library
Chen Lihong 67
- The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Internet+ Library" Service Mode—Take Xiamen Library For
Example
Tang Qing 71
-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Local University Library—Take
the "Qin and H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ic Research Database"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Han Xiaoya 75
- On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Public Reading Service System in Cixi and Measures
Hua Dongjie 79
-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Responding
to Opinions of Imperial Edicts: On the Intents of Compiling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Gu Yifan 82
-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adequacies of Fu Yili'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Hua Yan Nian Shi
Liao Zhangrong 87
-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llections of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Yuan Shuo 92

· 专题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加大,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科学发展、全面提升的新时期新阶段,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建设阶段已经完成,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保障机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发展瓶颈,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配置、供给和质量评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区域均等。在此背景下,本刊特组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专题,就以上部分问题展开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文化权利视角下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刘鑫¹ 洪伟达^{2,3} 姚赛⁴

(1.苏州图书馆 江苏苏州 215002)

(2.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3.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4.苏州金阊实验中学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文章从文化权利的内涵和法理依据两方面,阐述文化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方面既拥有优势也存在不足。文章针对现存不足,提出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几点建议,即统筹建设、整合资源、完善人才保障体系和建立全民参与机制。

关键词:文化权利;公共文化;公共数字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59.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ights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ounds that the cultural rights is one of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legal basis of the cultural rights.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efects i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ights of citizen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that is, make overall construction, integrate resources, improve the talents assurance system and establish a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cultural rights; public cultur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保障公民阅读权利的图书馆制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CTQ002)和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5TQC01)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逐渐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重视。2011年12月,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近6年来,国家围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或文件,成为贯穿“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看,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是在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制度的框架下,逐步探索、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服务模式、基础设施、资源建设、人员配备、服务规范等制度保障机制,有利于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1 文化权利的内涵及法理依据

1.1 文化权利的内容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二条对个人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作了规定,指出:“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同时,第二十七条规定:“(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4]第21届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确立了文化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指出:“(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2]通过以上宣言和公约对文化权利内容的诠释,其从广义上看是指与文化相关的一切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创作和分享文化成果、保护文化成果的知识产权

以及自由、平等地获取、保存与传播文化信息和文化国际交流的权利。

1.2 文化权利是基本公民权利的法理依据

1948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最早谈及文化权利,根据这份宣言,1966年12月先后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上宣言和公约构成世界人权的基本体系,被称为“世界人权宪章”^[3]。其对文化权利均有不同程度的强调,将文化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并列提出和使用,使得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在国际社会中被广泛认可的一项公民基本权益。

我国《宪法》第二条赋予人民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力;第二十二条指出,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三十三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4]。200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初步提出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指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等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5]。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明确提出:“按照一定标准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实现社会公平。”^[6]综上分析,我国不仅通过《宪法》明确规定发展文化事业需要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文件等也明确文化权利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国家应充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以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优势与不足

2.1 优势

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要由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构成。就目前来看,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已有一定规模,初步实现了面向基层的数字文化服务保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在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覆盖面广、容量大,扩大了公民获取数字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文化共享工程从2002年开始探索实践,经过10余年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的6级服务网络设施,包括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333个地市级支中心、2 843个市县支中心、32 179个乡镇基层服务点,与中组部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联建70万个村(社区)基层服务点;截至2015年底,在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点基础上新建公共电子阅览室61 758个,其中乡镇32 719个,街道3 668个,社区25 371个;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7]。结合地区差异和民族特色,共享工程还专门为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推送数字资源,其中为西藏推送包括5 000余种电子书、200种电子期刊、2 500分钟藏语视频、百余场讲座和展览及各类专业数据库在内的总量超过140TB的数字资源;为新疆推送1.3万余幅图片,2 700余种视频,15个专业数据库,包括蒙、维、哈、藏等13种少数民族语言期刊在内的总量近130TB的数字资源^[8]。全国各地海量的数字文化资源通过虚拟网络送到全国各地的用户身边,解决了距离等自然环境带来的困扰;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借助强大的数字资源,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从根本上实现公共文化的共建共享。

2.1.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队伍专业性强,加强了公民使用数字文化的时效性和便捷性

根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总体规划,基础设施的保障经费到位后,各地将按照数字文化建设的配置要求购买相应设备,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硬件实力明显提高。在硬件条件改善的同时,国家数字图书馆研发出一批技术先进、应用便捷的软件系统,通过有效的共享机制,共享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以实现各级公共数字资源的优势互补,从而提升全行业的数字资源建设和服务水平。国家图书馆为了更好地建设公共数字文化,提出基础设

施与技术人才并重的服务理念,在全国推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专题培训,强化全国技术人才保障措施,力争建设一支专业化、素质化、高效化的技术人才队伍,为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希望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自由、平等地通过数字化设备获取所需要的数字资源,这也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愿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一直以人为本,开展各具特色的、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等新媒体、新技术的创新模式,建设覆盖全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基于新媒体、新技术和创新服务的公共数字文化新模式,为阅读困难群体提供更宽广的阅读空间,以保障特殊群体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和知识,最终实现每个家庭和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字文化资源,随时随地享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带来的文化供给。

2.2 不足

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类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程全面推进,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仍存在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资源配置不合理,缺乏相应标准

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建设参差不齐。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方面投入不足,如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资源建设方面就存在很大差距,导致公民在享有公共数字文化权利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整体规划中,相对缺乏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和专项经费,所以难以实施对数字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形成数字资源优势互补;加上缺乏相应的数字化资源配置标准,导致不合理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结构难以通过整合形成再生、反复利用的资源循环体系,致使公民在使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时,缺乏动态化的数字文化资源。

2.2.2 数字化服务平台相对独立,数字资源重复建设

各地区的联合采购、统一采购以及统一服务的共建共享机制不够健全。从目前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现状来看,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建设相对独立,比如图书馆与其他公益性机构分别自立门户,独自建立适合本系统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彼此不能兼容,容易造成数

字资源重复建设;为了加大宣传本系统数字资源的多样性、大容量等特点,盲目建设数字资源,重复投资或购买低水平的商品化数字资源,忽视公民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和个性化的使用方式,这与“以人为本,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相违背。

2.2.3 服务主体单一,服务效能有待提升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机构主要体现在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等公益性单位,但彼此的关联性并不高,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等主要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之间缺少必要的资源整合和服务共享的联动机制;缺乏科学性的、全面性的大众信息需求调研分析。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总体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由于宣传和推广力度不够以及一部分数字文化服务供需不对接,导致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未能迅速形成对公众的吸引力^[9],造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率不高,服务效能有待提升。

2.2.4 建设机制不完善,建设模式创新性不足

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完善,缺乏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未能形成有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和第三方机构与用户相结合的评估机制;社会力量参与较少,未能形成跨行业、跨机构的高效合作机制,对融合商业模式存在不利因素;仍存在重建设轻效益的现象,建设模式创新性不足,未能与其他文化服务体系形成有机融合以及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

3 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建议

基于以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使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权利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提出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几点建议。

3.1 基于“互联网+”,统筹建设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互联网+”是创新2.0下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互联网+图书馆”就是通过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让互联网与传统图书馆结合起来,将互联网平台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行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发展生态。

首先,创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各级文化信

息共享工程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运用现代通信技术和传播技术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向基层人民群众广泛输送与传播,逐渐缩小城乡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数字差异,有利于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普遍均等。

其次,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数据库资源,创新数字图书馆的推广机制。公共图书馆依据地方特色,建设分级、分布式的地方性数字资源库群,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构建覆盖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络,实现数字资源无障碍共建共享,建设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平台,从整体上提升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提升文化软实力^[10]。基于“互联网+”统筹建设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是惠及全民的重大文化惠民举措。

3.2 整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资源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由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参与建设,全面整合各种优秀文化数字资源,并通过多个平台互相对接向社会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数字文化服务。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馆长约翰·帕尔弗雷指出,“各家图书馆应该将它们的网络跟档案馆、历史协会、博物馆和其他文化遗产组织等部门相互分享”^[11]。因此,现阶段要求单一系统、单个机构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方面可以实现多系统与多机构之间的融合与协作,尤其是基于云计算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技术支撑平台。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需求分析,结合云计算技术与服务模型,搭建多网合作、开放互动、共建共享的技术支撑环境,以切实保障信息技术环境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保障阅读困难群体方面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

3.3 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技术人才体系

人才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保障,建立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人才的培育和使用机制,形成开放性、层级性的公共数字文化技术人才体系,是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条可行性路径。构筑多层次的公共文化人才体系要有法规和政策的支持,推进人才工作立法、深入研究文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12]。依据相关政策,对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因材施教,构筑适合我国公共文化的多层次数字化人才体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不同阶层的公

共数字文化需求。因此,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技术人才体系是适应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形势与新任务的必然要求。

3.4 建立行之有效的全民参与机制

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视角看,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是政府的职责之一。以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是满足公民差异化的文化需求的选择之一。未来政府职责应从“公益性”和“办文化”向“公共性”和“管文化”转变,在现有的公共文化保障制度的框架下,引导和吸收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数字文化设施运营等多渠道,共建共享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创新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主体构成,不断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式和产品的多样化,增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从根本上保障基层人员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4 结语

建设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基本途径之一。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又包含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所以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对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世界人权宣言》全文[EB/OL].[2017-05-15].<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 [2]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EB/OL].[2017-05-16].<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esc.htm>.
- [3]吴理财,王前.文化权利导向下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范围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9):126-131.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EB/OL].[2017-05-21].<http://news.newsxc.com/folder696/2014-12-04/200429.html>.
- [5]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2017-05-21].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018/15/7915431_157164324.shtml.
- [6]《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文[EB/OL].[2017-05-21].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1/15/c_133920319.htm.
- [7]李宏.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与服务[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1):5-11.
- [8]打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EB/OL].[2017-05-25].http://www.bh.gov.cn/html/whcy/SZYS22825/2013-08-02/Detail_546843.htm.
- [9]楼剑锋.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不足及对策探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4):112-114.
- [10]张大尧,高文华.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J].图书馆建设,2012(4):62-65,70.
- [11]罗萨塔.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向何处去?[N].韦盖利,编译.青年参考,2015-05-20(B08).
- [12]何义珠.政府职能视角下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浙江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4(7):45-48.

作者简介:刘鑫(1982—),女,硕士,苏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洪伟达(1982—),男,黑龙江大学文献信息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姚赛(1985—),男,硕士,苏州金阊实验学校一级教师。

收稿日期:2017-08-16

· 专题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发展模式研究*

王 政

(黑龙江省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90)

摘要:从文化内涵阐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要义,有助于明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主体、治理方式与服务目标。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建设阶段已经完成,将面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发展瓶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有利于明确各级服务网络的建设主体、实施主体与责任主体,并经过黑龙江省相关实践的检验,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模式;“3—1—1”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59.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from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helps to clarify the main body of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mode and service object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Currently,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completed, and we will face the obstruct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3-1-1” long-term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is beneficial to clear and definite the main body of construction, implementing and responsibility. It has been fulfille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refore it has certain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long-term development mode; “3-1-1” mode

1 引言

近年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中,不断强调要建设覆盖全社会、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更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到法律范畴。然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公共数字文化可以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创新延

伸与重要支撑。尤其是自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大基础性数字文化工程以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第一阶段——硬件设施建设已近实现全覆盖。按照《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科学发展、全面提升的新时期新阶段,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那么,如何实现

* 本文系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转型期省级图书馆在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职能拓展”;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5TQC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人性化、均等化、标准化,如何推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如何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覆盖率与利用率,如何监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等,均亟待学界深入探究。

2 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要阐明的的问题

2.1 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要义

当下相关学术研究已经将“公共数字文化”作为一个学术词汇理解,并且大多将其理解为数字资源库、网络技术行为、数字信息服务,致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受到了局限,走入了一味强调资源数字化,追求购置各种新设备,“大数据”、“云平台”等名号喊得时髦的误区,各地的公共文化服务无外乎是建几个电子阅览室、电脑里拷贝些数字资源、开通几个网络平台,表面轰轰烈烈,实际却无人问津,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然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点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文化”。当我们从“文化”的本意出发并注重社会文化发展时,就会发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本质内容仍为公共文化。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可见,文化自出现便有“以文教化”之意,是中国古人的文化观,既可以解释为学习广泛的知识并灵活运用,又指以良好的文明“点化”人类内心的精神和修养。由此可知,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的创新形式与未来发展,尤其应尊重“文化”的本意。“数字”只是知识、信息传递的方式与途径的变化,其内涵仍是有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与信息,其宗旨仍是提升人类的内在精神和修养。那么,把文化服务放在整个社会事业的范畴中,宏观的文化视角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涵。其中,“公共”表明了覆盖全社会、普遍均等的服务宗旨,“数字”是指数字资源提供方式、网络技术应用手段,“文化”才是实现和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服务”即为知识信息行为(包括生产、组织、传播、保存、共享等)的立场和姿态。

2.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应然状态

基于上述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理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应然状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目标、

原则、内容、途径、建设主体与服务对象逐渐清晰: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目标是实现和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公众的精神生活,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的公益性原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以数字资源为主,辅以其他以数字形式利用的文献资源;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应用是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途径,且技术应用应尽力符合人类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公共治理为目标,其建设与实施主体应为各级政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

2.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要素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及创新发展,其构成要素包括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体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组织支撑体系,公共数字文化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体系,公共数字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监测评估体系等。

同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还要从现实的国情和省情出发,不与现行国家和地方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相冲突。尤其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大框架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要以各级政府为建设主体,依托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服务触角,切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均等、惠及全民。

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瓶颈

3.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的资源瓶颈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基础既包括具有文化内涵的数字资源,还包括充足的资金保障与配套设施。2002年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启动与全面铺开,可以说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开端。尤其是近年来,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的逐步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硬件网络架构已近实现全覆盖。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遭遇的资源瓶颈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数字资源供给与基层公众需求不符,整合

与共享程度欠缺。目前,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提供主要以各类数字资源库的形式呈现,虽然涵盖了科技农业知识、科学种植养殖技术等知识信息,但是缺乏贴近百姓生活、符合基层群众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各类数字资源库内容大量重复、版权问题有待商榷,面向公众开放获取的数字资源时效性差、实用性不高。这就造成了花费高昂成本购买的大批数字资源库闲置浪费,基层群众缺少精神引领与文化休闲娱乐。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仍要重视“文化”的服务内涵与内容,既要满足人们对知识信息的渴求,又要提升人们内在的精神与素养。只有提供丰富的文化信息,尊重知识自由与信息平等,才能充分实现和保障公众的文化权益。

第二,资金保障不足,落不到实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末,仅文化共享工程一项对普适数字资源建设的投入达3.2亿元,对地方特色资源建设的投入达9亿元^[2]。我们从各级财政投入上可以看出国家重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决心与努力,然而经费的追加与下发大多落在省级分中心或市级分中心,而后变成了向基层服务点、服务站的设备或资源下发。这样做的优点在于,省级分中心或市级分中心统筹本区域各基层单位的协调发展;缺点在于,设备和资源下发成了“分福利、搞关系”,造成数字文化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拉大了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尤其是资金的上层垄断造成基层单位的工作动力不足,导致村镇等基层服务站点徒有海量数字资源和高新技术设备,却没有开展数字资源推广利用的服务经费。

第三,空间资源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从全国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到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再到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空间仍停留在“一房、一屋、一室”之内,仅是更换了网络、设备,安装了新的软件平台。然而,这恰恰是在空间上人为地限制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广与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优势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使公共文化服务贴近基层群众生活,随手可得。如何节省空间资源的使用,同时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便利性、易得性,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需要切实思考的问题。

3.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的服务瓶颈

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中,资源是内容,技术

是基础,服务才是根本。然而,当下网络及硬件设施平台已近搭建完成、新媒体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形势下,数字文化服务意识与能力的落后日渐明显,成为制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软肋。

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能力取决于信息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与水平,其信息服务意识与信息素养能力将直接影响用户的满意度和黏黏度,间接表现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虽然目前各大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已经搭建完成,并实现了实时跨界解答咨询,但是时空间隔仍为基层用户带来距离感。一方面,信息服务人员是否“接地气儿”,即对于本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有足够的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信息服务人员能否真正把握住基层用户所表达的模糊的信息需求。实际上,基层用户对于“面对面”的服务模式仍具有较强依赖性和信任感。这就要求即使是基层数字文化服务点,也要配备具有一定信息技能和素养的服务人员,提供随时、随地、随身的数字信息服务。

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缺乏宣传推广意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长效提供有赖于对数字资源和服务的广泛推广、宣传。目前全国范围内典型的数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有“网络书香”“国图公开课”等品牌,但是基层群众对数字资源内容还是知之甚少,对基层服务点的了解与认可程度不高。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与服务的普遍宣传与提高利用绝不是发宣传单、放电影、做培训就能够解决的,它有赖于科学、规范、专业的推广活动,新媒体技术的推送应用,广泛的社会合作与参与,以及数字文创的开发与普及。重视并做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推广即是突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的有力武器。

第三,面向公众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用辅导。基层公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决定了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接受程度和利用程度。如果只是一味地提供数字资源和信息服务,而缺乏相应的引导与辅助,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远没有一款网络游戏普及的迅速和受到追捧。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实现“网络进户、资源上门”的大前提下,对于基层用户的数字文化应用辅导变得尤为重要,这是使海量数字资源、新媒体技术得以接受并充分利用的有效途径。然而,数字文化服务应用辅导方式亟需打破传统的集中

培训或网络课堂的授课模式,针对网络时代信息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便捷、移动的自助式数字服务指引将更受欢迎,尤其是结合数字文创奖励等用户激励机制,打破公众面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无从下手的僵局。

3.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的技术瓶颈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的创新应用与发展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搭建成为可能,但是各类数字技术的快速更新与公众对于新技术的接受使用,同时成为制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软件硬件基础建设不配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资源获取与服务提供依靠于极速、畅通、全覆盖的网络体系和电子计算机、移动终端等配套硬件设备。虽然目前在经济贫困落后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已经实现了硬件设备的下发与安装,但是这些地区网络设施建设的落后与缓慢,严重制约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提供与利用。特别是那些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视频文化资源,要求配有一定的网络带宽;便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机,要求无线网络的连接与畅通;网络云平台共享的数字资源提供,要求硬件网络的覆盖与应用软件的实时更新。可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技术瓶颈一直存在,并要求我们及时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

第二,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缺少标准化规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建设原则之一就是解决标准化问题,因为从宏观意义上讲,标准化有助于打破体制障碍与地区差异,从微观意义上讲,标准化有助于推进局部设施的完善与监测。大数据、云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创新应用,突破了传统技术标准的限制与要求。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需要不断推进标准化进程,并按照标准进行规范化的实践操作与监测评估。

4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3—1—1”发展模式

基于上述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瓶颈的分析,综合考量国情、省情及地区差异性,以实现和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坚持公益性、普遍性、均等性为原则,本文提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模式,以实现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甚至高效地发挥作用。

4.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框架

按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公共治理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长效发展需要国家级、省级、地市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与支持。由此,本文提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3—1—1”长效发展模式:其中“3”是指在国家层面,以文化部组织实施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文化惠民工程为基础;两个“1”分别是指在省级层面以各省级公共图书馆为推进主体,统筹全省各乡镇村级基层服务点协调发展,在地市级层面以各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为主要力量,延伸社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触角(见图1)。由此,可以明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责任主体(即建设主体与实施主体)、资金来源和实现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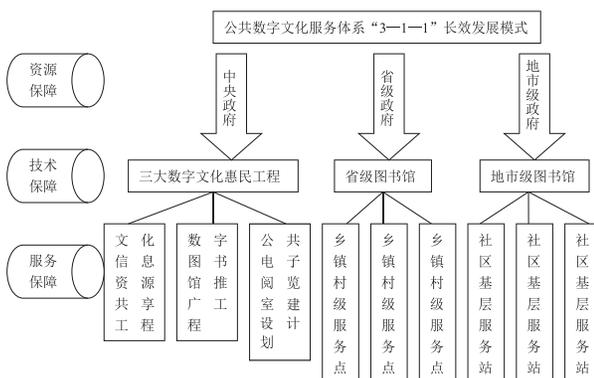


图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框架图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具备以下优势:第一,强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纳入公共治理范畴,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后,更有利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各项保障机制落到实处;第二,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解决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资源发展瓶颈,同时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图书馆的触角作用、能动作用,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普遍、均等成为可能;第三,明确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中各级文化部门的职责范畴,避免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重复建设和建设盲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优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有序流动。

4.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应用

黑龙江省近年来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资源整合、服务机制建设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黑龙江省作为幅员辽阔、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3—1—1”长效发展模式应用可作为一个实证,供业界深入研究探讨。

自2002年起,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7号)中关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送丰富的文化信息,进一步巩固基层文化阵地,充实基层文化建设内容,活跃城乡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信息资源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精神指示,文化部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起点,开始组织实施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文化惠民工程。三大文化惠民工程的建设既发展了基层图书室、阅览室的建设,同时推进了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尤其是文化共享工程自启动以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连续6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先后被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政策文件,完成了文化基础设施的搭建,可以说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第一阶段建设内容^[3]。然而,硬件平台的搭建完成后还需要更优质的数字文化资源的填充,以及更为便捷高效的数字文化服务支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则恰恰顺应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数字时代发展的浪潮,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切实保障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不可置否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推进中发挥了牵头作用,但在将公共数字文化向基层推进的过程中,黑龙江省内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努力与贡献同样不可小觑。黑龙江省

地处中国高寒边疆,幅员辽阔,村落之间相隔较远,人口居住分散,资源流动困难。基于如此恶劣的建设背景,结合省内地市级城市发展的落后现实,黑龙江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采用“3—1—1”长效发展模式,由黑龙江省图书馆承担县、乡镇、村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及边疆边防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任,省内所有的地级中等城市政府作为单级独立的建设主体,负责为所辖城区居民提供全覆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如此一来,既充分发挥了三大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政策优势与资源优势,又突出地体现了地方政府是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建设主体的基本原则,调动了省级图书馆的工作协调性与主动性,减轻了地市级图书馆的人员与资金压力。尤其是2012年起黑龙江省图书馆争取到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云计算数据分中心”项目,解决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传输的网络能力与数字文化服务推广能力,初步构建了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省域云平台·专网共享”公共数字文化传播服务体系。同时,为使全省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共享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不断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和脱贫致富技能,黑龙江省特别于2016年4月23日推出了“黑龙江省数字文化惠农服务年”活动。以世界读书日为起点,统一整合、发布农村实用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包含农业、林业养殖技术专题片、农村留守儿童动漫资源和老年人康乐专题片、农民工技能培训课程等各类资源),并通过VPN专网服务全省基层图书馆和乡镇、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全面提升了全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另外,2014年黑龙江省开始启动的“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项目利用国家专项资金1500万元,建设了118个县、乡镇基层服务点、400个数字文化驿站,结合新型SSLVPN专网建设,让移动数字服务、远程数字服务普及到全省边疆县、乡、村和边境农场、林场、重点旅游景区、边防部队、边防派出所、边境海关口岸、边贸集市、机场车站、社区政务大厅等公众场所,全面推进“互联网+”服务,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免费提供海量数字文献信息服务、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信息服务,落实国家扶贫攻坚战略,促进边疆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

4.3 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的进一步说明

(下转第50页)

· 专题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

完善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洪伟达^{1,2} 王政³

(1.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2.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3.黑龙江省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90)

摘要: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对于缩小数字鸿沟、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公众基本公共文化权利的实现,促进图书馆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在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存在配套法律政策不完善、建设和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源的质量良莠不齐、从业人员与公众信息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从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机制、完善支持机制、建立人才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完善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数字文化;数字资源

中图分类号: G249.2; G259.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of Consummat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s Consummat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would be significant for closing digital divide, safeguarding society justice, guaranteeing public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such as the imperfect laws and policies, the insufficient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good and bad resources are intermingled, and the literacy of librarians and citizen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so 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we should promote the mechanism, perfect support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talent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public digital culture; digital resources

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公共文化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以及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项目的建成和运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随着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质量、便捷程度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在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形式、载体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是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公共

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文化产品相结合的产物,是互联网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向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延伸和拓展,其以满足社会和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为目标,以政府公共财政为支撑,以数字化资源为依托,以网络化传播为载体,向全体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利用信息和数字技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广度和深度的重要途径^[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有效降低地域、时间、经济等因素对公共文化获取的负外部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 本文系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5TQC01)的研究成果之一。

目前,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是重要标志之一;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了全面部署;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2017年,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为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助推力。因此,进一步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1 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意义

1.1 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维护社会公正

在互联网和数字时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是否完善对保障公众的公共文化获取权益和教育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更深层次地讲,对维护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信息社会,公共(数字)信息与利益分配、金融资本、知识产权、高新技术紧密结合,容易导致公共信息的“权力化”,即掌握较多公共(数字)信息的人群更易成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相反,公共(数字)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设备、技能的匮乏剥夺了一些人参与社会活动、获取公共(数字)信息和服务的权利,而且使其失去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谋取利益的机会^[2]。因此,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有利于降低公共数字信息获取“门槛”,减小公共数字信息垄断带来的负面影响,保障公共数字文化的平等获取,缩小数字鸿沟,维护社会信息公平,改善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2 有利于保障公众基本公共文化权利的实现

文化权利是政府为满足和保障社会全体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基本公共文化权利保障的不充分或缺失,将对公众信息资源获取的数量、质量、渠道以及利用能力等带来负面影响,如降低社会竞争能力、减少公共话语权、降低社会活动参与程度、民主权利与文化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甚

至加剧经济上的窘迫与社会竞争中的劣势^[3]。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公众平等获得信息服务、增长知识、参与社会活动、实现公共文化权利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可以有效降低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经济性、地域性和社会性排斥,实现公共文化权利的均等化、标准化和便利化。因此,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能够满足城乡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保障公众基本公共文化权利的实现,减少信息环境对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

1.3 有利于促进图书馆转型与发展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提供机构,具有一般文化属性。同时,图书馆作为重要公众文化教育机构,也承担了为公众提供平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终身教育的职能与使命。目前,我国图书馆服务形式仍主要以传统阵地服务为主,受经济、地域、气候、资源、空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服务内容、形式、质量、效果等差强人意,难以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现代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与日益普及为图书馆服务空间的扩展、服务形式的改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和发展模式。尤其是到馆和离馆、线上和线下服务的有机结合,拓展和加深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大量节约了公众获取、利用、传播信息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金钱成本,大幅度提高了信息的获取和利用的效率。因此,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有利于满足数字时代公众对图书馆的新要求,促进图书馆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2 现阶段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配套法律政策不完善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作为保障和支撑。完善的配套法律法规政策环境,有利于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起到了保障和支撑作用。但是,目前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财政支撑、责任主体、配套保障、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纠纷等方面仍存在法律缺位,配套法

律政策尚不完善,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和成效产生了一定阻碍,影响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化和长远发展。例如,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实施细则不完善、税收减免的程序和手续复杂,导致非政府部门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程度有限,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活力不足;由于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限制了部分数字资源的网络获取、开发、传播和利用;由于数字资源库、数字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标准,致使不同建设主体、不同类型的资源重复建设、难以整合和开发,未能充分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

2.2 建设和管理机制不健全

从宏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在管理机制、资金保障、规范和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体涉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等多个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但是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各系统、各主体、各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组织、合作、协调,无法有效协同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共同参与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尚不能实现不同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的相连互通、相互支撑。同时,由于存在管理、经费、人员协调、利益分配等问题,导致可供跨机构、跨部门共享与整合的数字资源数量较少,社会主体参与度较为不足。在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资源、平台、设施、设备等管理缺乏规范,会导致难以最大限度地整合、揭示和利用资源,实现跨系统、跨平台的应用和服务,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

2.3 资源的质量良莠不齐

数字资源开发与利用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久发展的基础,然而目前在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存在数字资源建设重量轻质、同质化的现象。建设主体仅仅是把已有的纸本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简单的数字化,还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挖掘工具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组织、挖掘和开发,导致精品资源缺少、数字资源缺乏群体针对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服务的内容、手段、方式进行创新,以此扩大信息技术和社会信息化发展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的影响。此外,缺乏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质量与效能的有效评估与评

价也是掣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一大问题。如不能建立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评估机制及有效的反馈机制,则无法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和用户满意度进行有效评估^[4]。

2.4 从业人员与公众信息素养有待提高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从业人员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开发者,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性和信息素养。这就要求从业人员一方面具有信息服务的专业能力,即掌握一定的信息组织、挖掘、开发等方面的技能;另一方面,为便于公众获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业人员需要具备较高的检索能力与沟通能力,能够有效获取、吸收、利用、传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容。信息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用户满意度和利用率。然而从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态势来看,从业人员的素养与公众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等:一方面,在实践中既具备信息技术、知识组织、信息资源管理等技能又具备服务意识的复合型信息服务人才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公众尤其是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对信息技能的掌握不足、对信息需求描述不清、信息获取渠道有限,更为依赖从业人员的帮助,对从业人员的素养与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完善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

3.1 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机制

3.1.1 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基础

因此,在国家层面,应加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战略规划、加快出台相关配套法律和政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已出台,但是其中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操作与实践层面的描述与规定尚且模糊,无法切实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笔者仍要呼吁在《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进程中,明确强调图书馆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重要提供者的地位,加强图书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法律依据与政策支撑。同样,现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对数字资源的开放获取存在严格界定,需要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为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例如,进一步完善集体管理制度,将自愿性管

理改为延伸性管理或者强制性管理;优化合理使用制度,对公益性公共数字文化机构增设馆藏复制、文献传递、网络传播及网络链接等豁免权;扩充法定许可制度,赋予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法定许可权;限制技术保护措施,增加适用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技术措施规避例外^[5]。

3.1.2 建立跨部门、跨系统的沟通、合作、协同机制

合作是推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服务普及优化的动力,所以应加强区域间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新闻传播部门、网络服务商等多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同时,要注重文化部的统筹效应,进一步扎实开展、有效推进“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实现“三大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的资源共享和有效兼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依托于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来实现,所以数字服务平台的无缝对接与共同建设,能够有效地开放、共享、整合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数字资源的最大效用。

3.1.3 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配套机制

首先,建立健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机制,保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具体事宜的推进与实施,同时促使体系在基层的落地生根、充分发挥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其次,建立公共文化数字监管平台,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日常运行、服务效果等进行实时和动态管理,从而保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发展。例如,欧洲数字图书馆、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英国迈克尔项目等国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项目都建立了理事会,吸纳来自本国甚至全世界的组织、个人参与项目的管理决策^[6]。再次,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评估评价机制,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设施、技术标准、服务效能、用户意见等情况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督查和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定期开展评估检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加强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绩效考核,加大效能指标的权重,引导政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机构、社会数字文化服务企业协同努力,朝着追求社会效益、服务效益的方向发展;以公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制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满意度指标,加大群众满意度测评方式的应用,尤其要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评价机制,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有效性。

3.2 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支持机制

3.2.1 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既涉及网络铺设、场馆建设等跨部门协调协作问题,又涉及数字资源的平衡投放与数字文化服务的实施落实问题,其中各级政府部门肩负主要责任,同时需要文化、宣传、广播电视等相关部门的实施与推进,加快由管理型机构向服务型机构的转型。然而,除了坚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政府主导责任外,还应适当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使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众能够充分参与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中。畅通的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能够有效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开发、资源建设、服务供给、运营管理的工作机制,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给予政策倾斜,引导非政府组织、文化企业同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公平竞争,基本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深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力度;鼓励公共文化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文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发公共数字文化产品;鼓励各类社会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和公众依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提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促进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发展。

3.2.2 拓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技术支撑

创新技术应用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远发展的依托。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整合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等机构的资源,构建统一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尤为重要。例如,扩充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应用,采用分类导航、主动推送等方式提供服务,应用H5、VR等技术拓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传播途径,广泛采用“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模式以实现资源订单式配送、地点网上预订、活动网上预约、网上评价反馈,等等。只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形成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服务模式,才能够增强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精准度^[7]。

3.2.3 加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无论是海量数字资源的凝聚与提供还是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与普及,都不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为全民所知、为全民所用才是体系建设的主旨。当运用现代技术培育新兴公共文化服务业态、对公共数字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已成为可能时,还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推广和高效利用这项惠及全民的政府服务。一方面,加强各类数字服务设备的开发和应用,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全媒体、多终端覆盖与宣传推广;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手段促进各级各类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的用户、数据、资源、服务、技术等进一步统筹整合,打造“一站式”“集成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推广本身具有长远效益,所以不应忽视、短视数字资源的推送与数字服务的精准,而应有效增强公共数字文化的综合服务能力。

3.3 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人才保障机制

人才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动力源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推进实施需要强大、专业的人才队伍作为重要保障,包括精通硬件、网络、系统、软件设计开发等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具备信息挖掘、资源整合、深层检索能力的信息技术人才,具备行政管理能力和社会经验的组织管理人才,等等。因此,应把人才保障作为加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工作来抓。

3.3.1 加强队伍建设力度

完善选人用人机制,采取聘用制、劳务派遣、委

托管理、服务外包、共建共享等方式,建立一支总量均衡、相对稳定、技术过硬、业务精湛的公共数字文化人才队伍^[7]。可采取专兼职结合等方式加强公共数字文化人才储备,广泛吸纳志愿者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工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文化企业等之间的相互合作,搭建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平台。

3.3.2 加强人员培训力度

要制定人员培养与培训的长期计划,定期对从业人员尤其是基层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懂服务、具备参与实际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建立分级培训机制,采取网络远程培训和集中培训等方式,加强对数字文化资源的组织与整合方法、现代信息技术和操作技能以及服务创新意识和服务技能的培养,使从业人员的服务理念、专业知识、信息技能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适应。

4 结语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关注,加强政策设计,协调各系统、各部门的利益,加强各方的协同合作,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效能,仍需要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 肖希明. “国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整合研究”专题引言[J]. 图书与情报, 2015(1):1.
- [2] 袁勤俭. 数字鸿沟的危害性及其跨越策略[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7(4):27-31.
- [3] 洪伟达, 王政. 图书馆保障弱势群体公共信息获取权益的对策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64.
- [4] 邵长娜.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 图书馆界, 2016(2):60-63.
- [5] 吴高.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著作权问题: 困惑与思考——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视角[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11):34-39.
- [6] 肖希明, 完颜邓邓. 治理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J]. 图书馆论坛, 2016(7):18-23.
- [7] 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EB/OL]. (2017-08-01)[2017-08-10]. http://www.ce.cn/culture/gd/201708/01/t20170801_24725909.shtml.

作者简介: 洪伟达(1982—), 男, 黑龙江大学文献信息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王政(1983—), 女, 黑龙江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7-08-16

区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探索

——以重庆市北碚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为例

谭 玮

(北碚图书馆 重庆 400700)

摘要: 文章介绍了重庆市北碚图书馆通过整合数字文化资源与服务,构建区域数字文化资源服务体系、现代传播体系和便捷服务体系的实践,阐述了构建区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

关键词: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数字资源;数字化服务;“碚壳”数字平台

中图分类号: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y and District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ystem—Taking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Beibei District of Chongqing Province for Exampl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actices of the Beibei District Library of Chongqing Province to construct the regional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 service system, the 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e convenient service system by integrating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nd expounds the mechanisms of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and feedback for long-term operation of the county and district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igital resources; digital service; Beike digital platform

在互联网技术、多媒体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的存储和传播使人们获取文化资讯和服务更便捷^[1]。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数字文化服务因能打破地理屏障和时空限制,成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之一。重庆市北碚区以本区创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依托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北碚区公共文化“碚壳”数字平台建设,构建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了区县级城市的数字平台建设和数字化服务的长效运行机制。本文对北碚图书馆的构建实践进行论述,以期对其他地区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1 区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现状

2011年5月,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数字图书馆

推广工程”,这一重大文化惠民工程,不仅推动了全国各级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软硬件建设,更以强大的数字资源保障、先进的技术手段、丰富的全媒体平台,为公共图书馆打造了基于新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相较于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通过建设自有网站并提供本行业数字服务,数字图书馆以提供数字资源及服务的系统性、全面性成为区域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及资源建设的主力军。作为省市级图书馆与基层镇街图书室的重要纽带,区县级图书馆以图书馆总分馆形式构建的区域图书馆服务网络,把镇街分馆的数字化服务纳入了区域的整体服务链中。图书馆在资源及服务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同时,彰显了其在区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龙头地位。

在北碚区,图书馆以本区创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在搭建本馆数字图书馆软硬件平台基础上,于2014年构建了“‘一卡通’服

务中心+若干乡镇服务点”的管理格局,依托全市图书通借通还“一卡通”借阅服务,打通了市、区、镇街、村社四级图书资源共享网络渠道,并依托区内17个镇街文化站电子阅览室,构建了数字资源服务延伸体系,实现了数字图书馆资源及服务区域全覆盖。但在持续提供区域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北碚区也遇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①保障体系不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城乡发展差异明显,没有形成区域内统一的保障体系。②在资源建设方面,各公共文化单位间缺乏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各自为阵的建设模式让信息资源重复建设现象严重。③在平台建设方面,各类文化单位间的自动化系统并不能快捷互通共享,为文化数字资源的交互使用带来障碍。④缺乏覆盖本区域并方便数据交换的公共数字文化网络平台,数字资源的分发手段不尽合理。⑤用户需求难以收集,数字资源服务针对性与互动性差,市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关注热度难以持续。

因此,整合资源、构建平台、推送服务,让市民方便“用起来”,成为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效覆盖城乡的关键环节。

2 重庆市北碚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实践

在深入分析基层市民文化需求、区域文化单位提供的数字文化资源及服务的基础上,北碚图书馆依托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文化馆试点项目,整合各级数字资源和本区文化资源,在构建区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2.1 整合数字文化资源,构建丰富资源体系

资源是服务的基础。北碚图书馆从4个方面着手建设资源体系:①共享国家图书馆、重庆市数字图书馆资源,为区域市民提供专业数据库资源服务。②注重地方特色资源的体系化建设,收集并数字化反映本地区人文、地理、社会发展、文化活动、文化原创等方面的文化资源,建设北碚老照片、北碚文化遗产、北碚数字博物馆、地方文艺创作、远程艺术培训素材5个本地资源库,让数字文化服务更贴近市民生活。③利用项目建设构建专题资源库。结合从2014年开始参与的国家图书馆资源联合建设项目,将采集的政府公开信息建设成专业数据库;依托共享工程国家中心和重庆图书馆完成的“抗战史迹——北碚篇”视频建设

项目,建设专题视频资源库。④与专业资源商合作定制专题数据库。如与北京万方数据公司合作建设“北碚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从北碚概览、北碚历史、北碚人文、乡建文化、抗战文化、宗教文化、温泉文化、非遗文化8个方面,以学术论文、会议论文、图片、视频等形式系统反映北碚历史人文积淀。极富地方特色的资源体系,提升了市民对区域数字文化资源的兴趣和关注度。

2.2 整合媒体平台,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让市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数字化设备均可获得所需知识,是现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全时空服务的美好愿景。北碚图书馆以数字图书馆为主体,结合数字文化馆试点项目,与北大方正阿帕比公司合作,构建了北碚区公共文化“碚壳”数字平台(见图1)。“碚壳”数字平台有3个界面,针对各传播媒介的特点,其数字资源服务各有侧重点:触摸广告机注重信息推送和读书阅报,网站平台注重数据库深度使用,移动终端平台注重市民使用的个性化定制和文化点单服务。体系中所有资源采用三平台一后台的系统架构(见图2),资源发布及更新通过一次操作就可以在三个平台上同时实现。市民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关注的信息均可平滑过渡到另一平台上使



图1 “碚壳”系统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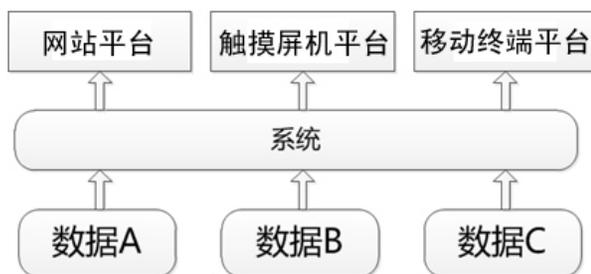


图2 三平台一后台的系统架构图

用。此种全媒体的发布方式,使市民随时随地可通过PC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大型外展触摸屏机等设备使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并根据需求实现订阅及分享等互动性服务。

2.3 整合数字服务,构建便捷服务体系

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公众的文化信息和服务需求不再是零散个别,而是更为深入和广泛。他们需要动态而全面、集成而高效化的文化服务。社会公众一站式获取数字文化资源和服务的需求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源动力^[2]。北碚图书馆结合本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服务项目,在“碚壳”平台上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图书馆OPAC图书查询系统、文化馆远程艺术培训系统、市民文化点单系统、公共服务场馆预约、惠民电影查询、网上展厅展览、数字博物馆等,保证城乡市民一次登录即可了解区域文化信息并享受各项数字文化服务。“碚壳”平台提供的文化整合服务,不仅满足了市民不同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提升了各文化单位的服务效能。

3 构建区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长效运行机制的建议

3.1 加强管理机制,提供长效运行保障

为保证区域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化服务的质量,必须建立服务保障机制^[3]。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纳入区县智慧城市建设,以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保证数字文化资源及服务的全域覆盖。将区域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和网络管理纳入政府云平台进行统一管理,解决后续管理维护问题。区县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区域公共数字文化体系服务的资源建设和更新,每年以定量资金购买、加工数字资源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招聘技术人才充实区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团队,并协议让参与平台建设的公司专业人员常年担任技术顾问。

参考文献:

- [1] 王威.数字图书馆的网络信息资源服务模式的探讨[J].图书情报论坛,2013(5):24-27.
- [2] 肖希明,唐义.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动力机制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4(7):1-5.
- [3] 蒋恩智,郑丽珍,吴伟亚,等.欠发达地区基层文化建设的探究:以仙居县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3):35-37.

作者简介:谭玮(1969—),女,北碚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副馆长。

收稿日期:2017-06-14

3.2 建立协调机制,增加服务多样性

加强地方数字文化资源和数字化服务的统筹整合协调机制,集合区域内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成立以区县“文图博美”四馆、电影公司、文化产业办公室为成员单位的数字文化建设协调小组,统筹各类文化单位数字文化资源和数字文化服务。将当地共青团区委、科学技术协会、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及区域内美术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协会的服务资源纳入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并为志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企业提供信息交流的空间。

3.3 建立反馈机制,提升服务互动性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为市民提供了平等消费数字资源及服务的途径,因此,数字资源及服务让市民“用起来”是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对于文化资源,要建设彰显区域文化特质的资源库,根据各基层文化站文化工作的节点组织各专题数据包,将数字资源推送给市民,并依托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活动。对于文化服务,要建立群众文化点单互动反馈机制,将各文化单位提供的文化服务进行菜单式发布,让市民按需点单,根据平台的管理和工作定单分发,将各类文化服务配送到市民身边,提高人们享用数字文化资源及服务的便利性,同时也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4 结语

区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在惠及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图书馆要充分发挥数字资源服务优势,加强资源整合、平台建设和推送服务力度,满足市民多元化信息需求,为缩小城乡数字文化差距、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而不懈努力。

· 探索与创新 ·

认知盈余时代的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研究

井春兰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广东清远 511510)

摘要: 文章首先介绍了认知盈余理念的概念、时代特征,通过分析认知盈余时代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举措,包括建立区域联盟移动服务平台,注重信息资源整合;创新读者服务形式,加强服务粘着效应;创新服务内容,延伸社会化网络服务,旨在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

关键词: 认知盈余;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读者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Cognitive Surplus Er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the features of time of the cognitive surplus. By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social network service by university librar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of social network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which including establish a mobile service platform to carry out regional alliance,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novate the reader service forms, strengthen the service associated effect, innovate the service content and extend the social network servic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new methods and new ideas for the social network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Key words Cognitive Surplus; university library; social network service; reader service

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通讯技术、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智能手机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每个人享受着工作之外的盈余时间,享受着智能手机带给人们的快乐。互联网让人们结成空前巨大的集合体,其参与人数之多、知识资源之富集、知识分享价值和效果之巨大,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带来新机遇和挑战,也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1 “认知盈余”概念及其时代特征

1.1 “认知盈余”概念

“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概念是由美国作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认知盈余:自由时

间的力量》一书中提出的。是指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具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1]。

“认知盈余”的概念,就是指互联网让尽可能多的人的自由时间联合起来,结合成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集合体,为更为强大的价值创造提供资源禀赋^[2]。总之,社会出现了大量认知盈余者,大量认知盈余者组合起来,具备巨大的能量,产生无穷的社会效应。

1.2 “认知盈余”的时代特征

“认知盈余”的时代特征主要有以下3点:①互联网的高速运算和处理能力,使从业者能够高效、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享受诸多工作之外的时间;②随着移动互联的高速发展,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③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较少的时间

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出足够的集体善意,成为人类社会的红利,来帮助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不同特征,加之PC电脑、智能手机普及大众,带来了丰富的盈余认知。许多年轻人常常把自己的喜好、情绪、琐事等,贴上网络标签,公之于众。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简单、日益透明。

2 认知盈余时代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社会化网络服务概述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创立了六度分割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般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按照六度分割理论,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这是社会化网络(Social Networking)的早期理解。社会化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简称SNS),专指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也指社会现有已成熟普及的信息载体,如短信SMS服务。当下,一种惠及广大网民的全新模式Web6.0实现了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初步结合。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每个人都拥有调动自己感官的无限权力,用自己的五官重新发现世界,改变世界。人们都拥有自己的Blog、自己维护的Wiki、社会化书签等,或者用户通过Tag、RSS、IM、邮件等方式连接到一起,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这就是社会化网络服务^[3]。

2.2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智能手机广泛普及,微信、微博等即时交流工具的存在,使社会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不同行业、不同城市的人们相识交往没有障碍。随着社会步入网络化时代,网络的非正式学习呈现一种主流形势。据调查,人们获得的知识有80%来自于非正式学习,通过正式学习方式获得的知识只占20%^[4]。这为高校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明确提出: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图书馆面向

社会开放的制度与法律问题研究”,对我国1649所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状况进行调研。数据显示16.74%的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其中,北京市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占全国总数的50%以上,广东占26.73%,天津占25%,广西占24.53%,黑龙江占20.37%^[6]。仅有276所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化服务,图书馆开放的比率仍处于较低水平^[7]。高校图书馆开展网络化服务更是微乎其微,其社会化网络服务的潜力巨大。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手机网民达6.95亿人^[8]。2016年数字阅读PC用户达到2.17亿人,移动用户达到2.65亿人^[9]。无线网络已经改变了人类沟通和访问信息的方式,第七届全球移动宽带论坛(Global Mobile Broadband Forum)上,华为在年报中指出,未来5G技术将会大规模地应用于各行各业^[10]。5G无线技术将把所有应用、服务、事物连接到一起,使人类进入万物移动互联的时代。面对着社会发展的形势与现代人不断变化的需求,高校图书馆不但要做好社会服务,更要做好社会化网络服务,这是大势所趋。

2.3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可能性

高校图书馆为认知盈余者提供社会化网络服务,具有可能性。

(1)用户客观的可能性。用户具有时间盈余利用社会化网络服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化信息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有了许多冗余的时间。要想使读者在图书馆花费剩余的时间,享受社会化网络服务,图书馆应加强读者的黏着度:创建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举办各种宣传推介活动吸引读者;建立数字网络平台黏住读者,发挥图书馆强大网络与丰富资源的黏着效应。

(2)用户主观的可能性。现代用户更注重利用社会化网络进行知识互动和分享。读者不仅注重知识获取,还注重参与和互动式的分享。因此,图书馆的社会服务应该是建立知识分享平台和知识共享空间。微信、豆瓣、Linux等的出现,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认知盈余,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分享时代。基于知识的分享、互动,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并创造惊喜的成果,使得知识分享具有生命力。

(3)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技术可能性。

“互联网让尽可能多的人的自由时间联合起来, 结合成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集合体, 从而为更为强大的价值创造提供资源禀赋。”这其中三个关键词可以理解效应: 参与人数的众多、知识资源的富集、知识分享价值和效果的巨大。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网络服务一定是依托移动网络等新技术、新平台, 利用图书馆已有的读者微信群、微阅读群等受众优势以及长期积累的知识资源富集优势, 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强大的知识分享效应。

互联网带来的技术革命使“认知盈余”成为一种可创造巨大社会效应的资源, 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基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依赖手机, 这不是简单的硬件转移, 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高校图书馆应当准确意识并时刻把握图书馆服务与认知盈余者的黏着关系, 做好网络化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化网络服务。高校图书馆对认知盈余者提供社会化网络服务, 不但可能且势在必行。

3 认知盈余时代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的举措

3.1 建立区域联盟移动服务平台, 注重信息资源整合

首先, 面对地方缺乏馆藏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的情况, 高校图书馆应积极主动与公共图书馆等社会力量合作, 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截止到2014年, 全国已有95个不同系统与类型的区域图书馆联盟^[11]。如福州8所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FULink)^[12], 江苏高校区域联盟文献保障系统(JALIS)^[13], 广州高校图书馆联盟、深圳图书馆城、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联盟等等, 各地图书馆联盟取得了巨大成绩。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各馆情况是其资源不够全面又多馆重复, 有些资源严重欠缺。显然, 只有整合、丰富及完善的联盟资源做基础支撑, 才能真正做好图书馆应有的服务。

其次, 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区域联盟移动服务平台。对于跨系统的区域联盟各馆来说, 网络化服务涉及数字资源, 与数字资源有关的技术手段、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等诸多因素。建立联盟移动服务平台, 解决好各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开展移动阅读和移动

化的信息服务是问题关键。高校图书馆可引进超星读秀平台或方正阿帕比(Apabi)中华数字书苑平台, 建立“联盟移动服务平台”: ①整合资源, 包括本地镜像、远程访问等资源, 侧重资源管理层面, 即图书馆员的业务层面, 这是建立资源门户的基础。②整合应用系统, 包括OPAC、统一检索、参考咨询系统、馆际互借等。③建立图书馆门户服务, 建设适合图书馆管理及符合读者使用习惯的图书馆门户, 提供丰富的维护管理组件。

最后, 针对移动平台上资源种类多、数据库结构多、信息总量多等情况, 高校图书馆应采取基于元数据的加工处理整合发布, 使用户感受到的信息资源是一个整体, 免去用户为了获取不同系统的信息资源而进行重复检索、重复查找的烦恼。服务类型包括: 信息资源检索一站式平台、短信服务平台、互动交流平台等^[14], 为广大用户提供丰富的整合资源, 提供便捷、高效的网络化服务。

3.2 创新读者服务形式, 加强服务粘着效应

克莱·舍基观察到, 拥有更快捷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观看在线视频时, 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字幕与标签, 和世界上其他观众一起讨论^[15]。人们具有分享资源的禀赋, 热衷于互动、交流。通过对清远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202名学生进行的“手机利用情况调查”数据显示: 大学生每天看微信朋友圈时间超过3小时者达到47%, 看到有意义、有趣消息愿意分享者达到100%。也就是说, 生活在快节奏又追求享受的时代, 大学生愿意把自己认为有趣、有意义的事情与他人分享。在问题“如果有好书推荐, 愿意阅读吗?”有95%的大学生表示“愿意”; 在“如果有好书朗读推荐, 愿意听否?”100%人回答“愿意”。

人们有与人沟通、与人分享的欲望。因此, 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加强服务的黏着效应, 开展多种形式的读者服务, 为人们提供分享的机会, 吸引读者并留住读者。①创办“有声书”。读者利用途中、路上、睡前等碎片时间随意听书, 既免去了许多人想看书却没有时间的苦恼。②让“纸书可视化”。通过推广名家说书, 如樊登读书等, 制作可视化纸书, 大力推广; 开展最佳说书人评选活动, 让经典书籍“可视化”, 使之成为一种宝贵的共享资源, 惠及大学生及整个社会。③建立掌上“微阅读”。目前, 各高校基本上都建立了公众号, 或RSS阅读、应用程序推送, 但效果并不理

想。公众号往往限于公告、通知、简单信息推送等。通过调查揭示,微信在大学生中的渗透率为82.3%^[16],为此,高校图书馆要建立手持终端的掌上“微信群”“悦读之友”,开展微阅读。契合大学生的兴趣点,荐读符合当代大学生及社会人员能力、素质、修养及流行时尚等书籍。^④多种渠道并举。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各种新媒体开展阅读推广,举办读书沙龙、读书会,结合线上QQ、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进行营销推广,与热衷于资讯、游戏、微信朋友圈中的读者争夺碎片时间。

3.3 创新服务内容,延伸社会化网络服务

除了建立区域联盟移动网络服务平台之外,高校图书馆要延伸社会化网络服务的范畴,搭建起为社会公众提供网络化服务的桥梁,构建具有本馆特色的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与项目,使其网络化的同时个性化,成为高校图书馆在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加深与发挥高校在社会科学方面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力。

高校图书馆应挖掘本地的地域优势,通过挖掘、整理、整合和传承以本地文化为代表的地方特色文化,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培植建立地方特色文化品牌,通过网络延伸社会化服务,为本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地方高校图书馆还应当坚持共建共享原则,主动寻求与当地政府、企业、其他类型馆合作,大力利用省市科研项目机会,争取经费补充与保障而发挥所长。例如,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整合清远地区旅游资源,

开发融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于一体的旅游文化资源数据库——“清远旅游资源数据库”“清远古村落文化数据库”,既整理和保存了地域特色资源,又弘扬和传承了本土地域的人文文化。找准了少数民族建设与发展这个众人关注的焦点,助力本地区文化建设和社会服务。

高校图书馆应通过对地域特色资源的创新研发,吸引用户、留住用户,依托网络平台开展知识服务。例如,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开发建设的“清远排瑶文化数据库”,整合了排瑶纸书、电子书、图片、视频等资源,内容包括排瑶概况、宗教信仰、语言、服饰、饮食与医药等排瑶全部内容。该数据库与当地瑶族博物馆工作、旅游发展、文化相关活动密切相关,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17]。高校图书馆要着重开发创新品牌,开展用户知识服务,延伸社会化网络服务,进一步增强读者黏性。

4 结语

本文对我国高校图书馆认知盈余理论下社会化网络服务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促使高校图书馆认清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特点,积极建立网络平台,开展社会化网络服务。完善、延伸社会化网络服务触角,融入地方经济,建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特色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和服务效益最大化。“认知盈余”理论的提出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网络服务及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与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韦勇娇.认知盈余时代,网络问答社区的知识传播模式探析:以知乎为例[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30-34.
- [2] 刘涛.认知盈余时代,近距离看知识分享服务[EB/OL].(2016-10-21)[2017-06-20].http://www.cnii.com.cn/platform/2016-10/21/content_1788880.htm.
- [3] 社会化网络服务[EB/OL].[2017-06-20].<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8C%96%E7%BD%91%E7%BB%9C%E6%9C%8D%E5%8A%A1/10699892?fr=Aladdin>.
- [4] 洪新华.基于SNS的高校非正式学习社区的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3:10.
- [5]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教高[2015]14号)[A/OL].[2016-01-14].<http://www.tgw.cn/sites/>.
- [6] 冯菲.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现状与发展对策[J].科技经济导刊,2016(3):170-171.
- [7] 程沁.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问题研究[J].图书情报导刊,2016(4):49-52.
- [8] 白杨.中国网民已达7.31亿,2016年互联网的最全分析在这里[EB/OL].(2017-01-22)[2017-06-20].http://tech.ifeng.com/a/20170122/44535194_0.shtml.

(下转第44页)

· 探索与创新 ·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的逻辑意义和策略研究

王娟娟¹ 李力²

(1.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0)

(2.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公共图书馆引入创客空间不仅可以提升读者的图书馆体验,同时也是图书馆服务转型的良好契机。文章就公共图书馆进行创客空间服务的逻辑意义和策略进行了论述,并对国内数家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案例进行了描述。公共图书馆开展创客空间要量力而行,结合社会力量,进行跨界合作,以实现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逻辑意义;跨界合作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Logic Significances and Strategies of Public Library Makerspaces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makerspace in public libraries can not only promote readers' library experiences, but also help public libraries to transform their servic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logic significances and strategies of public libraries to set up makerspaces as well as cases of several public library makerspaces in China.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carry out makerspace projects within their ability.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kerspaces,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also use social forces and conduct crossover cooperation.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Makerspace; logic significance; crossover cooperation

1 创客空间的概念

维基百科对创客空间(Maker space)释义如下:开放的实验室、工作室、机械加工室,在这里人们拥有不同的经验和知识背景,大家为了创作在此集会并共享彼此的经验和知识。创客空间脱胎于硬件领域的DIY(Do It Yourself)运动,其概念出自《创客杂志》,也称创作空间(creative space)、黑客空间(hacker space)^[1]。创客空间是一种新型的学习和生产空间,其核心灵魂为“创意”与“实践”^[2]。

参考肖玮^[1]关于创客空间的研究,笔者认为“创客空间”概念包含空间层面、资源层面、氛围层面和功能层面。空间层面上,创客空间提供开放的环境;资源层面上,创客空间提供必要的文献、设备;氛围层面上,创客空间具备协作、共享氛围;功能层面上,

创客空间提供针对性或多元化的创客服务,促进创客之间分享、学习、创新。

2 公共图书馆进行创客空间服务的逻辑意义

实质上,图书馆与创客空间都紧密围绕“知识、学习、分享、创新”,公共图书馆进行创客空间服务具有自身的逻辑意义。

2.1 契合图书馆文化内涵,促进图书馆完善社会职能

创客身上具有创造、分享与合作精神。作为公益性信息服务机构,公共图书馆以平等、开放的姿态为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读者提供休闲空间、文化空间以及学习场所。创客空间创造、分享、合作的精神恰恰与公共图书馆平等、开放的文化内涵相契合。

吴建中先生认为第三代图书馆包含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以及激发社群活力这四大功能,未来图书馆将成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和交流中心^[3]。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可以为创客提供开放的知识分享与交流环境,创客可在这里获得图书、文献等显性知识,也可以通过创客之间的交流获得经验、技能等隐性知识,获得良好的创客体验服务。相比被动接受图书馆信息素养培训,创客运动有效激发了创客的主动性和兴趣。创客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完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起到了促进作用。

2.2 顺应时代发展,加强图书馆社会价值认同

“互联网+”渗透到各行各业,包括图书馆界。当今世界,图书馆应深化自身的社会价值。公共图书馆作为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空间,其社会价值需要通过新颖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被社会大众认可。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图书馆馆长基思·韦伯斯特(Keith Webster)认为第五代图书馆是创客空间,图书馆演变成学习与共享的中介空间^[3]。创客空间能够为创客提供创新使用的工具和技术;促进创客的沟通和知识共享;为创客的创作提供物理空间;并向创客提供开放的环境,使他们较好地表达自身的创意。创客空间的社会价值与“知识、学习、分享、创新”紧密联系,其社会价值的本质和公共图书馆的知识、教育、学习、交流、开发智力资源的社会价值趋同。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以一种新的图书馆空间吸引更多读者,进而通过创客活动、服务和空间赢得读者对图书馆社会价值的认同。

2.3 更新图书馆服务理念,重组图书馆服务模式

张晓林认为创意空间不是空间问题,而是重组图书馆服务模式的问题^[4]。刘锦山认为图书馆对局部空间的改造是图书馆求新求变、创新服务的一种表现。为创客空间提供各类支持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一种新趋势。丹麦奥尔胡斯图书馆馆长罗尔夫·哈佩尔认为图书馆要构建服务产品的体系,为变化创造空间^[3]。创客空间是图书馆空间改造、服务转型的一条崭新途径。公共图书馆引入创客空间可丰富其服务方式,延伸其服务内容。创客空间的服务理念、视角、技术与方法促进图书馆有效利用既有空间资源,提高其服务水平,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图书馆也正转向知识服务中心。

2.4 追求空间再造,降低图书馆发展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索传军认为,图书馆应结合自身优势及下一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去进行空间再造。创客空间是新时期图书馆进行空间重塑和再造的重要举措。程焕文认为新世纪以来,图书馆一直面临着转型和变革。对空间资源进行变革是图书馆转型的重要内容。图书馆在不断增长其空间资源的同时,也在追求资源再造和空间资源的重塑^[3]。图书馆创客空间有利于降低自身的发展障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副总裁郑爱清(Ai Cheng Tay)女士认为图书馆可通过创制进行突破,以降低图书馆发展障碍。

2.5 强化图书馆体验,丰富图书馆内涵

雪城信息研究所(The Information Institution of Syracuse)董事David Lankes认为创客空间能够激活公共图书馆吸引读者的动力^[2]。郑爱清女士提出,图书馆要通过空间和服务强化读者的图书馆体验。基思·韦伯斯特(Keith Webster)认为,通过制作来学习是卡耐基梅隆大学体验的重要部分。

公共图书馆开展创客活动,可加强读者的图书馆体验,培育市民的多元素养,使读者获得协作创新经验,促进读者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分享精神,有利于提升公共图书馆的魅力指数。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属于深层次服务,能够扩展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丰富其内涵,使其在提供知识、信息等服务的同时,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提升图书馆的品牌形象和竞争力,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当地创意产业的发展。

2.6 促进知识创造,开发图书馆智力资源

图书馆作为地区发展的智力引擎,应主动培育社会的科技创新意识。1975年国际图联(IFLA)大会中,“开发智力资源”被认为是公共图书馆四大职能之一。陈庆珠在2013年第79界国际图联大会上提出,图书馆要成为进行创意项目的创新工场。

《创客空间》创始人D. Dougherty认为创客运动的核心是把创造理念引入图书馆,重燃读者对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激情。本质上,图书馆创客空间是知识与实践的结合^[1]。张晓林认为“创意空间把围绕文献的图书馆转变成围绕用户、支持用户解决问题的平台;从一个满足于用户单独阅读一本书的图书馆,变到一个能够通过群体交互来利用信息和创造信息的平台”^[4]。青树教育基金会主席赵耀渝女士认为创

客空间的出现提醒图书馆不仅要分享知识和信息,还要帮助大家创造新的知识。

从宏观角度来看,图书馆创客空间为用户发挥创意和实现创意提供工具资源和交流平台,使读者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知识学习和知识创新。从微观角度来看,图书馆创客空间聚集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读者,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和创新的空间场所。

3 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创客空间服务的现状

3.1 实践

创客空间的引入是公共图书馆空间再造和服务转型的良好契机,我国公共图书馆陆续开展了创客空

间服务,并不断完善其功能和设备。如上海图书馆的“创·新空间”、长沙图书馆的新三角创客空间(Triangle Space)等。表1对国内几家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服务、布局、设备、开展年份等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3.2 存在问题

图书馆创客空间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视物、忽视人,重改造、轻运营等问题,且很多流于形式,未根据馆舍馆情开展创客活动,经营理念较相似,特色不明显,优质服务也有待加强。有些图书馆由于缺乏经费的长效保障,设备欠缺或无法更新。硬件的欠缺制约了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服务深度和水平。另外,由于创客项目专业性和操作性较强,因此对创客空间的服务人员要求也较高。

表1 我国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案例简介

机构项目	上海图书馆	长沙图书馆	越秀区图书馆	铜陵市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科技分馆	合肥市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
项目名称	创·新空间	新三角创客空间	“互联网+”创客空间	“童精灵创客水吧”	创客空间	科技分馆(科技图书馆)	悦·书房	创客空间
功能/服务	设置阅读空间、IC共享空间、专利标准服务空间、创意设计展览空间、全媒体交流体验空间;服务内容涉及阅读、教学、休闲、文献咨询、阅读推广展示、互动及开发创造 ^[5] 。	创客分享会:分享知识、经验和创意;创意生活:生活类手作活动;小小创客家;创意竞赛;创客作品展;创客工作室等 ^[6] ;项目跟踪、文献咨询、阅读推广等信息服务。	“1+N”服务模式 ^[7] 。“1”指“越图创客空间”,“N”包括24小时线上讨论平台、创客工作室、创客阅览室、创客集市、创客分享会、盒子工作室、作品展区、创客培训班、创客服务进社区等多元服务。	设展示区 ^[8] ;提供线上线下创客作品分享、交换平台,定期举办“企业沙龙”“创客路演”等活动。	提供资源、空间、设备、咨询、辅导;创客体验服务;“创客主题展览”;3D打印等主题创客服务;讲座、展览、工作坊、沙龙、比赛等创客培训及活动。	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专业的天文、环保、科技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有3D打印区 ^[9] 。	图书阅览服务、主题文献荐读、书友交流等;小型沙龙或聚会 ^[10] ;设乐队演奏区域、沙龙区域;创客大赛作品展等。	创意设计制作区、创意作品展示区、研究学习区、讨论交流功能区;文献、数据库服务;融合最新的STEAM课程内容,开展“青少年创客成长培养计划” ^[11] 。
特点	综合型“创客空间”,具备多元功能;零门槛;有偿服务策略,收取不同程度的材料费 ^[12] 。	不同受众(青少年、成人)不同服务;主体多元:馆员、创客、志愿者、投资人等;社会化自主管理模式(新三角创客空间管理委员会)。	线下线上结合;创客工具可外借,盒子工具含拼插模块、小型工具、零配件等。	集休闲、交流于一体;设立会员准入制;提供免费加盟开店。	服务针对性,针对成人和青少年分别设成人创客空间和青少年创客空间(儿童书馆区)。	科技特色浓厚	24小时不打烊服务模式;寻找价值交叉点,吸纳社会力量参与 ^[13] 。	服务针对性,专门为青少年读者打造的创意交流与实践空间。
开展年份	2013年5月	2014年6月	2016年3月	2016年9月	2016年11月试运行	2016年5月	2016年6月	2016年4月
空间	原800平方米的专利标准检索工具阅览室改造而成。	工作室:160平方米;两间报告厅;展厅:700平米。	工作室、设备室及阅览室。	—	图书馆北8楼200平方米成人创客空间;南4楼青少年创客空间;一楼的阅读体验区。	—	占地500多平方米;“阅空间”“趣空间”“创空间”。	—
工具/设备	电脑;多媒体投影;3D打印机、3D扫描设备;数字画板;智能桌面触摸屏;创意数字展示台;数字信息公告屏。	3D打印机、3D扫描仪、数控雕刻机、激光切割机、工业缝纫机、小型五金车床、手持机床等,多媒体教室。	重型工作台、3D打印机、建模软件、激光雕刻机、可编程控制器、手电钻、扳手、测量仪器、拼装模块、Arduino入门实验套件等。	办公桌椅、3D打印机、内雕3D机、VR全景相机等。	小型便携式3D打印机、大型3D打印机 ^[14] 、高端电脑等。	3D打印设备、八大行星体验科技设备。	—	3D打印机、万能摇臂微型安全钻床、微型安全木工车床、弓形臂微型安全锯床、全金属微型安全磨床等。

注:“—”表示未查找到相关信息。

4 公共图书馆开展创客空间服务的策略

美国图书馆协会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编制创客空间服务指南的形式,促进创客空间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界的可持续化发展^[1]。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可根据自身的馆情合理开展创客空间服务。

4.1 合理布局物理空间,完善设备购置标准

创客空间的面积不是唯一衡量因素。创客空间的面积可大可小,功能布局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在新馆建造时对创客空间进行规划;也可以将原有空间进行再造,转变为创客空间,并进行功能区域的划分。创客空间也可以是流动的,举办创客活动的场所可以视为临时的创客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是培训室、会议室,也可以是新技术体验中心,等等。

设备方面,采购设备因人而异。公共图书馆可根据创客空间服务项目和资金情况制定设备购置及更新标准。创客空间设备一是专业设备类,包括3D打印机、3D扫描仪、激光切割器、焊接器、铣床等;二是普通设备类,如剪刀、胶水棒、设计用纸、轻型木材、橡胶泥等。

4.2 争取政府财政支持,保证资金来源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文化事业单位,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拨款。资金因素对项目的创建及维护影响很大。有些创客空间设备的购买费用和使用费用较为昂贵,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图书馆才能有条件配置,并及时更新,如钻孔铣床、激光切割机、数控机床、光控装置、3D打印机等。

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建设资金可来自国家定项拨款、专项项目资金、外界捐助、项目会费和项目孵化创收等。其中,国家定项拨款和专项项目资金是创客空间的主要建设资金。为了创客空间的可持续运作,公共图书馆必须保证创客空间运营的经费来源,尤其要获得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

4.3 引进信息创新人才,加强服务人员培训

创客活动项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创客具有不同的行业背景,而公共图书馆馆员多为图情档专业、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等,专业背景较为单一。普通馆员在创客空间服务过程中容易暴露自身的短板,因此图书馆需引进信息创新人才,使其参与创客空间项目

管理^[15]。另外,图情档专业背景的馆员,应多参加创客空间服务的培训,如在线研讨会、现场讨论会等,进行相关的学习、进修,吸收创客空间服务经验和技能,使自身能够胜任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服务工作。

4.4 持续完善运营规范,兼顾公益与效益

创客空间的引入对图书馆原有的空间环境有一定的颠覆性。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可以适度放松对创客空间运营秩序的要求,给予创客足够的自由,从而激发创客的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为防止创客之间由于太过散漫的氛围影响彼此创作,公共图书馆应制定相关运营规范、管理制度,并敦促创客遵守。

兼顾公益与效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进行有偿服务策略,收取不同程度的材料费,以回收成本。也有些图书馆与其他机构分摊场地费用。这些措施能够帮助图书馆减轻创客空间运营的资金压力,促进图书馆创客空间良性、持续发展。

4.5 创新运营方式,进行跨界合作

跨界是图书馆需要的,跨界融合会形成创新。创客空间的运营需要场地、经费、宣传与推广,单靠一己之力,不仅不利于图书馆创客空间的运行,也是对社会力量的一种浪费。不同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资源、专业能力和经验,图书馆应通过跨界合作,解决创客空间的场地、经费等问题,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如,费耶特维尔公共图书馆与美国雪城大学信息学院及3M等科技公司合作,获取技术和理论支持;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创客实验室由摩托罗拉通讯基金会赞助成立。

合作本身也是在向社会各界推广图书馆创客空间,扩大创客空间的影响力。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运行初期,与新车间、设计丰收、陈悦记传统基金会、善淘网、M97画廊等馆外创意机构合作,合作推出创意产品成果展及“设计师家园”等活动^[4]。图书馆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应该坚持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赢,将图书馆资源与社会结构资源有效融合,实现资源共享的跨界合作,发展壮大图书馆创客空间。

4.6 鼓励读者参与,招募志愿者

图书馆应鼓励读者参与创客空间活动,收集他们的反馈意见。克利夫兰图书馆的Tech Central(创新技术与学习中心)开展了调查和访谈,借助读者反馈来改进服务^[16]。澳大利亚的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以吸引公众参与为要旨,儿童、年轻人都是其目标人群。

由于馆员人数和专业背景的限制,图书馆可招募不同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协助管理创客空间。长沙图书馆新三角创客空间实行社会化的自主管理模式,成立了新三角创客空间管理委员会。志愿者可参加管理委员会的职务选举,参与管理创客空间。志愿者可以将自身隐性知识和专业知识分享给图书馆创客,帮助新加入的创客有效利用创客空间及操作各种创客工具。

“儿童创客(Maker kids)”创客空间是《多伦多生活杂志》主办的工作坊,活动的开展基于强大的志愿者基础和孩子们自己的相互指导,成人扮演的只是辅助者的角色^[17]。

5 结语

引入创客空间是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之一。公共图书馆应看到创客空间在图书馆空间改造、服务转型方面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量力而行,从馆情出发,建立适合本馆的创客空间服务体系。对于有条件的公共图书馆可以因馆制宜,挖掘本馆较为闲置的空间进行空间再造,或开辟新空间进行创客空间服务。图书馆需充分论证、合理规划,有序筹建创客空间,以实现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肖玮.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研究[J].图书馆,2016(6):83-85.
- [2] 曹芬芳.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架构研究[J].情报杂志,2015(6):191-195.
- [3] 刘剑英,牛士静.“创客空间:图书馆里的创造力——人人参与的创客空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EB/OL].[2017-01-25].<http://www.chinalibs.net/ArticleInfo.aspx?id=411399>.
- [4] 王万振,闫春燕.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10):21-23.
- [5] 曲蕴.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实践探索:以上海图书馆“创·新空间”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4(10):42-44.
- [6] 长沙图书馆新三角创客空间[EB/OL].[2017-02-01].<http://www.liblab.cn/>.
- [7] 全市首个公共图书馆“互联网+”创客空间迎客越秀区图书馆为读者量身定做“1+N”服务模式[EB/OL].[2017-01-25].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4/01/c_128854932.htm.
- [8] 铜陵开拓“图书馆+文化创客空间”[EB/OL].[2017-02-02].<http://www.aqzyzx.com/system/2016/09/13/010818015.shtml>.
- [9] 杭州有个图书馆15日开张充满了科技的特色![EB/OL].[2017-02-02].<http://n.cztv.com/news/12051674.html>.
- [10] 悦书房合肥市图书馆24小时阅读空间正式对外开放[EB/OL].[2017-02-02].<http://www.ahlib.com/contents/1037/25679.html>.
- [11] 深圳图书馆创客空间正式启动啦![EB/OL].[2017-02-02].<http://www.55df.com/c/109024.shtml>.
- [12] 尤越,贾苹.图书馆创客空间发展实践研究及建议[J].图书馆杂志,2015(5):95-101.
- [13] 合肥市图书馆引入社会力量共建安徽图书馆首个全天阅读空间[EB/OL].[2017-02-02].<http://news.hf365.com/system/2016/07/01/015012642.shtml>.
- [14] 广州首个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成立 动脑动手做创客[EB/OL].[2017-02-02].<http://news.21cn.com/guangdong/a/2016/0331/20/30850963.shtml>.
- [15] 陈冀宏.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发展策略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12):19-21.
- [16] 石志松.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实践对比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2):80-85.
- [17] 王明朕,张久珍.国外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营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6(7):39-45.

作者简介: 王娟娟(1986—),女,嘉兴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用户研究与信息服务;李力(1989—),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 2017-05-05

地方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探索*

周 频 吕元康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浙江湖州 313000)

摘 要: 文章从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实践现状出发,引入嵌入式学科服务,指出其需遵循的适需、适时、适地三原则,并结合工作实践从认识、人员、合作、需求、平台及空间、内容6个方面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的具体策略,以期为其他高校的嵌入式学科服务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用户需求; 高校图书馆; 嵌入式学科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ing on the Embedded Disciplinary Service Mode of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ocal university library, after that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embedded disciplinary service, and points out three principles. At last, based on the working practice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local university library's embedded disciplinary service from six aspects: cognition, personnel, cooperation, demand, platform and content.

Key words user needs; university library; embedded disciplinary service

1 引言

学科是高等学校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主要体现,是办学质量、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学科建设水平不仅代表着高校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更决定着高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开展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在学科建设中发挥其作用的必然选择,也是高校图书馆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些研究型大学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开始引进美国、加拿大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模式——学科馆员制度。由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化服务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者通过

文献搜索和实际调研发现:经过近20年的探索,学科服务的相关理论研究数十倍增加,但学科服务实践仍踟躇不前,尤其是地方高校学科化服务更加滞后,大多停留在学科图书推荐等学科服务初级阶段,即使设立了学科馆员岗位,也形同虚设。为改变这一现状,笔者结合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实践,提出了一套基于校本、馆本及师生学科需求的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策略,以促进地方高校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发展。

2 嵌入式学科服务及其原则

2.1 嵌入式理念

嵌入最初只是IT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

* 本文系2016年湖州市社科联、市高等教育学会联合课题“湖州高等院校图书馆嵌入式人才培养服务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J16012)的研究成果之一。

70年代,计算机微处理器出现,使得计算机脱离原来庞然大物的形态与通用功能,嵌入到一个对象体系中去,从而导致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为通用计算机系统和嵌入式计算机系统两大分支,嵌入式系统深入到手机、U盘、汽车、ATM取款机等社会各个领域。

“嵌入式”作为一种理念最早应用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随军的嵌入式新闻记者,其负责在特定环境下提供战地实况报道。2004年,嵌入式馆员首次被Phillips和Kearley在图书情报领域中提出。图书馆界的“嵌入”更强调馆员深入用户群体,发现与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并利用相关信息技术和手段嵌入到用户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为用户提供系列知识服务。

“嵌入式”理念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将某些特定的功能集成到另一个实用场景中,在用户需要时提供即时服务^[1-2]。

2.2 嵌入式学科服务

嵌入式学科服务是一种学科服务理念 and 模式,其核心在于融入用户的信息环境,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充分发挥馆员在信息获取、筛选、加工、管理、分析方面的优势,根据学科课题来获取组织并提供信息资源,将信息服务延伸到用户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对馆藏资源进行有机组织与揭示,采用各种途径与技术手段将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与服务嵌入到用户信息环境中,从而提升图书馆在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3]。

2.3 嵌入式学科服务原则

2.3.1 适需原则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是一种融入用户信息环境的服务,以遵循师生学科服务的需要为前提。若高校馆员主动走入到师生读者的教学、科研环境中,但师生读者本身不需要,只是被动接受所推送的服务,那么就更容易给读者带来困扰,甚至引起其反感,工作效果适得其反。因此,馆员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及时了解读者的学科需求;另一方面要通过走访沟通准确挖掘和把握读者的潜在需求。以两个需求为基础,嵌入教学、科研情景,服务才能发挥其效用。

2.3.2 适时原则

嵌入式学科服务在适宜师生读者需求的基础上,还需选择适当的时机,及时、即时提供服务,一旦错过或延误时机,需求迫切程度降低,学科服务效果

将大打折扣。倘若师生读者提出了某一学科服务需求,图书馆从接收诉求到处理、反馈,整个流程拖沓冗长、耗时过长,需求有可能已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是一次学科服务工作的失误,更容易造成师生对图书馆提供学科化服务能力的不信任。

2.3.3 适地原则

适地原则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是嵌入到师生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即“融入一线,融入过程”,把学科服务深入到课程教学中、科研项目的团队研讨中、毕业论文/设计的撰写过程中;其二,“地”指网络虚拟环境,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用户的学习和阅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移动学习、移动办公悄然兴起。轻松便携、性能强大的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使得师生可以在教学过程、科研过程、会议过程、运动过程等间隙关注新闻动态、学术信息、邮件往来,甚至社交互动。馆员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终端,无需走出图书馆建筑,无需赶往用户教学、科研场所,轻松实现“用户在哪里,图书馆到哪里”,提供嵌入到用户个人环境的个性化、学科化服务^[4]。

3 地方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探索

3.1 正确认识学科服务

目前,很多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完全照搬中国科学院、985、211等研究型高校的模式,对于学科服务的理解狭隘化,将其仅仅看作对教师的深层次的科研定题服务。但从学校类型、人才培养目标、师生现实情况及需求等方面来看,地方高校与研究型高校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对于地方高校图书馆来说,首要任务是正确认识学科服务的概念,走出盲目照抄照搬、学科化服务内容科研化、学科化服务对象个别化、服务主体孤立化等误区^[5],正确定位学科服务内容、对象和方式方法是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前提条件。

3.2 组建学科服务团队

组建学科服务团队是嵌入式学科服务的人员保障,嵌入式学科服务需要一定数量的具备不同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的支持。随着高校对教师学历准入要求的提高,众多地方高校图书馆现阶段进入要求也多是研究生,但因地域等因素所限,地方高校图书馆

想招到对口的高素质人才并非易事,所以,地方高校图书馆人员数量仍然不足且学科分布不均衡。在这样的形势下,地方高校图书馆就需充分利用现有的馆员资源,组建文理两个学科服务团队,以团队的形式开展学科服务。例如,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组建了以馆长、副馆长带队,由副研究馆员和硕士研究生以上馆员构成的文理两个学科服务团队,分别对学校文理科学院进行嵌入式学科服务。此外,笔者建议学科服务团队中可考虑加入兼职教师、学生助理,通过馆员、师生读者的力行参与,提高学科服务的综合能力,提升学科服务质量。

3.3 打破孤立状态,加强多方联动

打破孤立状态、加强多方联动是嵌入式学科服务开展的关键。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之所以一直停滞不前,学科馆员形同虚设,重要原因在于图书馆在学科化服务中一直处于孤立状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图书馆缺乏与二级学院、教务处、科技处、学科处等职能部门的真正联合,缺少其他部门积极有力的支持。要实现真正的联动,需要一套完善的合作机制,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建联合推动学科服务工作小组,定期召开学科服务会议,由各部门配合完成联络工作,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图书馆作为学科服务主体,一直处于孤立化境地,缺乏师生主动积极参与和反馈。换言之,图书馆员和师生读者之间还没建立实质性的互动联系,究其原因在于很多师生读者对图书馆的学科服务不知悉,对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不信任。要建立这种联系,图书馆就必须加强宣传,鼓励图书馆员走到师生读者中去,把学科服务内容、服务能力、联系方式等传递给他们。例如,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每学期开展2—3次由馆长带队、主动走进二级学院的宣传服务活动,深受教师欢迎,对加强图书馆与教师间的联系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3.4 深入调查用户需求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有效开展,更多依赖于用户需求。全面了解用户现实需要,深入挖掘潜在需求,是开展学科服务的第一步。笔者以湖州师范学院师生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别对教师、学生进行学科服务用户需求的调查。

(1) 教师学科服务需求调查分析

学科服务需求问卷调查取样于生命科学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两个学院。向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发放问

卷66份,回收有效问卷62份;社会发展学院发放问卷32份,回收有效问卷30份。就教师学科服务的需求展开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教师学科服务需求

需求调查项目	生命科学学院占比/%	社会发展学院占比/%
查收查引	19.19	46.67
专利(文献)分析报告	8.08	0.67
科技查新	14.14	20.00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19.19	53.4
整理本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13.13	40.00
担当科研助手,提供文献综述、翻译等服务	7.07	26.70
定时推介前沿研究成果	10.10	60.00
课题、专利申请前文献调研	9.09	0

由表1可知,以生命科学学院为代表的理工科学科服务需求相对分散,查收查引、文献需求与馆际互借、科技查新居前3;以社会发展学院为代表的文科教师对前沿研究成果定时推介的学科信息需求最大,文献需求、查收查引次之。

(2) 学生读者学科服务需求调查分析

学生读者随机抽取样本105个,有效样本105个。就“您希望图书馆提供哪些学科服务”这一问题,有25%的学生选择了“专业图书推介”,69%的学生选择了“论文撰写专题培训”,6%的学生选择了“专业数据库介绍”。具体分析问卷结果后发现,选择“专业图书推介”的大多是大一学生,其刚步入大学,对专业图书知之甚少,亟需图书推介与指导;而选择“论文撰写专题培训”的大多是大三学生,其正处于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的开题阶段,亟需专业论文撰写的指导与培训。

通过以上师生学科服务需求的调查可以看出,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类别读者的学科服务需求不尽相同,同一个读者在不同阶段的学科服务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图书馆在全面了解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在合适的时间节点融入恰当的情景开展针对性、个性化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3.5 充分利用平台和空间

3.5.1 利用各类宣传、服务平台

(1) 学校/学院的主页

随着图书检索、查阅以及续借等功能多元化嵌

人到移动平台,图书馆主页的浏览量越来越少,而目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所购买的学科数字资源、整合的网上开放获取学科资源导航、新数据库资源等都只在图书馆网页上呈现,图书馆主页的浏览量减少导致推介类学科资源经常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要真正实现学科专项资源向师生读者的推介,需要把这些信息或导航嵌入到师生习惯和喜好浏览的网页中,把现有馆藏的纸本、数字资源或学科前沿的信息分学科、分专业嵌入到学院或学校主页特定的专栏中,使师生能够方便阅览与使用。例如,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购买的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平台,主要涵盖经济、金融、会计、贸易、能源等领域实证与投资研究所必需的绝大部分数据,因此嵌入到商学院主页上;而KUKE音乐数字图书馆更适宜艺术学院。把专业数据库嵌入到相关学院的主页上,既能起到强化作用,也提高了专业数字资源的使用率。

(2) 微信、微博服务平台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图书馆纷纷利用微信、微博等开展信息服务和学科服务。笔者认为可通过3个途径来有效利用微信平台:①注重图书馆现有的微信服务平台与高校内部其他微信公众号的联合;②建立专门的学科服务微信平台,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数字资源、学科发展前沿、科学研究工具、学科专业教学信息等分门别类进行推送,如武汉大学的学科服务助手;③通过图书馆员或学科馆员与具体的学科师生建立相应的微信好友关系,直接嵌入到读者中去,也可以进入班级微信群,进行个性化的学科服务。总之,图书馆要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功能,使嵌入式学科服务为读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3) 内部刊物

高校图书馆大多有自己的内部刊物,一些主要介绍行业资讯,一些主要侧重工作报道,也有一部分直接面向读者服务,如浙江大学《浙大图文》、浙江师范大学《图文资讯》均设置了“学科服务”栏目,主要包括特定学科的学科分析、教师科研分析、学科新书推荐等,每期侧重不同学科。一方面图书馆可以通过内部刊物把某特定学科的新书推荐、专业数据库、学科数据分析、教师科研分析、学科前沿信息、学科会议消息以及师生投稿等内容作为特定栏目在每期进行编辑,刊发后针对该学科的师生发放,使相关的学科信息嵌入到读者生活中;另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利用

二级学院或职能部门的内部刊物,通过与其协商,把相关内容作为其中一个栏目嵌入进去,起到推广学科服务的作用。

3.5.2 利用各类实体空间

为满足读者的各类需求,图书馆界掀起了空间再造的热潮,信息共享空间、创新创意空间(创客空间)、科学研究空间、读者研讨空间等纷纷建成。这些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连结图书馆与读者的桥梁,也为读者提供了学科服务的平台。尤其是科学研究空间为师生提供了项目研究、探讨的便利,学科馆员可根据空间的预约情况对空间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参与,为其提供必要的文献和知识服务,为定题、跟踪项目等深层次学科服务奠定基础。

3.6 制定嵌入式学科服务内容

3.6.1 基于教师需求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1) 基于教师教学需求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首先,提供和推送馆藏资源学科参考书目,把馆藏纸质、电子文献中与教学课程相关的学科参考书目等整理并推送给教师;其次,推送网络免费教学资源,建立课程导航库,搜集整理课程PPT、网络精品课程、MOOC课程以及与学科教学相关的视频等,以便于教师能通过学习共享不断充实课程教学;最后,在教学过程中推送学科文献检索方法和技巧等,图书馆员可以在教师课程结束前,特别是在撰写论文、文献综述、科技报告等作业布置之前,增加一堂有关学科资源检索的课程来进行辅助,从而使教学效果以及科研水平有较大提高。

(2) 基于教师科研需求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首先,图书馆在经费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购置符合师生要求的数据库资源,在此基础上整合网上开放获取资源、机构知识库资源等网络免费资源,特别是以学科为单位对Internet上的相关学术资源和专业网站进行搜集、组织和整理,提供学科学术资源的动态链接和导航,把这些服务嵌入宣传服务平台中,推送到师生科研活动中。

其次,向教师推介科研所需的学科发展新动态等的学术编辑、数据分析软件和工具,如Citespace、E-Learning、Histcite,有效帮助教师了解本学科的前沿信息和发展动态,减少教师在文字编辑等流程上的时间,同时也为教师在项目申报前提供资讯导航。

最后,向教师提供科技查新和定题服务。一方

面,科技查新更适用于理工科的学科服务,通过科技查新可以了解国内外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研究开发方向、开发的深度及广度、已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等,对所选课题是否具有新颖性提供客观的判断依据。尽管地方高校并没有教育部科技查新资质,但科技查新的方法和过程可以用于服务教师科研。例如,宁波大学科技查新站湖州师范学院分站于2017年4月正式揭牌运行,查新人员在经过教育部查新员考核培训和宁波大学查新站的实践操练后上岗为本校研究生开题进行查新服务。另一方面,定题服务则更侧重于文科服务,笔者建议地方高校图书馆可着重从校级重点学科或人文学科入手,嵌入到市厅级、省部级甚至更高级别人文学科项目中,了解项目内容、参与项目研讨、跟踪项目进程、提供文献资料收集和分析等工作。当然,这些还须以项目负责人的需求意愿为主,而不能作为学科服务的硬性指标。

3.6.2 基于学生需求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1) 基于学生课程学习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嵌入学生课程学习的学科服务主要体现在信息检索课程的开设上。将信息检索课程通过学生专业选修课或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展,提高包括学科资料检索水平在内的学生全面查找信息的能力。通过笔者的调查访谈发现,学生普遍认为学科专业数据库、信息检索方法的教授最好从大一开始。所以从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角度来说,学校应重视对信息检索课程的开设,更理想的嵌入读者课程的学习方式是和学科教师进行合作。

(2) 基于学生科研、项目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高校在注重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还为学生提

供一些科研立项、创新创业的机会,如校级学生科研项目、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区项目、新苗计划科研项目等。科研项目申报时,高校图书馆应注意提供相应的学科文献数据库介绍、检索以及文献分析等服务,由图书馆员或学科馆员走入学生科研团队,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学科服务。

(3) 基于学生论文撰写需求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高校图书馆可以基于学生论文撰写需求提供嵌入式学科服务,特别是在大三学生撰写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开题之时,对他们进行系统性的中外文学科资源检索的专题培训,这对于帮助学生解决查找资料难、少等问题,顺利完成论文的撰写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大多数地方高校图书馆通过日常开展的“1小时讲座”的形式把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资源向学生读者推介,但往往因需求不足导致参与人数不多,读者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可以在设置传统“1小时”讲座的同时,利用学生论文开题的时机,以小班授课的形式,根据各学院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特点,结合图书馆购买的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网上免费开放获取的资源等进行全面详细的讲解,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解决查找资料的问题,还能提高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

4 结语

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发挥其服务教学、科研作用的关键,对培育一流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创建有特色的地方高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科服务模式的研究和实践应用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朱丹,王静.国内外高校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J].图书馆,2013(4):87-90.
- [2] 江珊,张宁.高校图书馆嵌入式读者培训探索与实践:以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报,2012(8):66-68.
- [3] 于曦,高洁.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策略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5):73-76,82.
- [4] 傅天珍,王边,郑江平.以移动终端为媒介的嵌入式学科服务探讨[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13(1):167-170.
- [5] 吕元康,周频,陈远方.地方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若干误区[J].新世纪图书馆,2012(4):47-50.

作者简介: 周频(1981—),女,硕士,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科服务、阅读推广;吕元康(1962—),男,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学科服务、信息咨询。

收稿日期: 2017-09-01

· 探索与创新 ·

“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图书馆新型电子阅览室建设探析

梅国栋

(合肥市图书馆 安徽合肥 230061)

摘要: 电子阅览室是公共图书馆基础服务设施之一。文章以“互联网+”环境为背景对当前电子阅览室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并从应用桌面虚拟化、加强上网行为管理、构建资源统一检索平台、按需划分功能领域,以及加强数字资源推广服务、积极开展读者培训等方面对公共图书馆新型电子阅览室建设进行了探讨,以期进一步推动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的建设。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电子阅览室; 互联网+; 数字资源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2.2 **文献标识码:** A

An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New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in Public Libraries under the Internet + Environment

Abstr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is one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the Internet + environment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ounds 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and discusses construction of new e-reading rooms in public libraries from aspects of applying desktop virtualization, strengthening online behaviors management, building a unified search platform for resources, dividing functional fields by demands, enhancing digital resources promotion service, developing actively the reader training work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faciliti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Internet +; digital resource

1 引言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的到来,各类电子出版物、数字资源数据库等大量涌现,以纸质文献的流通、阅览为主的图书馆传统服务模式受到巨大冲击,电子阅览室以其资源检索快速、浏览便捷、获取资源方便等优点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原有的电子阅览设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文化部、财政部于2011年初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文件),其中包括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免费开放^[1]。2012年2月,文化部、财政部又联合下发了《“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实施方案》,决定于“十二五”期间

在全国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其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软硬件设施、增强各级公共图书馆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等^[2]。

2 电子阅览室发展现状

电子阅览室是指以电子出版物、数字资源数据库及网上信息服务为主体,为读者免费提供信息检索、馆藏文献信息查询、数字资源浏览下载,以及数字文献信息咨询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当前公共电子阅览室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 信息检索。电子阅览室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信息检索,如光盘镜像检索、OPAC检索、互联网信息检索以及现在最为重要的数字资源检索等,读者可在电子阅览室方便快捷地检索所需

要的内容。

(2) 数字资源访问。数字资源建设是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资源种类包括电子书、电子期刊、视频讲座、影音学习及有声读物等。电子阅览室为读者提供了免费浏览、下载、阅读数字资源的服务。

(3) 培训学习。开展公益培训活动是图书馆服务内容和形式的拓展,电子阅览室配有电脑、宽带网络以及技术人员,具备开展公益培训的基础条件。电子阅览室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培训,能使其成为读者的第二学习课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4) 休闲娱乐。电子阅览室在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以外,上网冲浪和影音欣赏也是其重要的服务内容。随着政府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加大,电子阅览室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其室内环境及设备设施会越来越好,将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走进电子阅览室休闲娱乐,享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当前电子阅览室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信息服务定位不清晰,工作人员以日常的机器维护、网络管理为主要工作内容,缺乏主动开展信息服务的意识,部分读者对电子阅览室的服务内容了解不全面;②部分图书馆因经费限制,缺乏相应的经费购买足够的数字资源供读者使用,无法满足读者对数字资源的需求。为适应图书馆开展数字信息服务的需要,在公共图书馆建立一个集网络、电子出版物及数字资源数据库于一体的多功能、新型电子阅览室已成为必然趋势。

3 新型电子阅览室建设

新型电子阅览室建设应以计算机设备和“互联网+”为基础条件,以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为管理手段,以读者需求为出发点,优化电子阅览管理,加强数字资源服务意识,深入开展数字资源宣传、开发和利用,营造舒适温馨的阅览环境,为读者打造一个公益、均等、便捷地享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良好氛围。

3.1 应用桌面虚拟化

近年来,虚拟化技术在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如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以及桌面虚拟化等。虚拟化技术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能耗。桌面虚拟化使所有程序在服务器运行,不再依赖于客户

端,大大减轻了客户端的配置要求。桌面虚拟化包括基础网络环境、服务器虚拟化软件、服务器、存储设备、虚拟桌面管理端和客户端等部分。目前国内外桌面虚拟化产品较多,且各具特点,但在系统架构上都以实现有效冗余、数据高效读写、提升链路带宽、抑制网络风暴、避免单点故障等为目标,以提高虚拟化桌面的性能和可靠性^[3]。桌面虚拟化改变了传统以单台PC机为管理单元的管理模式。传统管理模式中,维护PC机稳定运行是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同时其工作量与PC机数量多少有直接关系。而桌面虚拟化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PC机的管理模式,其只需管理一个或少数几个虚拟化桌面模板即可,管理工作量与终端数量没有直接关系,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让工作人员从大量的PC机管理维护中解脱出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电子阅览室的信息服务中去。

3.2 加强上网行为管理

为了给电子阅览室营造一个绿色、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加强网络管理和监督是必要的。首先,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人员管理,如制定《电子阅览室管理规定》《电子阅览室关于加强互联网访问管理的规定》等规章制度,同时需要工作人员加强对电子阅览室的巡视和管理,对违反管理规定的读者进行批评教育,严重者可取消其阅览资格;其次,通过上网行为管理等信息技术手段,制定电子阅览室互联网访问策略,设置网络名录白名单和黑名单,防控不良的互联网访问行为,使电子阅览室成为绿色、健康、安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再次,建立上网审计制度。“互联网+”环境下,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中加强网络信息安全非常必要,也是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在电子阅览室上机必须实行实名登记并和机器号关联,建立网络访问日志,通过日志审计追溯读者访问记录,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信息安全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3.3 构建资源统一检索平台

公共电子阅览室与经营性上网场所的重要区别在于其拥有海量的可供读者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图书馆每年订购数个甚至数十个数据库资源,在电子阅览室供读者免费检索、浏览、下载。但因各数据库资源的软件平台不同,检索入口也不尽相同,读者检索一条信息,需要打开多个软件平台,输入检索条件进行检索,操作不便捷。建设数字资源统一检索平台,

整合多种数字资源数据库,为读者提供“一框式”检索、跨数据库平台检索,方便读者进行信息资源检索,极大地提高用户体验,进一步提高资源检索的便利性。

3.4 按需划分功能区域

传统电子阅览室建设时主要考虑读者的上机、网上冲浪、信息检索的硬件需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环境的到来,读者群体的需求越来越趋向多元化,传统电子阅览室的建设不能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新型电子阅览室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互联网+”的环境和读者多元化需求,划分数字资源检索区、视听影音区、在线学习区、电子阅览区以及数字资源体验区等功能区域,针对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必要的基础硬件设施建设,如配置专用影音设备、在线学习平台和无线网络环境等,充分考虑功能区域读者操作的便利性、使用的人性化和良好的用户体验。

电子阅览室可在满足读者多元化需求的同时,在阅览室空间环境上借鉴国内独立书店的装饰装修风格,对阅览环境进行现代简约风格装饰,既节约了公共资源,也给读者营造了温馨舒适的电子阅览环境。

4 转变服务方式

4.1 加强数字资源推广服务

电子阅览室作为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产物,其为读者提供了优质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是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重要服务阵地。随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深入开展,公共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需要根据

本馆数字资源的特点,从读者阅读需求出发,面向不同读者群体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开展数字资源宣传和推广工作,如在职人员的期刊论文查询、未成年人的科普视频宣讲、学龄儿童的国学和英语资源学习以及社会人员的在职培训教育等,促进数字资源推广服务。

4.2 积极开展读者培训

在当前“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的等待读者上门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开展读者培训活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是当前图书馆服务方式转变的主要形式之一。电子阅览室既具备开展培训活动的基础硬件条件,也具备开展培训活动的专业人员。开展读者培训活动将会是电子阅览室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为达到良好的实际培训效果,电子阅览室不仅要配置电子教室软件、音响扩音系统、实时投影一体化设施、移动终端无线网接入等硬件设施,而且这些硬件设施需具备良好的用户体验。

5 结语

本文以“互联网+”环境为背景,对新型电子阅览室的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阅览室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不断更新升级,同时为读者多元化需求提供技术支持。随着读者需求多元化发展,电子阅览室的服务方式势必随之发生改变。新型电子阅览室将是以读者需求为出发点、新型信息技术为支撑、数字资源为服务内容、主动宣传为服务方式、安全制度为保障措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

参考文献:

- [1] 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意见 文财发〔2011〕5号[EB/OL].(2011-02-14)[2017-01-22].http://www.gov.cn/jwqk/2011-02/14/content_1803021.htm.
- [2] 武惠芳.浅析基层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发展[J].晋图学刊,2013(1):64-66.
- [3] 钟远薪.图书馆云桌面应用浅识[J].图书馆论坛,2014(6):106-111.

作者简介:梅国栋(1981—),男,合肥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建设和发展。

收稿日期:2017-05-17

国际图书情报学发展态势研究 (2013—2017)*

——基于19种高影响力外文期刊的计量研究

朱红艳 都平平 邓志文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文章以SCI、SSC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应用CiteSpaceⅢ引文网络分析工具,对2013—2017年来国际图书情报学科领域的19种高影响力期刊所刊载的6 089篇文章,从作者、国家/地区、机构、学科分布、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进行分析,探索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图书情报学; 文献计量; Cite Space; 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Recent Five Years—A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19 Foreign Journals with High Impact

Abstract Based on SCI and SSCI databases,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Ⅲ citation network analysis tool to analyze the 6 089 articles published in 19 foreign journals with high impact during 2013 to 2017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author, country / region, organization, subject distribution,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recent five years.

Key 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ibliometric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近年来,国内外多位学者对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得出了研究发现和结论。如H.D.White和K.W.McCain^[1]、C.M.Chen^[2]等以国际图书情报领域的12种重要期刊为数据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分别对1972—2008年所刊载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对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邱均平^[3-4]、孙坦^[5-6]、叶鹰^[7]等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热点或前沿进行了探测分析。研究者主要基于文献共被引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8]、共词分析等方法,利用信息可视化手段对图书情报研究领域

某一时间段内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展示,探测一定时间段内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主题。为了更好地分析图书情报领域的主题演化新趋势,本文从作者、国家(地区)、机构、学科分布、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几个方面对2013—2017年来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及其研究热点与前沿主题进行分析,希望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高校学科及人才评估体系研究”(课题编号: B-a/2015/01/024)和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机构知识资源知识关联揭示方法与关键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 15YJAB70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利用CiteSpaceⅢ引文网络分析工具对检索结果进行定量统计,通过对文献信息的聚类、可视化,较直观地分析国际图书情报学近5年来的发展态势。

2015年社会科学版期刊引证报告(2015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ocial Edition)中图书情报学专业目录下,共收录86种学术期刊,选取2015年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2.0的19种期刊作为数据源^[2],如表1所示。以这19种期刊的名称为检索词,中间用“or”连接,时间限定为2013—2017年,在SCI、SSCI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共检索出相关文献6 089篇。

表1 “图书情报学”领域19种高影响力期刊

排名	期刊名称	2015年影响因子	主办国家
1	MIS QUARTERLY	5.384	美国
2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775	美国
3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3.541	美国
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3.428	英国
5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3.047	美国
6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3.025	英国
7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892	英国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692	英国
9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595	荷兰
10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522	英国
11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515	美国
1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52	美国
13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373	荷兰
14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261	美国
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2.200	美国
16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163	荷兰
17	SCIENTOMETRICS	2.084	匈牙利
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65	英国
19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3	美国

2 结果分析

我们将从SCI、SSCI中检索得出的6 089篇文献题录利用软件CiteSpaceⅢ进行统计和计量,并以可视化

的形式生成分析结果。

2.1 高影响力作者分析

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可以通过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分别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反映作者的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影响力。从表2、表3可以看出:近5年图书情报学领域的论文合作者中合作频次最高的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Lutz Bornmann;其次为荷兰的Loet Leydesdorff,而且Loet Leydesdorff为近5年来图书情报学领域作者共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共被引频次排在第2的是比利时的Wolfgang Glanzel,作者共被引中心度相对较高的为美国的Claes Fornell和Fred D.Davis两位作者。可见,近5年美国在图书情报研究领域中处于中心地位。

表2 高发文量作者名单(Top 10)

排名	作者	作者单位及国家	合作发文量/篇	占合作总发文量百分比/%
1	Lutz Bornmann	Max Planck Gesell, Germany	49	0.805
2	Loet Leydesdorff	Univ Amsterdam, Netherlands	38	0.624
3	Mike Thelwall	Wolverhampton Univ, England	36	0.591
4	Giovanni Abramo	Natl Res Council Italy, Italy	34	0.558
5	Ciriaco Andrea D'Angelo	Univ Roma Tor Vergata, Italy	33	0.542
6	Ronald Rousseau	Univ Antwerp, IBW	25	0.411
7	David W. Bates	Univ Durham, England	23	0.378
8	MuHsuan Huang	Natl Taiwan Univ, Taiwan	21	0.345
9	Paul Benjamin Lowry	City Univ Hong Kong, Peoples R China	20	0.328
10	Joshua C. Denny	Vanderbilt Univ, USA	18	0.299

表3 高被引频次作者名单(Top 10)

排名	作者	作者单位及国家	被引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Loet Leydesdorff	Univ Amsterdam, Netherlands	414	0.01
2	Wolfgang Glanzel	Katholieke Univ Leuven, Belgium	396	0.06
3	Viswanath Venkatesh	Univ Arkansas, USA	394	0.18
4	Claes Fornell	Michigan Univ, USA	372	0.25
5	Lutz Bornmann	Max Planck Gesell, Germany	354	0.01
6	Eugene Garfield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USA	340	0.02
7	David Gefen	Drexel Univ, USA	323	0.07
8	Fred D.Davis	Arkansas Univ, USA	308	0.21
9	Leo Egghe	Limburgs Univ, Belgium	290	0.01
10	Jamie Hirsch	Columbia Univ, USA	278	0.03

2.2 国家(地区)、机构发文分析

利用CiteSpaceⅢ软件对国家(地区)、机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学科领域位于前10名的高产国家或地区分别为:美国、中国大陆、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发文量最多的是美国,其次为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一半以上,发文百分比合计为53.59%。图书情报学科领域位于前10名的高产机构是:印第安那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范德比尔特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威斯康星大学。其中美国的印第安那大学发文突增性值为3.06,说明印第安那大学近5年来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力量相对较强。

表4 国家/地区、机构发文统计(Top 10)

排名	高产国家/地区		高产机构			
	国家	发文量	发文百分比/%	机构	发文量	突增性
1	USA	2 484	40.80	Indiana Univ	68	3.06
2	PEOPLES R CHINA	779	12.79	Wuhan Univ	66	—
3	ENGLAND	390	6.41	Chinese Acad Sci	64	—
4	GERMANY	293	4.81	Vanderbilt Univ	61	—
5	SPAIN	286	4.70	City Univ Hong Kong	58	—
6	NETHERLANDS	270	4.43	Univ Amsterdam	56	—
7	CANADA	264	4.34	Natl Univ Singapore	55	—
8	SOUTH KOREA	256	4.20	Univ N Carolina	52	—
9	TAIWAN	245	4.02	Michigan State Univ	49	—
10	AUSTRALIA	231	3.79	Univ Wisconsin	47	—

2.3 学科分布状况分析

将网络节点选为Category,其它条件不变,运行CiteSpaceⅢ软件,得到近5年来国际图书情报学科Wos分类的共现情况,如表5所示。主要分布在以下10类:图书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管理学(MANAGEMENT)、经济与商业学(BUSINESS & ECONOMICS)、医学信息学(MEDICAL INFORMATICS)、卫生保健科学与服务(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通信(COMMUNICATION)、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地理学(GEOGRAPHY)及教育与教育研究(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其中计算机科学的中心度最高,为

1.11,说明计算机科学近5年来在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表5 学科分布(Top 10)

排名	学科	频次	中心度
1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	6 089	0.39
2	COMPUTER SCIENCE	4 060	1.11
3	MANAGEMENT	1 016	0
4	BUSINESS & ECONOMICS	1 016	0
5	MEDICAL INFORMATICS	770	0
6	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	770	0
7	COMMUNICATION	709	0
8	PHYSICAL GEOGRAPHY	518	0
9	GEOGRAPHY	518	0
10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68	0

2.4 研究热点、前沿分析

2.4.1 研究热点分析

主题词或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献核心内容的精炼,因此,如果某一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则可反映出该主题词或关键词所表现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将前文确定的6 089条数据源导入CiteSpaceⅢ中,网络节点为名词短语(Term)和关键词(Key Word),选择适当的阈值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到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1)及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见表6)。

表6 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

排序	高频关键词		排序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频次		关键词名称	中心性
1	impact	559	1	impact	0.62
2	science	520	2	online	0.54
3	model	511	3	media	0.44
4	performance	445	4	information-technology	0.41
5	technology	433	5	science	0.33
6	information	382	6	perspective	0.15
7	systems	349	7	socialcapital	0.14
8	information-technology	330	8	satisfaction	0.13
9	management	325	9	trust	0.12
10	perspective	319	10	innovation	0.09
11	communication	299	11	technology	0.08
12	internet	297	12	model	0.07
13	innovation	283	13	acceptance	0.07
14	knowledge	260	14	performance	0.06
15	behavior	257	15	indicators	0.06
16	networks	238	16	antecedents	0.06
17	bibliometrics	234	17	gratifications	0.06
18	socialmedia	234	18	systems	0.02
19	quality	219	19	internet	0.02
20	collaboration	207	20	useracceptance	0.02

参考文献:

- [1] WHITE H D, MCCAIN K W. Visualizing a Discipline: An 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72—1975[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49(4): 327—355.
- [2] CHEN C M, IBEKWE S, HOU J H.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ocitation Clusters: a Multiple-Perspective Co-Cit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 61(7): 1386—1409.
- [3] 邱均平, 温芳芳. 近5年来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基于13种高影响力外文期刊的计量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2): 51—60.
- [4] 邱均平, 吕红. 近5年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前沿及其知识基础: 基于17种外文期刊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 2013(3): 4—15, 58.
- [5] 孙坦, 黄国彬, 周静怡. 2007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J]. 图书馆建设, 2009(1): 2—6.
- [6] 孙坦, 黄国彬, 盛小平, 等. 2008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J]. 图书馆建设, 2010(1): 23—35.
- [7] 叶鹰. 图书情报学前沿研究领域选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 34(4): 63—70.
- [8] 宋艳辉, 武夷山. 基于作者文献耦合分析的情报学知识结构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1): 117—123.
- [9] GIRVAN M, NEWMAN M E J. Community Structure in Social and Biological Networks[C].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2(99): 8271—8276.

作者简介: 朱红艳(1969—), 女, 理学硕士,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 都平平(1965—), 女, 工学博士,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 邓志文(1982—), 男, 工学硕士,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计量。

收稿日期: 2017-07-18

(上接第26页)

- [9] 2016中国数字阅读行业研究报告[EB/OL]. [2017-06-20]. <http://www.docin.com/p-1955709963.html>.
- [10] 中国证券网[EB/OL]. [2017-03-31]. <http://www.cnstock.com/>.
- [11] 王筱雯. 辽宁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构建研究[J]. 图书馆学刊, 2017(7): 1.
- [12] 郑美玉, 刘田. 大数据视角下高校图书馆联盟服务创新探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7(7): 1.
- [13] 潘松华, 孙素云, 吴小玲. 图书馆联盟利益均衡机制构建研究: 基于江苏高校图书馆区域联盟的实例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24): 11—18.
- [14] 井春兰. 清远文献信息资源一体化工程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1(14): 43—47.
- [15] 胡泳. 自由时间的力量[J]. IT经理世界, 2011(23): 28.
- [16] 李剑. 微信公众平台在阅读推广中的应用分析: 以广东省高校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研究, 2015(4): 92—96.
- [17] 黄馨. 清职院向连南捐赠“清远排瑶文化数据库”[N]. 清远日报, 2016-12-14(A05).

作者简介: 井春兰(1963—), 女,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收稿日期: 2017-09-01

· 知识管理与服务 ·

基于 H 指数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教育现状分析

徐芳 何雯卓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文章从H指数的角度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硕士点教育现状进行分析:以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计算了46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的机构H指数和机构H指数排名前8的硕士生导师个人H指数。分析了机构H指数与个人H指数两者间的关系,得出机构H指数高的硕士点,导师个人H指数未必高;个人H指数普遍较高的硕士点,其机构H指数也会高;个人H指数不高但单篇文章引用率高的硕士生导师对机构H指数具有贡献;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不多但合作发文很多的硕士生导师个人H指数不高等结论,为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教育现状的整体情况分析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机构H指数; 个人H指数

中图分类号: G250.13; G40-051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aster Education in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Based on H index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aster education in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based on H index. taking the CNKI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the authors calculate the institutional H index of the top 46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master education and the master tutor's personal H index of the top 8 of the institutional H index.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H index and the master tutor's personal H index is analyzed, 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For example, the higher the master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H index does not mean the higher the tutor's personal H index, the commonly higher of the tutor's personal H index means the higher of the institutional H index, the master tutors whose personal H index is low but with a high single paper citation rate are contributive to the institutional H index, and the more the number of cooperation publish papers but the less the number of papers by first author means the low of personal H index. The authors provide a new way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H index; tutor's personal H index

1 引言

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教育现状的分析,不但可以为培养单位在修订硕士培养方案、设置课程体系时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而且可以为有志于报考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的本科生选择学校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的教育

现状分析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3]。文献调查表明,目前关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现状的研究主要有:中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教育比较与分析^[4-6]、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调查与分析^[7]、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术型硕士与MLIS的比较与分析^[8-9]、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学位论文计量分析^[10]、一级学科硕士点申报材料视角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教育现状与研究新动向分析^[11]、

国外图书情报专业(LIS)硕士教育分析^[12-13]、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课程设置^[14]、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就业情况分析^[15]等。可见,目前关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的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研究的视角也比较丰富多样,鲜有研究从H指数的角度对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现状进行分析。

2005年,赫希提出H指数的概念,它结合学者论文总数以及相应的被引频次,利用多项指标综合考量学者的科研质量。它的具体涵义是:一个科学家的分值为h,当且仅当在他(她)发表的N篇论文中有n篇论文每篇获得了不少于n次的引文数,科学家剩下的(N-n)篇论文中每篇论文的引文数都小于n次,且当论文数为(H+1)的数值不小于其对应的被引次数。例如:如果一个科研人员的H指数为7,那就意味着他发了7篇以上的文章,并且这些文章至少都被引用了7次以上。

H指数提出的初衷是用于评价科学家个人的科研绩效,但随着对H指数统计方法的实践分析,H指数统计法也在不断成熟。作为目前考量学者学术水平的评价指标,H指数已不仅仅应用于个体科研工作者,还可以应用于机构、团队、地区乃至国家层面。H指数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2期刊出了叶鹰教授课题组的5篇H指数研究的系列成果,叶教授还出版了《H指数与H型指数的研究》专著^[16];万锦堃通过对《中华医学杂志》的H指数计算并分析整合影响H指数的各种因素,指出在期刊评价中可将H指数和影响因子互补使用,提升客观科学性^[17];官建成和高霞尝试将H指数引入到专利分析中,他们通过对1996年至2005年的半导体领域内专利最多的20个机构数据的分析,发现H指数比专利数、被引用数、平均规模等衡量指标更能对技术进行有效评价^[18]等。本研究选择CNKI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计算了我国46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的H指数,对排名前8的机构内硕士生导师个人的H指数进行统计。最后,对机构H指数和个人H指数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教育现状的整体情况分析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CNKI期刊数据库是目前收录期刊较为全面的数据库,同时CNKI数据库的中国引文数据库能够提供每篇期刊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而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正是计算H指数必须的两个条件。数据检索日期为2017年3月。

机构H指数计算数据来源:首先选择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在“高级检索”界面的学科领域勾选“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与“档案学、档案事业”,作者单位选填机构名称;其次,按照H指数的定义,将各机构论文显示的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因为每篇论文编号都对应着该篇论文相应的被引频次,按照“论文编号 \geq 被引频次”的条件往下浏览检索结果;然后,检索到符合条件的论文时,该篇论文对应的顺序编号即为此机构的H指数。

个人H指数计算数据来源:首先,进入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设置检索条件,选择好相应学科领域和作者单位,作者按第一作者检索(本研究采取排除合作者因素的计算方法);然后,将检索结果按“被引”降序排列;最后,获取个人H指数,即选取当“论文编号 \geq 被引频次”的那个数值。

3 分析过程和结果

3.1 机构H指数

根据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里面获取的数据,本研究计算出我国46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的H指数,如表1所示(按降序排列)。

由表1可知,H指数排名前10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分别是: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黑龙江大学。

3.2 个人H指数

根据表1所列出的46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的H指数情况,对排名前8的机构内硕士生导师个人的H指数进行统计。选择每所机构发文总量由高至低排名前5位的硕士生导师学者进行检索,获取其H指数。

3.2.1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如表2所示。

表1 46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的H指数

排名	单位名称	机构H指数	排名	单位名称	机构H指数
1	武汉大学	75	24	河北大学	27
2	北京大学	68	25	中南大学	27
3	南京大学	55	26	吉林大学	26
4	中山大学	55	27	南京农业大学	25
5	南开大学	47	28	辽宁师范大学	24
6	浙江大学	46	29	安徽大学	23
7	中国人民大学	44	30	福建师范大学	23
8	华东师范大学	42	31	华中科技大学	22
9	上海交通大学	40	32	东南大学	22
10	黑龙江大学	39	33	南京理工大学	20
11	四川大学	37	34	重庆大学	19
12	北京师范大学	35	35	南昌大学	18
13	湘潭大学	35	36	江苏大学	18
14	上海大学	33	37	云南大学	18
15	郑州大学	31	38	西北大学	18
16	华南师范大学	29	39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7
17	山西大学	28	40	辽宁大学	17
18	东北师范大学	28	41	北京理工大学	16
19	山东大学	28	42	中国农业大学	15
20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8	43	广西民族大学	13
21	华中师范大学	27	44	中国中医科学院	9
22	苏州大学	27	45	中国科学院大学	9
23	南京政治学院	27	46	北京协和医学院	6

表2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该篇获取H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期
邱均平	38	225/259	87	替代计量学的提出过程与研究进展	图书情报工作	2003/19
黄宗忠	29	89/92	97	论图书馆转型期及其任务——走向图书馆新时代(上)	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3/03
肖希明	21	105/141	74	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绩效评估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原则	图书情报工作	2009/19
黄如花	18	81/111	73	网上电子期刊的利用	图书情报工作	2001/12
刘家真	17	81/112	72	数字图书馆的生命线:数字信息归档系统	图书馆杂志	1999/04

3.2.2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如表3所示。

表3 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该篇获取H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期
李国新	25	63/70	90	日本图书馆员专业职务制度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5/03
吴慰慈	23	75/85	88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郑州大学学报	2003/01
刘兹恒	20	97/126	77	我国农村图书馆持续发展的可行措施——图书馆基金会	图书馆论坛	2009/06
王子舟	16	54/67	81	学术创新必先从事学术史研究入手	图书情报工作	2007/03
肖珑	15	25/47	53	高校图书馆战略发展规划制定的案例研究	图书馆建设	2011/10

3.2.3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如表4所示。

表4 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该篇获取H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期
叶继元	16	61/86	71	图书情报学(LIS)核心内容及其人才培养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06
苏新宁	14	37/72	51	音像资料的MARC格式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03
华薇娜	12	40/117	34	美国联邦政府部门CIO面面观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2/01
郑建明	9	30/128	23	知识图书馆理念及其在事业发展中的实现	图书情报工作	2004/11
倪波	8	45/82	55	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的重要前沿与新形势	图书情报工作	1995/01

3.2.4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如表5所示。

表 5 中山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 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 / 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 %	该篇获取 H 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 / 期
程焕文	21	91/100	91	近年来中国大陆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走向的思考	图书馆建设	2002/05
黄晓斌	20	83/101	82	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几个管理问题	图书馆学研究	2008/03
曹树金	13	46/69	67	DDC、UDC 网络化对《中图法》发展的启示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8/02
肖永英	13	36/43	84	网络环境下参考馆员职业倦怠现象初探	图书馆情报工作	2006/02
谭祥金	13	36/37	97	甘为人梯的服务精神——在“刘少雄先生为中山大学图书馆服务 60 周年暨 80 华诞庆祝大会”上的发言	图书馆论坛	2003/01

3.2.5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如表 6 所示。

表 6 南开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 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 / 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 %	该篇获取 H 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 / 期
柯平	25	121/158	77	国外图书馆管理研究述评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05
王知津	22	207/211	98	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结构与特征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2/05
于良芝	18	36/42	86	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与认识盲点——对公共图书馆评估总结材料的话语分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9/04
徐建华	13	48/74	65	图书馆核心员工离职行为对图书馆创新能力影响研究	图书与情报	2008/03
杨子竞	7	27/33	81	企业改革与图书馆信息服务	图书馆杂志	1997/03

3.2.6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如表 7 所示。

表 7 浙江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 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 / 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 %	该篇获取 H 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 / 期
叶鹰	15	36/59	61	图书情报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探讨	图书馆情报工作	2006/04
傅荣校	15	75/83	90	基于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城建档案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浙江档案	2009/01
赵继海	14	19/20	95	DOI 系统的发展及其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	图书馆情报工作	2004/04
李超平	13	45/49	92	中国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06
金更达	12	29/38	76	国外电子文件元数据标准简介	浙江档案	2004/11

3.2.7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如表 8 所示。

表 8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 (Top 5)

硕士生导师	H 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 / 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 %	该篇获取 H 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 / 期
冯惠玲	20	66/68	97	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特点	档案学通讯	2009/05
黄霄羽	15	96/102	94	美国商业性文件中心 IRONMOUNTAIN 的运作模式分析及启示	北京档案	2007/11
刘越男	13	42/51	82	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实施过程中元数据方案的设计	档案学研究	2012/02
安小米	13	51/75	68	我国科技计划项目档案管理研究	山西档案	2007/04
王英玮	10	47/50	94	试论全宗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档案学通讯	1994/05

3.2.8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 H 指数如表 9 所示。

表9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生导师的个人H指数(Top 5)

硕士生导师	H指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发文总数	第一作者发文数占比/%	该篇获取H指数的文章题名	发表期刊	年/期
范并思	30	81/100	81	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包容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0/02
胡小菁	12	28/38	74	RDA的国际化设计与本地化实施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3/01
金武刚	8	19/23	83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图书馆认同变迁研究——基于《读书》杂志(1979-2009)的文本分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0/04
段宇锋	7	16/21	76	图书情报硕士学位(MLIS)教育发展状况调查报告(2013年)	图书情报知识	2014/01
李国秋	5	24/27	89	社会情报职业需求与情报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基于情报/信息职业问卷调研	图书情报工作	2009/04

4 研究结论

4.1 机构H指数高的硕士点, 导师个人H指数未必高

由表1可知: 所选择的前10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的H指数均在39以上, 而几乎每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硕士点机构内硕士生导师个人的H指数都大大低于对应机构的H指数。可见, 机构H指数高的硕士点学校, 硕士生导师个人H指数未必高。因为可能存在个人H指数不高的硕士生导师单篇论文的被引率很高, 计算机构H指数的时候这些论文会提高机构的H指数。

4.2 个人H指数普遍较高的硕士点, 其机构H指数也会高

考虑到H指数的特点, 我们在获取硕士生导师H指数时, 优先选择发文量高的硕士生导师进行统计。因为发表研究成果多, 相对来说被引用的几率也要大一些, H指数也更有分析意义。本研究计算的H指数排除了合作者与自引因素, 且只计算第一作者, 如此得

出的H指数会更加客观。在计算机构H指数和个人H指数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个人H指数普遍较高的硕士点, 其机构H指数也会高, 这是因为个人H指数高的论文都会出现在机构H指数的论文列表里面。他们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个体H指数越高, 整体的H指数也越高。

4.3 个人H指数不高但单篇文章引用率高的硕士生导师对机构H指数具有贡献

在计算个人H指数和机构H指数时还发现, 除了个人H指数高的硕士生导师对机构H指数有贡献外, 还有部分硕士生导师总的发文量并不多, 但某一篇文章或某几篇的被引率极高, 这对于个人的H指数提高并无太大影响, 但是这些学者存在于机构H指数的有效检索结果内, 甚至居于前列, 因此从整体上提高了所属机构的H指数。可见, 个人H指数不高但单篇文章引用率高的硕士生导师对机构H指数是具有贡献的。

4.4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不多、合作发文很多的硕士生导师个人H指数不高

在计算个人H指数和机构H指数时同时发现, 有些硕士生导师发文量很高, 但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数量却并不多, 大多是与第一作者合作发文, 根据本研究选择的只统计第一作者的规则, 这些合作论文数据被排除在检索范围之外, 这些硕士生导师的H指数就不会太高。

5 结语

H指数的诞生, 为学术科研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综合分析渠道, 其优势在于与传统的引证指标相结合, 避免由于夸大某个指标的作用而导致的评价结果失真与不科学。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H指数本身存在的时间跨度局限性、灵敏度不高、缺乏区分度等缺陷, 本研究计算的机构H指数和个人H指数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缺陷的影响,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科研评价的方法, 应用于硕士研究生教育机构的评价领域, 总体上来讲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彭斐章, 谢灼华. 评建国四十年来的图书馆学教育[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89(3): 110-115.
- [2] 蒋永福, 孙墨. 走向多元化: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培养多元化体系构建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3(2): 1-5.
- [3] 王知津. 90年代后期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J]. 情报资料工作, 2002(1): 73-75.

- [4] 钟伟珍.中英两所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教育现状[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3):56-59.
- [5] 王贲芝,谢阳群.哥本哈根大学的图情教育及对我国图情教育发展的若干启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6(8):139-144.
- [6] 张靖,张祎,黄诗莹.美、英、日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培养中的实践教学与案例教学[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1):88-95.
- [7] 方婧,桂思思,陆伟,等.美国图书情报硕士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调查与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6(2):39-47.
- [8] 尚新丽,张璐.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发展现状比较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3(13):9-12,24.
- [9] 白才进,王红.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探讨[J].图书馆,2012(3):92-94.
- [10] 张戩慧.基于2006—2010年的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5):76-78,83.
- [11] 李坚,刘会平.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建设现状与研究新动向:2010年一级学科硕士点申报材料统计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1(11):39-42.
- [12] 王知津,谢瑶,严贝妮,等.美英图书情报学硕士培养目标、模式及课程设置实例研究[J].图书馆建设,2009(2):82-87.
- [13] 王倩,谢阳群.芬兰坦佩雷大学图书情报教育分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6(6):139-144.
- [14] 郝伟龙,李晓菲.美国高校图情专业硕士生课程设置特点[J].图书情报工作,2012(1):68-72.
- [15] 栗霞,王美芳.21世纪阿尔伯塔大学图书情报学硕士生就业状况及其启示[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5):126-128.
- [16] 叶鹰,唐健辉,赵星.H指数与H型指数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209.
- [17] 万锦堃,花平寰,宋媛媛,等.h指数及其用于学术期刊评价[J].评价与管理,2006(9):1-7.
- [18] JIAN C G,XIA G.Exploring the H-index at Patent Level[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2008,59(13):1-6.

作者简介: 徐芳(1980—),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竞争情报与危机预警、数字图书馆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已发表论文100多篇,参编著作10部;何雯卓(1995—),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图书馆学本科生。

收稿日期: 2017-08-04

(上接第14页)

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的应用与实施要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文化差异。黑龙江省内各地级城市的发展远远比不上苏州、东莞、嘉兴等城市的发展能力与水平,这就充分发挥了“3—1—1”长效发展模式中省级图书馆对于基层偏远服务点的辐射作用。而且,黑龙江省内各区域各民族融合度较高,文化差异较小,“3—1—1”长

效发展模式更易于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公众认知度和全覆盖。

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3—1—1”长效发展模式的提出是针对我国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状而设计的,具有较强的时代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情况的变化,该模式有被完善甚至重新设置的必要和可能。

参考文献:

- [1] 文化[EB/OL].[2017-07-0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CqsFWWh6Yp6FRTNzvf4peo87nl6zfL5myRK8y6idEUiF9SL0mDNmc5s25jjuhLub6ijtj_w9ZmwSnjzeR5A0CEt2d2r0xg_I0x2jkeMN5a.
- [2] 李宏.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与服务[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1):5-11.
- [3]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介绍[EB/OL].[2017-08-01].http://www.ndcnc.gov.cn/gongcheng/jieshao/201212/t20121212_495375.htm.

作者简介: 王政(1983—),女,硕士,黑龙江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阅读推广部副主任,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收稿日期: 2017-08-16

· 知识管理与服务 ·

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研究热点分析

成锡潮 吴景海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以CNKI期刊数据库中近5年(2012—2016年)“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结合互联网研究的499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以及CSSCI期刊论文文献为数据来源,通过对年度发文量分布的统计分析,构建共词矩阵及相异矩阵,并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相异矩阵进行共词分析,发现目前该方向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研究、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结合研究、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4个方面。

关键词:互联网;图书情报学;共词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2.8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Internet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and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NKI journal database as the data source, this paper chooses 499 Chinese core literatures and CSSCI literature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digital libraries combined with Internet researches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2012—2016).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ir external features such as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the paper constructs co-word matrixes and dissimilarity matrixes, conducts co-word analysis of the latter by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s, and discovers that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field focus on mobile terminal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mobile libraries and mobile reading services, combination of libraries and mainstrea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library services.

Key words Interne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word analysis; clustering analysis

1 引言

互联网,又称网际网络,或音译因特网,始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ARPANET),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巨大国际网络。这种将计算机网络互相联接在一起的方法可称作“网络互联”,在这基础上发展出覆盖全世界的全球性互联网络称互联网^[1],即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网络结构。

在中国,互联网的应用已经形成规模,并不断走向多元化。互联网对整个社会进程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深刻,这在人们的学习、工作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

有着越来越多的体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 29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较2015年底提升2.9个百分点^[2]。置言之,仅中国一国的网民数量,已经和欧洲人口总量相当。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之相关的新兴技术和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涌现。“互联网+”、Web2.0、大数据等术语,也越来越和我们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对CNKI期刊数据库中“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下结合互联网研究的文献进行研究,通过对文献的外部特征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揭示互联网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发

展趋势和研究热点,为相关研究方向提供理论参考。

2 文献概况

2.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核心期刊基本占据本领域绝大多数的信息资源^[3],并且CNKI的核心期刊收全率达到99%^[4]。为了更权威、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目前国内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与互联网结合研究的热点和现状,笔者以CNKI期刊数据库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同时为了保证研究内容的时效性,将时间范围限定到近5年,即2012—2016年。以“互联网”为关键词,在信息科技分类下的“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小类中进行检索。排除征稿启事、书讯等非学术文献,同时剔除无关文献和重复的文献后,共得到有效文献499篇。

2.2 年度发文量分布

从近5年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可看出,在该领域“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上发表的与互联网相关的文献呈上升趋势。从图1可看出,2012年仍处于该领域与互联网结合研究的初期,发文量仅32篇;从2013年起,两者的结合研究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并在后续两年内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2016年,相关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核心期刊与CSSCI发文量高达181篇。可知该领域相关研究的热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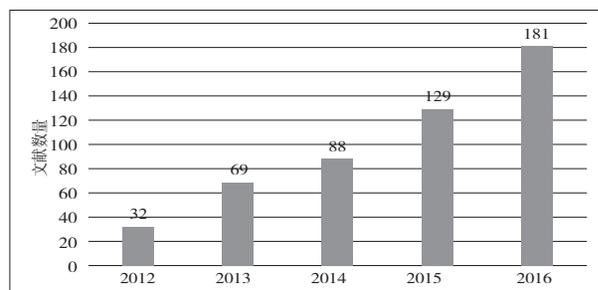


图1 互联网相关文献年度发表数量分布(2012—2016年)

3 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核心思想与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是文章精髓之所在。因此,使用高频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

理论上把握一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使用书目共现系统(Bicomb2.0)对获取的499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以及CSSCI期刊论文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并利用该软件构建共词矩阵,通过将共词矩阵导入Excel并转化为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再用SPSS22.0对相异矩阵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近5年来的研究热点进行归纳分析。

3.1 关键词提取

使用书目共现系统(Bicomb2.0),从499篇文献中共提取关键词1338个,选取词频不少于8次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共得到20个关键词,如表1所示。其中,图书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出现频次越高,说明对其的研究越热门^[5]。

表1 出现频次 ≥ 8 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1	图书馆	91	11	数字图书馆	16
2	互联网+	64	12	移动阅读	14
3	高校图书馆	42	13	数字阅读	13
4	移动互联网	29	14	云计算	12
5	互联网	26	15	移动服务	9
6	移动图书馆	23	16	服务模式	9
7	信息服务	21	17	服务创新	9
8	大数据	21	18	微信	8
9	公共图书馆	20	19	智慧图书馆	8
10	图书馆服务	17	20	手机图书馆	8

3.2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构建

关键词之间共同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使用书目共现系统(Bicomb2.0)对出现频次≥8的20个关键词进行两两配对,构建共词矩阵,形成20×20的矩阵(见表2)。共词矩阵为对称矩阵,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如“互联网+”出现频次为64次,它与“图书馆”共同出现的频次为23次;“互联网”出现频次为26次,它与“移动互联网”共同出现的频次为0次。

表2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部分)

关键词	图书馆	互联网+	高校图书馆	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
图书馆	91	23	0	5	4
互联网+	23	64	6	1	0
高校图书馆	0	6	42	2	3
移动互联网	5	1	2	29	0
互联网	4	0	3	0	26

3.3 标准相关相异矩阵转化

在共词矩阵中,两两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频次,受到两个关键词各自独立出现频次的影响,所以无法体现真实的相依程度。为了消除频次差异带来的影响,引入Ochiai系数,将共词矩阵进行标准化,转换成相关矩阵,以便能更好地反映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实质性共现关系,该系数公式(1)计算如下:

$$Ochial = \frac{N_{i,j}}{\sqrt{N_i \times N_j}} \quad (1)$$

Ochiai系数用来表示关键词i和j共同出现的概率,在公式(1)中,分子 $N_{i,j}$ 表示关键词i和j共同出现的频次, N_i 、 N_j 分别表示关键词i、j各自独立出现的频次。如“图书馆”和“移动互联网”共同出现的频次为5,“图书馆”出现的频次为91,“移动互联网”出现的频次为29,则“图书馆”和“移动互联网”的Ochiai = $5 / (91 \times 29)^{1/2} = 0.0973$ 。表3为利用Excel计算得到的高频关键词标准化后的共词相关矩阵(部分)。

表3 高频关键词标准化后的共词相关矩阵(部分)

关键词	图书馆	互联网+	高校图书馆	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
图书馆	1	0.3014	0	0.0973	0.0822
互联网+	0.3014	1	0.1157	0.0232	0
高校图书馆	0	0.1157	1	0.0573	0.0908
移动互联网	0.0973	0.0232	0.0573	1	0
互联网	0.0822	0	0.0908	0	1

相关矩阵中数值越大,表明对应的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即相似度越高。对角线上的数据表示该关键词与自身的相关程度,因此计算均为1。但由于相关矩阵中计算所得的0值过多,统计时容易造成误差。为便于下一步的分析工作,将“1”与全部相关矩阵数值相减,得到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该矩阵表示两个关键词相异程度。如“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相异系数 $=1-0=1$;“图书馆”和“互联网+”的相异系数 $=1-0.3014=0.6986$ 。与相关矩阵相反,相异矩阵中数值越小,表明两两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即相似度越高。表4为利用Excel计算得到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相异矩阵(部分)。

表4 高频关键词标准化后的共词相异矩阵(部分)

关键词	图书馆	互联网+	高校图书馆	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
图书馆	0	0.6986	1	0.9027	0.9178
互联网+	0.6986	0	0.8843	0.9768	1
高校图书馆	1	0.8843	0	0.9427	0.9092
移动互联网	0.9027	0.9768	0.9427	0	1
互联网	0.9178	1	0.9092	1	0

3.4 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是共词分析的核心过程。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之间隐含的类群关系,并对此进行分析,得出该研究领域内热点研究主题的组成状况,并分析其最新研究发展趋势。

3.4.1 因子分析

将相异矩阵导入数据分析软件SPSS22.0,选取“降维”中“因子分析”方法分类下的“主成分法”进行分析。高频关键词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高频关键词总方差解释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2.275	11.376	11.376	2.275	11.376	11.376
2	1.868	9.342	20.718	1.868	9.342	20.718
3	1.752	8.761	29.479	1.752	8.761	29.479
4	1.502	7.512	36.991	1.502	7.512	36.991
5	1.418	7.092	44.083	1.418	7.092	44.083
6	1.350	6.748	50.831	1.350	6.748	50.831
7	1.318	6.591	57.422	1.318	6.591	57.422
8	1.093	5.466	62.888	1.093	5.466	62.888
9	1.054	5.272	68.160	1.054	5.272	68.160
10	1.008	5.041	73.201	1.008	5.041	73.201
11	.946	4.728	77.929	-	-	-
12	.859	4.295	82.225	-	-	-
13	.762	3.811	86.036	-	-	-
14	.609	3.043	89.079	-	-	-
15	.586	2.930	92.009	-	-	-
16	.463	2.316	94.326	-	-	-
17	.435	2.173	96.499	-	-	-
18	.400	2.001	98.500	-	-	-
19	.300	1.500	100.000	-	-	-
20	-7.222E-16	-3.611E-15	100.000	-	-	-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因子累积方差解释贡献率为73.201%的10个因子被提取,即本文研究的20个高频关键词,划分为10个类别可以解释该领域73.201%的信息。但10个类别过于分散,借助碎石图(见图2)可以发现,前4个因子曲线较陡。因此可从高频关键词中提取4个因子,为聚类分析提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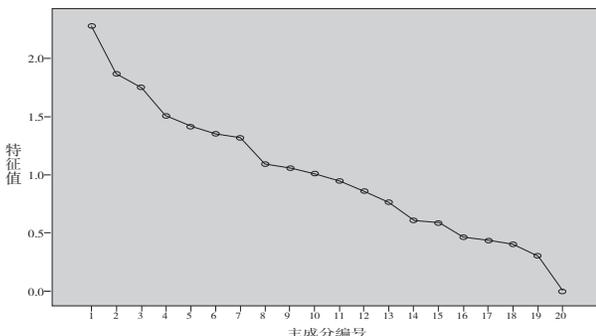


图2 主成分分析碎石图

3.4.2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依据共词矩阵中两两关键词之间距离的远近,将数据分为若干个类别,将距离较近的关键词聚集起来,使得同一类别内的数据具有尽量小的差异,不同类别间具有尽量大的差异。用SPSS22.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方法为“组间联接”,度量标准区间为“平方欧式距离”,分群方式为“个案”。该方法可以充分利用个体与小类之间所有距离的信息,从而改善极端值对结果造成的影响。

聚类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树状图。如图3所示,可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分为4类: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研究(聚类1)、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聚类2)、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结合研究(聚类3)、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聚类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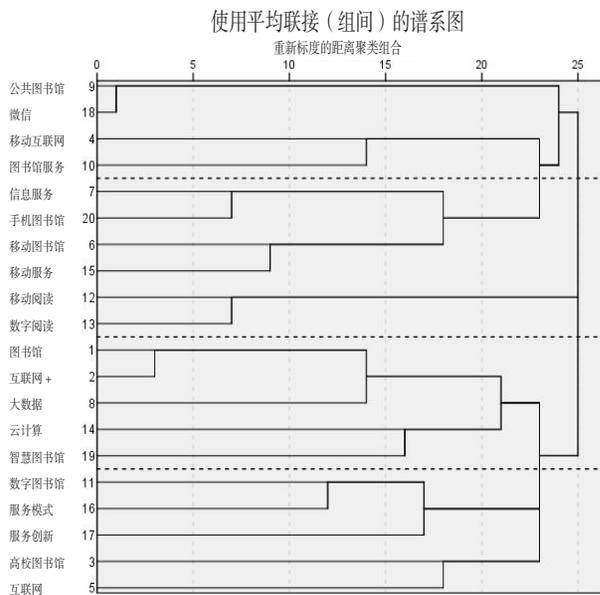


图3 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4 研究热点领域分析

基于以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结合互联网研究的文献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可知近5年该研究方向的研究热点聚焦于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研究、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结合研究、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4个领域,其简要分析如下。

4.1 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研究

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研究,包括关键词公共图书馆(9)、微信(18)、移动互联网(4)、图书馆服务

(10)。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移动设备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互联网入口之一。基于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的特性和技术,手机APP的功能也向着多元化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和知识的组织者,一直以来都在为提升用户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体验,进行着孜孜以求的努力,这体现在推进公共图书馆资源的一站式获取、图书馆信息产品智慧化等方面。所以,图书馆如何借助移动平台,使自身的服务得到良好的延伸,把图书馆知识传播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微信自2011年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公共图书馆这一传统社会服务机构的重视,通过开设公众号来进行信息推送、在线阅读、预约续借、情感交互等服务。据张丹丹等学者的调查统计发现,早在2014年12月,全国31家省级图书馆和38所985高校图书馆开通了微信公众号^[6]。目前,对图书馆和微信平台的结合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随着微信平台的不断更新、微信小程序的发布以及读者需求的不断变化,这一领域依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4.2 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

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包括关键词信息服务(7)、手机图书馆(20)、移动图书馆(6)、移动服务(15)、移动阅读(12)和数字阅读(13)。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可以享受阅读的时间几乎被挤压殆尽。在这种形势下,移动阅读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移动阅读发挥了手机等移动设备便携的特性,可以充分利用大众碎片化的时间,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目前图书情报界对移动阅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阅读的用户体验方面以及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方面。

另一方面,目前移动阅读的资源一般来自各大网络阅读平台。公共图书馆空有海量阅读资源,却缺少成熟的移动阅读解决方案。随着4G通讯技术的成熟以及5G通讯标准的制定,加上适合移动端的HTML5技术的发展,移动图书馆的建设门槛越来越低。黄辉、徐俊等学者也都曾对4G网络环境下移动图书馆和移动阅读的服务模式进行了相关的探究^[7-8]。因此,移动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公共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的更新,也是当前图书情报界值得关注的研究热点。

4.3 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结合研究

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结合研究,包括关键词图

图书馆(1)、互联网+(2)、大数据(8)、云计算(14)和智慧图书馆(19)。“互联网+”是当今创新2.0环境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所演变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9]。大数据技术则是以日渐成熟的“云计算”技术为基础,利用新处理模式所获得的具有更强决策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三者都是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全新产物,蕴含了互联网时代新的思维模式和事物处理方式。因此,这三者在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毫无疑问的热点,图书情报领域也不例外。目前热门的“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就是以互联网+的思维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的先进技术作为坚实基础,去解决日益庞大的数据量与日益复杂的读者需求这一对核心矛盾,让图书馆拥有自己的“智慧”。所以,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的结合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发展意义。

4.4 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

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包括关键词数字图书馆

(11)、服务模式(16)、服务创新(17)、高校图书馆(3)和互联网(5)。数字图书馆,通俗的说就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它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且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中心。它借鉴和利用传统图书馆的资源组织模式、利用发达的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存取人类知识为目标,运用知识分类、精准检索等技术手段,有效而合理地对信息进行整序,使人们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地获取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除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外,其核心研究要点对它的服务模式的研究和创新。如何更加合理地安排数字图书馆的内容,如何让读者能够更加高效地获取所需的知识,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如何使读者得到更多的收获,这都是对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的考验。同时,高校图书馆的读者主要为在校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因此从高校图书馆着手研究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

参考文献:

- [1] 顾佳华.把握互联网脉搏 创造发展新速度[J].福建质量管理,2016(2):3.
- [2]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1-22].http://www.cac.gov.cn/2017-01/22/c_1120352022.htm.
- [3] 刘振华.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哈尔滨市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情况调查的实证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9(5):68-69,72.
- [4] 徐以鸿,朱涛.机构知识库内容快速建设方法[J].现代情报,2011(4):148-151.
- [5] 朱晋伟,邹玲.基于关键词共现聚类的战略管理研究热点分析[J].现代情报,2015(10):111-116.
- [6] 张丹丹,杨思洛,邢文明.基于微信平台的图书馆服务研究:以省级公共图书馆和985高校图书馆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1):59-63.
- [7] 黄辉.基于4G技术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探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5(2):84-87.
- [8] 徐俊,曹霞.基于4G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S1):141-144.
- [9] 互联网+:在融合中“拯救”在创新中“颠覆”[J].办公自动化,2015(8):10-11.

作者简介: 成锡潮(1993—),男,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据分析;吴景海(1965—),男,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技术与信息系统。

收稿日期: 2017-06-14

顶层设计文献视角下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框架探析

李子峰

(山西省图书馆 山西太原 030021)

摘要: 2012年以来,涉及全民阅读的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政策、法律、规划陆续出台,全民阅读顶层设计不断向纵深推进。2016年底,《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发布,正式提出在“十三五”期末要形成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文章在梳理这些顶层设计文献的基础上,以3个代表性文献为依据,结合当前国内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勾画出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基本体系框架。

关键词: 全民阅读;顶层设计文献;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框架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An Exploration of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ystem Framework in Literatures on Top-level Design

Abstract Since 2012, a series of national policies, laws and plans on nationwide reading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nationwide reading has been improved in depth. At the end of 2016,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Nationwide Reading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was issued, officially annou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by the end of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is paper, after summarizing these literatures on top-level design, takes three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considering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then outlines basic elements and the system framework of the nationwid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nationwide reading; top-level design literatur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framework

1 引言

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阅读推广委员会。200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至今,我国阅读推广已走过了10余年的历程。阅读推广服务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图书馆间迅猛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新一轮发展与变革的新引擎。与此同时,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已初步形成百家争鸣的理论研究局面^[1]。理论流派各有千秋、各有所衷,流派的形成是行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2016年底,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发布^[2],正式提出在“十三五”期末要形成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在此前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发布一系列涉及全民阅读的国家级重大政策、法律、规划,全民阅读顶层设计格局开始形成。这些设计关于全民阅读推广服务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中有3个代表性文献与“全民阅读”关系最为紧密,可据此初步探索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基本体系框架。

2 全民阅读顶层设计概况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历史性地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在多次讲话中提到

阅读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倡导全民阅读”连续3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倡导全民阅读”升格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文件,从文化改革、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多角度对全民阅读提出明确要求^[3]。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全民阅读“七进”工作。2016年至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两次对外公开征求意见^[4],全民阅读立法又向前推进一步;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仍然要求“推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工程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标志着全民阅读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5]。201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文保法》)、《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等相继出台,标志着全民阅读顶层设计更加规范化、体系化、机制化。笔者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重大文献进行汇总(见表1)。

这些涉及“全民阅读”的重大文献,都是由党中央和国家级机关发布或审核通过的,当视作“全民阅读”的顶层设计,其中将“保障阅读权利”“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作为推动全民阅读的根本目标。但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而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根本之策、普适之法。全民阅读所要实现的一切根本目标都要依赖这个体系、凭借这个体系来实现完成。

3 全民阅读 3 个顶层设计文献的梳理归纳

3.1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3.1.1 背景及意义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明确提出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的建议。建议认为,为全民阅读立法,就

表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关于“全民阅读”的重大文献一览表

顶层设计文献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 / 通过会议 / 机构	全民阅读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012年11月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2014年—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工作报告》	每年3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会议	倡导全民阅读、大力推动全民阅读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2015年1月14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推动全民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2016年1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	支持全民阅读、阅读服务、书报阅读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2016年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阅读推广活动人才、机构、服务体系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的通知》	2017年1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指导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2017年1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阅读权益保障、阅读设施建设、阅读服务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017年1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2017年2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图书馆、阅读服务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	2017年3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阅读设施、阅读条件、阅读活动、阅读氛围

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确定政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责任主体。

随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始组织起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后于2013年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立法相关规划,并反复调研国内外经验,征求各界意见,直接推动了地方性法规的出台。湖北开全国之先河,其后江苏、辽宁、深圳、四川等地争相接棒^[6]。

2016年2月,酝酿3年之久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首次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引起广泛关注,这表明我国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进程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7]。2017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烈讨论全民阅读,积极推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尽快出台。两会结束不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再次发出征集意见的通知。虽然目前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但是通过梳理两次意见稿及其条文不难发现,其明确了政府在推动阅读中的主体责任,借鉴了其他国家促进阅读的基本法理,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雏形已经显现。

3.1.2 条文梳理归纳

《意见稿》共5章32条,包括总则、全民阅读开展、全民阅读保障、法律责任和附则^[6]。通过梳理第二次《意见稿》全文内容及其中高频关键词,可导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实践思路。

《意见稿》发布,是致力于阅读推广的各类人群、各级机构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从表2、表3可以发现:优化全民阅读设施设备条件,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是上至国家、下至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将全民阅读上升到各级政府的施政层面,体现了阅读推广从基层到顶层、从民间到政府、自下而上、由简入深的推动历程。阅读推广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机制,符合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内在逻辑。

3.1.3 《意见稿》中体现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保障机制

第二次发布《意见稿》,特点更加突出:①区分全民阅读以及全民阅读工作的内涵;②突出政府主导原则,强调政府推动全民阅读的主体责任;③强调社会参与原则,“政府+X”全民阅读推广模式初步显现;④阅读推广的宏观体系初步形成。根据以上特点,笔者勾勒出建设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保障机制(见图1)。

表2 《意见稿》全文内容梳理概括

章节	条文数	重点内容概括
总则	8	①责任主体:国务院负责全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开展资金预算 ②根本目标: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③基本目标:形成阅读氛围 ④基本任务:推动优秀出版物创作出版、完善阅读设施、改善阅读条件、组织开展阅读活动、营造良好阅读氛围等 ⑤重点扶助:“老、民、边、贫”地区
全民阅读开展	10	①制定计划——目标、任务、措施、保障 ②政府引领,团体参与——读书会、诵读会等 ③学校分类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高校 ④父母引导——家庭阅读、亲子共读 ⑤特殊对象——服刑人员、矫正对象 ⑥媒体宣传——营造氛围、增强意识 ⑦鼓励志愿——传播理念,认可阅读 ⑧守护底线——合法合规,心系安全
全民阅读保障	10	①推动出版;②鼓励文化创作;③促进数字阅读;④推广阶梯阅读;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全民阅读设施——图书馆、少年宫、书店、书屋、阅报栏等;⑥设施管理单位——阅读能力提升服务、维护保障运转、校外阅读服务;⑦各类公共场所设立全民阅读设施,提供便利
法律责任	3	该处分处分,该追究追究
附则	1	实施起始日

表3 《意见稿》高频关键词

序号	高频词	次数	序号	高频词	次数
1	国家	16	6	政府	10
2	设施	14	7	鼓励	9
3	促进	14	8	阅读推广	7
4	服务	13	9	条件	7
5	社会	12	10	阅读指导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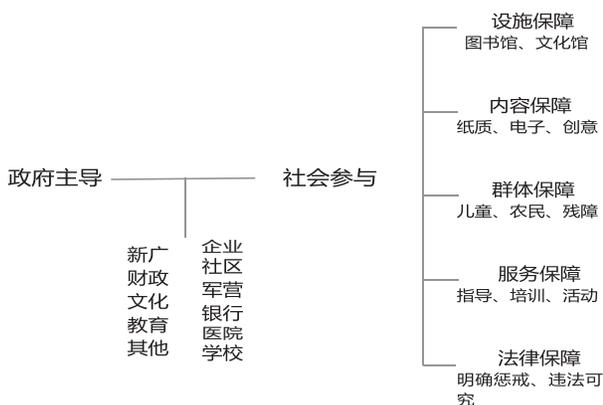


图1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保障机制

《意见稿》对外征求意见,是基于扎实的民意根基,同时,湖北、江苏、辽宁、深圳、四川5省市地方性法规的相继出台为其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因此其与5部地方性法规一脉相承,均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均等普惠、少儿优先、重点群体保障的原则,从

设施建设、内容精选、服务推广、提升效能等方面全方位保障公民阅读权利^[4]。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3.2.1 背景及意义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在设施建设、服务和产品提供、运行机制、财政投入、监督评价等方面缺乏制度性保障。在这样背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8]。历时三年,多次修改完善,《文保法》应运而生。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和基本文化需求实现从行政性“维护”到法律“保障”的跨越,公共文化服务将实现从可多可少、可急可缓的随机状态到标准化、均等化、专业化发展的跨越^[9]。政府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阅读生活是文化生活的基础组成部分,阅读权利也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各级政府应建立相关制度体系,保障公民阅读权利。

3.2.2 条文梳理归纳

《文保法》共6章65条,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与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相关的词汇有“图书馆”“阅读”“保障”“服务体系”等。梳理如表4所示。

表4 《文保法》中相关条文分析

相关词条	频次	重点内容概括
图书馆	2	①图书馆、农家(职工)书屋等是公共文化设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设施信息;②推动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
阅读	3	①各级政府应支持开展全民阅读;②相关单位应提供阅读服务,为公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③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为公众提供书报阅读
保障	9	①政府应保障公共文化设施的正常运行;②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保障设施及公众活动安全;③政府应当建立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保障机制;④未履行保障职责的政府可追责、处分。
服务体系	2	①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本法的目标之一;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文保法》是助力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法律之一,而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框架下构建全民阅读推广体系就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

与《意见稿》相比,《文保法》同样体现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并突出了以下几点:①以“保障”为基本要求;②以“设施”为基本条件;③以“活动”为主要手段;④以“服务”为最高准则;⑤以“满足”为最高标准。这5点是全民阅读活动这一文化活动的宏观引领、全民阅读指导单位和设施管理单位的行动指引。

3.3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3.3.1 背景及意义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开局之年,在此前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全民阅读已有多次部署,其根本目的是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建设书香社会。在此背景之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结合全民阅读活动的10年经验,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全民阅读推广的实践方法论。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将“全民阅读”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级规划,具有划时代意义。

2017年初,国务院等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文件,同样列出了推动阅读服务和保障阅读权利的可行举措,全民阅读的顶层设计格局更加清晰。

3.3.2 条文梳理归纳

《规划》共8 323字,分为4部分,分别是序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后两部分共设置了10个专栏,从中观和微观角度指出全民阅读推广具体开展的策略与方法,符合实际国情,更接地气。既将各地活动经验汇总推广并发扬,又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这些均可称为各类阅读推广组织开展活动的思路之源。

3.3.3 阅读推广基本要素

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一个自上而下、上下联动的过程,必须汇聚各方要素方形成合力,需要政府完善政策配套和严格执法双重保障,也需要行业

内进行系统整合^[10]，进而带动全社会发挥自身作用，这其实是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也是营造“书香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规划》涵盖了《条例》及《文保法》体现的全民阅读推广基本要素（见表5）：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构建有赖于这些基本要素，但又限于这些要素。

展的重要支撑。分析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过程得出了一个基本认识：这一体系是基于全民阅读实践，又远远高于目前全民阅读推广服务总水平，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活动的指导之策。因此，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对自身所负的社会职责应有更清晰的认识，对自身无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应感到自豪，对已取得的成

表 5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中的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		频次	重点内容概括
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人	8	①建立阅读推广人队伍；②对阅读推广人进行系统培训；③提升阅读推广人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④鼓励阅读推广人等对群众进行阅读指导。
	阅读推广机构	5	①培育阅读推广机构；②鼓励阅读推广机构等对特殊群体进行阅读指导。
	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2	①加快推进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基本形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以人为本、面向基层、惠及群众、兼顾重点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书香品牌		51	①开展全国范围的“书香中国”系列活动，巩固和培育全国各地书香活动品牌；②共同建设书香社会。
阅读活动		18	①将丰富阅读活动内容与提升思想文化内涵相结合；②各类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③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民阅读活动；④使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⑤组织开展系列专题数字化阅读活动，大力提升全民数字化阅读率。
阅读设施		8	①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建设全民阅读公共设施；②进一步加大城乡基层全民阅读设施建设力度；③全民阅读设施建设重点工程；④各类全民阅读设施应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
读书		39	①支持开展各类基层读书活动；②办好各类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等全民阅读活动；③举办主题读书活动；④支持开展各类基层读书活动。
服务		39	①必须加快推进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②阅读推广人及机构对儿童进行定期阅读指导和服务；③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④全民数字化阅读推广工程；⑤提升阅读推广人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能力。

4 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

以上述三大文献为基调，汇总其中较详尽的可行性举措，可形成全民阅读推广服务的基本体系，为各级全民阅读设施单位提供阅读服务的创新思路和实践指导。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专门的全民阅读促进机构统领，联合各级各类相关机构，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助益于阅读的各类活动为主要形式，以优质阅读内容为依托，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以各类“阅读弱势”群体为重点，开展有始有终、善始善终的阅读推广服务。这是贯彻实施一系列顶层设计文献的本质要求。基于此，笔者勾勒出了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见图2）。

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十三五”时期国家文化领域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发

展应倍加珍惜，对未来的工作应充满信心。

2017年，我国开展的全国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标准中的指标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增加了“阅读指导”这一指标。阅读指导是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应承担起阅读指导功能^[11]。专业的、系统的阅读推广活动仍属于图书馆新型服务之一，因此也是图书馆提升服务效能的得力举措。以评促建是本次评估所坚持的原则之一，因此各公共图书馆自身应以评估标准为参照，担当起阅读推广之重任。

5 结语

构建面向全民的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之一。各级各类图书馆在这一体系中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应以全民阅读顶层设计为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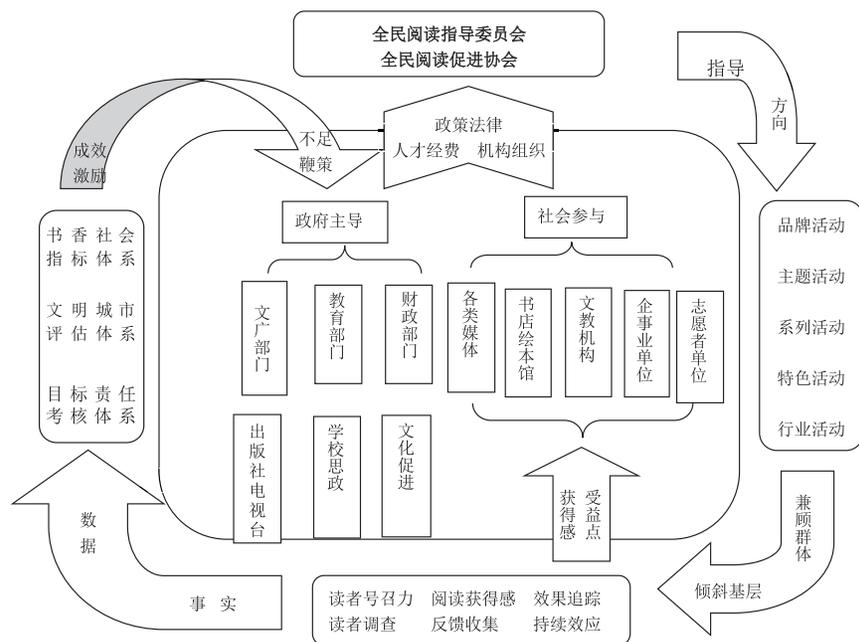


图2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的基本框架

深挖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内涵,积极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树立阅读推广品牌、打造符合自身的阅读推广活动体系,夯实阅读推广舆论基础,创造图书馆服务

的新高度。这必然也会提升图书馆自身的行业价值及图书馆员的社会自尊感和获得感,成为繁荣图书馆事业的内在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 [1] 李武,王丹,黄丹瑜,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十年进展(2015—2015)[J].图书馆论坛,2016(12):54-65.
-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2016-12-27].<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11617.shtml>.
- [3] 吴娜.全民阅读在中国[N].光明日报,2015-01-06(11).
- [4] 新华网.国务院法制办就《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开征求意见[EB/OL].[2017-04-01].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7-04/01/c_129523269.htm.
- [5] 张文彦,徐升国.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读十年回顾[J].出版发行研究,2016(4):5-10.
- [6] 韩彬.阅读立法中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J].图书馆论坛,2016(12):66-69.
- [7] 程佳,薛帅.代表委员畅谈如何推动全民阅读[N].中国文化报,2017-03-09(2).
- [8] 公共服务在线.文化部负责人谈新法如何保障你的公共文化服务权益[EB/OL].[2016-12-26].<http://mp.weixin.qq.com/s/S4vOBPVDx54F8rkS149aDw>.
- [9] 公共服务在线.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啦!有哪些历史性突破(附全文)[EB/OL].[2016-12-26].<http://mp.weixin.qq.com/s/nwpxzWQMUC8pfR6pMc0bhw>.
- [10] 张磊,周芸熠,陈凤娟,等.阅读立法保障下的全民阅读体系建设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4):72-80.
- [11] 柯平,胡银霞.创新与导向:第六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新指标[J].图书馆杂志,2016(12):4-10.

作者简介:李子峰(1988—),男,山西省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

收稿日期:2017-08-07

· 阅读文化 ·

基于 WCI 的高校图书馆微信阅读推广研究*

——以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为例

张 婷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260)

摘 要: 微信作为时下最热门的移动社交平台,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沟通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微信公众平台应用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中,可以提高传播效率和服务质量。文章调查分析了广东省37所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平台开通实施情况,通过WCI指数对微信阅读推广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并针对目前高校图书馆微信平台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做好阅读推广的策略。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WCI

中图分类号: G258.6;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WeChat Reading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WCI: A Case Study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Libraries in Guangdong

Abstract Nowadays, as the most popular mobile social platform, WeChat is changing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lifestyl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library community to utilize WeChat in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nd help to increas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WeChat accounts of 37 undergraduate college libraries in Guangdong, and uses the W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 (WCI) to quantify their effects of reading promotion. With regard to problems discovere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make further use of WeChat and advance reading promotion.

Key words WeChat; university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WCI

1 引言

微信以一种创新理念给数以亿计用户的生活带来改变。用户可以通过发送语音、图片和文字信息实现多种形式的即时沟通;“公众平台”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打造自己的品牌,也让更多的创新不断涌出^[1]。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有33.8%的国民倾向于“手机阅

读”^[2]。据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有95.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3]。2016年底,微信及WeChat的月活跃账户达8.89亿,比去年同比增长28%^[4]。可见,手机阅读已经成为国民交流与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微信在改变人们生活和学习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亦随之发生变化。将微信公众平台应用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与服务创新中,可以提高传播效率和服务质量,并已经成为图书馆界

* 本文系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2014 年院级招标课题“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与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4K03)的研究成果之一。

创新服务的重要议题。笔者通过清博WCI (WetChat Communication Index, 微信传播指数) 对广东省37所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开通实施情况进行量化分析, 针对其微信平台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 提出进一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做好阅读推广的策略。

2 广东省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应用调查

广东省本科院校共有43所, 其中公办的本科院校有37所^[5]。笔者通过各图书馆网站和微信, 对37所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进行了调查和关注, 分析其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情况。

2.1 微信平台开通时间和认证情况

从表1可知, 在广东省37所公办本科院校中, 开通

图书馆微信公众账号的有29所, 占总数的78%; 汕头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嘉应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警官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8所院校图书馆尚未开通微信公众平台;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刚刚开通微信平台, 但尚未开始使用。从开通时间来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最早于2013年1月开通使用微信平台。另外, 2013年开通的有7所, 2014年开通的有5所, 2015年开通的有13所, 2016年开通的有4所 (除广州医科大学开通时间为2016.7, 与首次信息发布时间不同, 其他高校微信开通与使用年份相同); 每年都有新加入的成员, 其中2015年开通的图书馆为最多, 占开通总数的45%。在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图书馆中, 只有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微信没有进行认证。有14所院校图书馆只开

表1 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平台开通情况一览表

序号	高校名称	公众号名称	公众号类型	首次发布时间	是否认证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外图书馆 (gdulflib)	服务号	2013.1	是
		广外图书馆悦读平台 (tongshipingtai)	订阅号	2013.3	是
2	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SMU-library)	订阅号	2013.4	是
3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仲恺图书馆 (zhklib)	订阅号	2013.4	是
4	华南理工大学	华图小微 (scutlib)	订阅号	2013.5	否
5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订阅号	2013.9	是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gdulfelib	服务号	2016.3	是
6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图书馆 (sysulib)	订阅号	2013.11	是
7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图书馆	订阅号	2013.12	是
8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佛科院图书馆 (fosulibrary)	订阅号	2014.3	是
9	五邑大学	五邑大学图书馆 (wyu_lib)	订阅号	2014.5	是
10	惠州学院	惠州学院图书馆	服务号	2014.5	是
11	韩山师范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 (hstclib)	订阅号	2014.6	是
12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服务号	2014.10	是
13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gzylib	服务号	2015.1	是
14	广州航海学院	广州航海学院图书馆 (gzhhxytsg)	服务号	2015.1	是
15	韶关学院	韶关学院图书馆 (sgxylib)	订阅号	2015.3	是
16	肇庆学院	肇庆学院图书馆 ZQULIB	服务号	2015.4	是
17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	服务号	2015.4	是
18	东莞理工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DGUT_library)	服务号	2015.6	是
19	暨南大学	暨南图书馆 (JNULIB85220285)	服务号	2015.8	是
20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SCAUlibrary)	订阅号	2015.9	是
21	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 (sustclib)	订阅号	2015.9	是
22	深圳大学	深圳大学图书馆订阅号 (SZU_Library_DYH)	订阅号	2015.9	是
2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图书馆 Gdsytsg	服务号	2015.9	是
24	岭南师范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服务号	2015.11	是
25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gdutlib)	服务号	2015.12	是
26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大图书馆 (hnsdtsng)	服务号	2016.4	是
27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图书馆 GZULIB	订阅号	2016.5	是
28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Gdoulib)	服务号	2016.6	是
29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服务号	2017.2	是
30	广东医科大学		无		
31	嘉应学院		无		
32	广东金融学院		无		
33	广东警官学院		无		
34	广州体育学院		无		
35	星海音乐学院		无		
3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无		
37	汕头大学		无		

通了服务号, 13所只开通了订阅号。另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和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既开通了服务号, 也开通了订阅号。

2.2 服务菜单设置及推送内容

服务号和通过认证的订阅号都可以设置自定义菜单栏,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随时更改自定义菜单, 通过自定义菜单可以了解各个微信号的主要服务内容。开通的29个微信平台中, 只有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微信平台没有设置“自定义菜单”。

通过调查显示, 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均具有通知公告的功能, 27所高校的平台都能通过绑定读者证进入“我的图书馆”, 进行馆藏查询、借阅信息查询、续借等功能, 发布“新闻公告”的有28所高校, 发布“热门借阅”和“图书荐读”的有17所高校, 还有一些提供了“微阅读”“公开课”“书刊荐购”“常见问题”“联系我们”等服务内容。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其微服务栏目下设置了“权限激活”“超期教育”等栏目; 暨南大学图书馆开设了“迎新微站”栏目; 深圳大学图书馆提供了“深圳地区馆藏”“座位查询”“人文社科学术视点”等;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在线选座”功能。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推送内容, 创新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吸引了更多用户的关注, 提高了用户的黏度。

3 基于 WCI 指数的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平台分析

清博指数拥有目前国内最大的第三方“两微一端”(微信、微博、APP)数据库。其WCI、BCI、ACI的独特权威算法公式已成为行业领域标杆^[6]。WCI是由微信原始数据通过公式推导出来的标量数值, 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的传播度、覆盖度及账号的成熟度和影响力来反映微信整体热度和公众号的发展走势。WCI指标体系详见表2。

表2 WCI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	标准化方法
阅读指数 (80%)	日均阅读数 R/d	40	$\ln(R/d+1)$
	篇均阅读数 R/n	45	$\ln(R/n+1)$
	最高阅读数 Rmax	15	$\ln(R_{\max}+1)$
点赞指数 (20%)	日均点赞数 Z/d	40	$\ln(10*Z/d+1)$
	篇均点赞数 Z/n	45	$\ln(10*Z/n+1)$
	最高点赞数 Zmax	15	$\ln(10*Z_{\max}+1)$

测算公式如下:

$$WCI = \left\{ \begin{array}{l} 80\% \times [40\% \times \ln(\frac{R}{d}+1) + 45\% \times \ln(\frac{R}{n}+1) + 15\% \times \ln(R_{\max}+1)] \\ + 20\% \times [40\% \times \ln(10 * \frac{Z}{d}+1) + 45\% \times \ln(10 * \frac{Z}{n}+1) + 15\% \times \ln(10 * Z_{\max}+1)] \end{array} \right\} \times 10$$

R为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文章(n)的阅读总数; Z为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文章(n)的点赞总数; d为评估时间段所含天数(一般周取7天, 月度取30天, 年度取365天, 其他自定义时间段以真实天数计算); n为评估时间段内账号所发文章数; R_{max}和Z_{max}为评估时间段内账号所发文章的最高阅读数和最高点赞数。

从2017年5月份的全国微信公众号月榜来看, 排在前5名的热门公众号WCI指数都在1 500以上, 排第一位的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WCI指数为1 580.6^[7]。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WCI指数普遍不高, 排在前列的图书馆微信公众号WCI指数一般徘徊在700—800之间。笔者选取2017年4月2日—4月8日的相关数据进行评估分析, 监测周期内, 只有15所高校图书馆发布了信息。从表3可见, 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等价活跃粉丝数和WCI指数都比较低。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服务号的摄影比赛网络投票活动阅读数达5 073, 其WCI指数由上一周的224.56提升到了455.39, 指数上涨了230.83。

4 广东省公办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

4.1 公众号名称不规范

在清博指数平台中, 用“学校全称+图书馆”的规范命名方式才能顺利找到该校图书馆的微信。通过表1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 各高校图书馆对微信公众号的命名方式有3种: ①学校全称+图书馆。此方式方便用户查找, 比较有代表性, 有23所高校以这种方式命名。②学校简称+图书馆。有些学校为了精简, 采取该方式, 有5所高校以这种方式命名, 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简称为广外图书馆。③其它方式。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使用的是没有经过认证的订阅号, 命名为“华图小微”, 这种方式不利于用户查找和关注。因此, 各高校图书馆的公众号名称有待规范。

4.2 微信平台的信息发布频率不高

调查发现, 各高校图书馆的微信推送时间不固

表3 广东省本科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WCI指数(2017年4月2日—4月8日周榜)

公众号	发布	总阅读数	最高阅读数	平均阅读数	总点赞数	WCI指数	等价活跃粉丝数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GAFA_TSG	1/3	5 136	5 073	1 712	39	455.39	4 400
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 gcdlib	5/11	6 128	1 516	557	141	402.54	6 600
广外图书馆 gduflib	2/11	4 718	2 327	429	156	394.65	7 610
暨大图书馆 JNULIB85220285	1/8	3 607	2 359	451	84	375.51	6 270
广州大学图书馆 GZULIB	2/2	1 220	884	610	65	341.6	7 960
中山大学图书馆 sysulib	2/4	1 792	873	448	54	329.85	8 975
韶关学院图书馆 sgxylib	1/3	1 354	706	451	27	304.2	4 920
华南师大图书馆 hnsdtslg	1/7	1 828	711	261	57	302.07	7 110
五邑大学图书馆 wyu_lib	1/1	679	679	679	12	287.85	4 825
仲恺图书馆 zhklib	2/3	1 095	567	365	20	278.95	5 965
广外图书馆悦读平台 tongshipingtai	3/6	1 172	598	195	35	264.9	1 560
深圳大学图书馆订阅号 SZU_Library_DYH	3/11	1 165	621	106	65	248.79	2 370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SMU-library	1/2	784	395	392	4	227.2	3 990
佛科院图书馆 fosulibrary	1/2	437	343	219	6	193.12	2 480
华图小微 scutlib	3/4	287	117	72	3	129.69	880

定,大部分更新频率较低;有些高校图书馆较早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却很少使用,如广东药科大学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于2013年12月就发布了第一条微信,2014年全年只发布了1条信息,2015年也只发布了2条。肇庆学院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于2015年4月开通,整个2015年只推送了13条信息,2016年上半年只推送了9条信息。2017年4月2日—8日监测期内,有14所高校图书馆(其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含服务号和订阅号)发布了信息,有15所高校图书馆因为一周没有发布信息而未能获取WCI指数。可见,各高校图书馆微信平台的信息发布频率普遍不高。

4.3 微信平台发布的标题及内容缺乏吸引力

据调查显示,每所高校图书馆的微信平台定位都基本相同,包括了图书馆最新资讯、推送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与读者互动等,读书月活动成为微信线上推荐的主要内容之一。推送的内容相对杂乱,基本没有固定的栏目,缺乏连续性来保持用户黏度。推送信息的标题中规中矩,对读者缺乏吸引力。还有部分高校馆的微信用纯文字发布信息,形式过于单调,没有配图以及版面的设计和编辑,枯燥乏味。

4.4 微信平台运营团队人员匮乏

通过调查发现,高校图书馆很多微信平台都是由同一数据库商协助建设完成的,其菜单设置几乎完全相同。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微信平台建设和维护都是依靠一两个馆员或学生助理完成,没有组建起专业、规范的建设团队来保证微信平台的系统性、多样

化、持续性运行。长此以往,微信公众号的质量和关注度会降低,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5 进一步利用微信平台开展阅读推广和创新服务的策略

5.1 规范微信平台运行机制

5.1.1 规范微信公众号名称

为了方便更多用户搜索和关注,建议采取“学校全称+图书馆”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尽量不要使用学校或图书馆的简称,这样容易造成因用户不了解而查找不到该账号。

5.1.2 建立微信运营团队,规范发布内容及频率

微信平台的建设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个人或是第三方来完成,因为其涉及的内容较广,包括了图书馆各部门的业务、通知公告、读者活动、阅读推广、资源导航和利用等。应该将其视为一个立体的宣传渠道,组建专业的微信运营团队,包括策划、文案、美工、审核等人员,由策划人员提供好的构思和文案,再由美工负责版面设计和编辑,最后经审核人员审核信息无误后,将信息发布。发布的信息需有几个固定栏目,每一期保持相对连贯性,如专题书目推荐、热门图书排行、数字资源推介等,吸引读者持续关注。

5.2 利用微信平台多维度开展阅读推广

图书馆除了使用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外,还可同时使用订阅号开展专门的阅读推广服务。服务号与订

阅号同时并存的优点是：利用服务号的一级菜单功能，可以自定义常用菜单，且服务号推送的新信息可即时出现在微信用户聊天列表中，更容易引起用户关注；通过订阅号可以每天推送一条信息，对受限于每月发布4条信息的服务号进行有效补充，且活跃度高，更容易保持用户粘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就专门开通了“广外图书馆悦读平台”的微信订阅号，用于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除了传统的图书推介外，还可以利用微信平台的语音、视频等功能，进行阅读推广。喜马拉雅的听书模式也可以引入微信平台，让读者参与到语音录制中，丰富推送内容，提升微信关注度。

5.3 创新信息服务模式

微信服务过程也是图书馆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和不断创新的过程。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定期推送本馆的纸质和电子资源、数据库的使用方法以及信息服务等。同时，通过设置自动回复、FAQ、在线解答等方式，实现方便快捷的读者咨询服务。

除了服务号和订阅号，图书馆还可尝试通过普通微信号组建讨论组，用于发布信息到朋友圈、发起微读书会、微讲座等。2015年12月，由北京爱迪科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的微信号“阳光悦读”已经开始了微讲座的尝试，先后成功举办了初景利、柯平、肖珑、姜爱蓉、高凡、刘炜、高波等图书情报界专家学者的在线讲座。微讲座过后，还及时整理了讲座内容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使用户在微平台实现在线听讲座和线上学习。

参考文献：

- [1] 张骏毅,杨九龙,邓媛.“211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应用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4(6):29-34.
- [2] 陈荧.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服务实践:以广州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报,2016(5):9-13.
- [3] 明均仁,张玄玄,陈雪.湖北省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6(2):18-25.
- [4] 黎邦群.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建设[J].图书馆杂志,2014(9):74-81.
- [5] 陈雨雪.“985”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使用现状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4(16):88-93.
- [6] 吉翠芳,周志峰.“211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应用问题及对策[J].图书馆学研究,2014(17):38-41.
- [7] 刘婷婷,任淑红,马崴.“211工程”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账号应用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学报,2015(2):68-71.

作者简介：张婷（1980—），女，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等。

收稿日期：2017-05-27

5.4 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推送内容

微信推送的内容除设置相对固定的栏目外，还应与时俱进，推送一些与当下时事相关的内容。如杨绛先生逝世时，多个微信平台推出了杨绛专题图书推荐；为读者推送近期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的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等。这些关注度较高的人物或事件，能让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在相互转发中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

标新立异的标题能吸引读者眼球，提高公众号的点击率。如暨南大学图书馆的《同学们眼中的图书馆“恶人”榜出炉！》、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的《闹钟响了好几遍，我早上还是起不来怎么办？》等，都获得较高的点击率和点赞数。但在标题的拟定时应注意，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而存在标题失实、滥用网络语言等失范现象。

5.5 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微信推送的信息只能实时推送给限定的人群，即关注了微信平台的粉丝们，所以微信的推广和“吸粉”尤为重要。2017年4月的榜单中，排在第一位的热门文章是“脸书创意摄影比赛网络投票火热进行中”；5月的榜单中，热门文章第一的是“微课决赛之最佳人气奖投票”。通过这种投票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

微信的宣传推广需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如新生入学季、毕业季、读书月活动等，通过讲座、活动现场、宣传栏、海报、校广播、网站等方式进行宣传，以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 阅读文化 ·

县级图书馆绘本亲子阅读推广的实践与思考

——以云和图书馆“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为例

陈丽红

(云和图书馆 浙江云和 323600)

摘要: 绘本亲子阅读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促进亲子情感交流、创建书香家庭。文章以云和图书馆“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为例,在创造优良的绘本亲子阅读环境,引进优秀绘本、开展书目推荐,注重阅读推广方法,开展“绘本+”创新活动,运用新媒体开展绘本数字阅读推广方面进行了实践,并对活动进行了思考:多方合作、共建共享,建立绘本亲子阅读推广长效机制。

关键词: 县级图书馆; 绘本亲子阅读; 阅读推广

中图分类号: G252.17; G258.22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es of and Thinking on Parent-child Reading Promotion of Picture Books in County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Yunhe Library

Abstract Parent-child reading of picture books is conducive to developing children's reading interests and habits, promoting parent-child emotional interaction, and establishing book-loving families. This article, taking the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y of picture books in the Yunhe Library for example, discusses practices of creating a favorable parent-child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introducing excellent picture books, recommending booklists and adopting appropriate reading promotion methods, holding picture book plus innovative activities, utilizing new media and advancing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of picture books.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activity, proposing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co-building and sharing, 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reading promotion mechanism of picture books.

Key words county library; parent-child reading of picture books; reading promotion

1 引言

绘本,也称“图画书”,是由图画和文字有机融合的儿童读物,通过“图画”与“文字”两种媒介,在不同向度上交织讲述一个故事、表现一种哲理。绘本阅读,有助于儿童通过图画人物和故事情节认识自我、感受世界、体验生活,充分调动儿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促进审美意识、想象力、语言能力、生活经验和阅读能力的养成和提高^[1]。绘本亲子阅读是在绘本的基础上,实现了亲子共同学

习、互相沟通、彼此分享,促进了亲子间的真挚情感交流与和谐关系的确立。云和图书馆在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儿童中推出“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在绘本亲子阅读推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与实践,旨在教会儿童高效利用身边的图书馆,让他们充分享受社会公共资源。

2 云和图书馆“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的创新实践

“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是云和图书馆(以下

简称“我馆”)全民阅读推广系列之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示范项目。该项目自创建以来,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内涵,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一路书香快乐成长”幼小衔接阅读推荐活动、“春泥计划”绘本阅读会、“快乐阅读梦想启航”亲子阅读会、“小记者训练营”绘本DIY、我的绘本我创意”亲子手工制作等,每周六定期开展,营造浓厚的绘本亲子“悦读”氛围。每期都有主题,常创常新。

2.1 创造优良的绘本亲子阅读环境

我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为读者提供一个无门槛、全免费、舒适幽雅的借阅环境。不断完善软硬件设施,于2015年对少儿室、阅览室、多功能厅进行了重新装修。少儿室安装了适合儿童身高的书架,铺上了木地板,摆上色彩明快的桌椅、青翠的绿色植物。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小读者的阅读环境需求,采用半隔断的方式设置不同的阅读区域,开辟连环画区、绘本区,将绘本集中按主题排放,方便借阅。引进歌德电子借阅机、读者查询机,提供多载体便捷的阅读方式。在多功能厅安装投影仪,摆上木玩、黏土、橡皮泥、手工工具,营造优良的绘本亲子阅读环境。

2.2 引进优秀绘本,开展书目推荐

根据蒙台梭利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的理论,0~3岁的低幼儿处于口唇敏感期,视觉发育尚未完善,所以内容简单、图画鲜明的纸板书、布书深受他们的喜爱。3~6岁的儿童处于空间敏感期,立体书、洞洞书、翻转书很好地迎合了他们的爱好^[2]。小学低年级儿童适合图文并茂、富有内涵的绘本。针对各年龄段儿童特点,我馆积极引进优秀绘本,大力引进“凯迪克奖”“丰子恺奖”获奖作品及世界插画大师的作品。针对家长对绘本的选择困难,图书馆开展绘本书目推荐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图书馆网站、科普画廊等平台定期推荐绘本书目;开通“你点书我买单”网上荐购平台,添置绘本。针对幼儿园大班幼儿,我馆推出“一路书香快乐成长”幼小衔接阅读推荐活动。活动内容为参观图书馆、听绘本故事、推荐优秀书目等。这个活动对增加幼儿的阅读兴趣、做好幼小衔接、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很大的帮助,受到幼儿园老师和家长的一致欢迎。

2.3 注重阅读推广方法

在阅读推广案例绘本的选择上我馆独具匠心,选择题材生动、文体丰富、外形鲜明的绘本。阅读推广

活动流程设计活泼生动,活动内容富有创意,活动形式注重互动,活动内涵培养情感。通过“讲一讲”“画一画”“演一演”“编一编”“学一学”“做一做”的方法使绘本亲子阅读活动变得更加有趣。“讲一讲”:由指导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绘本故事,引导阅读;也可以让儿童自己来讲,采取“阅读体验式”,提高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画一画”: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通过画画来表现绘本的内容,提高儿童的绘画表现能力。

“演一演”:采用“表演参与式”,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布置场景、制作道具、选择角色,培养儿童的表演能力。“编一编”:让儿童续编、创编故事,进行“结局重构”,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学一学”:鼓励儿童以绘本里的优秀形象作为学习榜样,培养儿童良好的个性品质。“做一做”:通过木玩演绎、手工制作来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

2.4 开展“绘本+”创新活动

“绘本+”木玩演绎、手工制作、积分兑换是我馆结合绘本亲子阅读开展的创新活动,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绘本阅读兴趣,锻炼儿童的动脑动手能力,促使儿童热爱阅读。

2.4.1 “绘本+”木玩演绎活动

浙江云和有“中国木制玩具城”的美誉。云和现已开发木制玩具产品10大门类3 000多个品种,可分为成人型木制玩具、儿童型木制玩具、智力型木制玩具、实用型木制玩具等多种类型。坐拥丰富的木制玩具资源,2000年,我馆在馆内开设了为本地区木制玩具产学研服务的TOYLIBRARY-MUSEUM(玩具图博物馆),开始收集保存木制玩具图书与木制玩具样品,建立起“文献收藏-资源开发-科技普及”的专业工作流程。这一工作为本馆依托木制玩具、开展绘本亲子阅读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3]。在绘本亲子阅读活动中,带领儿童参观玩具图博物馆,根据图文内容、故事情节,让儿童更好地通过木制玩具实物,进行情感互动:在讲述《逃家小兔》时,用兔子木制拼图玩具来演绎;在讲述《灌的美餐》时,用上“过家家美食套装”,使故事更有吸引力;开展“智慧仿生拼画”、益智木玩“十五巧板”大比拼活动;举办有益于发挥儿童想象力和创造性,锻炼儿童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的玩具模型制作夏令营。

2.4.2 “绘本+”手工制作活动

手工制作活动能培养儿童的专注力和创造力。

在绘本阅读中引进手工制作活动,能使儿童更好地体验绘本。我馆在暑期开展的“小记者训练营”绘本DIY、“我的绘本我创意”亲子手工制作活动,结合绘本故事内容制作手工作品,吸引了大批家长和儿童的参与,已成为我馆的品牌活动。寒假期间连续两个星期在少儿室开展的“创意DIY新年贺卡”“创意DIY灯笼”手工制作活动,让儿童更好地理解绘本《团圆》《年》《春节》的内容,自然而然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唤起心灵深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为更好地开展手工制作活动,我馆邀请专家开展《手工制作技巧》《玩具文化漫谈》《云和本土文化的认识和表达》《科普的魅力》等系列讲座;举办“少儿手工制作展”“迎新年少儿画展”“细说春节习俗”“惊艳——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等各类主题展览。

2.4.3 “绘本+”积分兑换活动

2014年,我馆推出了积分兑换活动,以全新的活动模式推广绘本阅读。活动对象为3~13岁少年儿童,其以阅读量、阅读次数、自创作文、学习心得、手抄报、美术作品、摄影作品、手工作品等多寡参加积分兑换活动。我馆工作人员对小读者阅读量及阅读次数进行统计并给予相应的积分,对小读者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和筛选。作品分入选和录用二档,入选的作品得积分5分、录用的作品得积分10分,并将录用的作品展示于少儿园地“科普画廊”。积分累计满50分、100分可分别兑换不同的奖品。每个季度进行积分排名,给前10名的小读者授予“优秀小读者”的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积分兑换活动,既可以扩大小读者的阅读量,又能兑换奖品、展示作品,增强了小读者的自信心。该活动开展3年来一直广受好评。

2.5 运用新媒体,开展绘本数字阅读推广

新媒体具有多元化、交互性、分众化、个体化、跨时空、低成本的特点。我馆通过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号、手机APP服务平台等新媒体的应用提高读者的利用率,开展绘本数字阅读推广。开通手机移动图书馆服务,改版云和图书馆网站;连接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网、浙江网络图书馆影视频道、浙江省联合知识导航网,利用网络图书馆的海量信息,为广大绘本阅读爱好者带来新的借阅体验;利用云和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向读者推荐绘本、发布绘本活动信息,搭建与读者交流互动的平台,提高图书馆的利用率。

3 思考

3.1 多方合作,共建共享

儿童阅读推广是个系统的工程,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要任务,要在全社会营造“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社会氛围,让热爱读书的习惯蔚然成风,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大力协作^[4]。绘本亲子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图书馆的推广和坚持、学校的协作和参与、家长的支持与互动。“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一路书香快乐成长”幼小衔接阅读推荐活动的成功开展都是社会各界多方合作、共建共享的结果,有效实现了社会资源整合,促进了儿童阅读推广。

3.2 建立绘本亲子阅读推广长效机制

3.2.1 人才专业化

在阅读推广中,人力资源是核心要素。一支高素质、高品位、稳定的阅读服务团队往往可以使阅读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绘本亲子阅读推广一要把好人才关,要有一支了解儿童心理,具备爱心、细心、耐心和热心的馆员队伍,要了解儿童心理学,善于和儿童交流,能对阅读的方法和内容起到指导作用;二要创造馆员提升素质的机会,通过培训、外出学习交流、专家讲座、同行交流、考级等方式提升馆员服务能力;三要建立考核机制,对活动方案、活动预期取得的成效、参与者的满意度、活动持续性进行评价考核,促使人才专业化、绘本亲子阅读推广的长期化。

3.2.2 活动品牌化

图书馆活动品牌化既能提高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又能使活动达到预期目标,受到读者关注和响应。“创意DIY新年贺卡”“创意DIY灯笼”手工制作活动连续3年寒假在少儿室开展,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欢迎;在每周六下午举行的七彩绘本阅读活动、巧巧手手工培训活动更是关注度高,反响热烈。活动品牌化除了活动要有吸引力外,还要注重持续发展,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注重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以丰富和多元的活动保持对读者长久的吸引力。

4 结语

“七彩绘本亲子阅读活动”倡导以绘本为载体，开展多元互动式阅读，让绘本中蕴含的教育信息潜移默化影响儿童，使绘本阅读成为一场“畅享的盛宴”。

绘本亲子阅读的推广，对儿童阅读好习惯的养成和阅读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对促进全民阅读、书香家庭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蔚.基于绘本的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 [2] 段运.国家一级少儿图书馆基于绘本的早期阅读推广活动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6(2):31-33.
- [3] 潘丽敏.木制玩具:助力儿童阅读推广[J].图书馆杂志,2016,35(4):69-71.
- [4] 罗小红.基层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几点思考[J].图书馆,2013(4):122-124.
- [5] 王晓东.县级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5,34(4):78-83.

作者简介：陈丽红（1977—），女，云和图书馆副馆长，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收稿日期：2017-02-20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8年征订启事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国内统一刊号：CN33-1398/G2；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2363）为大16开，96页，月刊，每期定价22元，是浙江省内唯一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由本刊编辑部自办发行，2018年出版12期，共264元（免收杂志邮寄费），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订阅。

凡订2018年度本刊的单位和个人，请以信汇方式将订购款汇到下列账号，或以邮汇的方式并填写订购回执寄至本刊编辑部，我部收到订购款和回执后即开具并寄回发票。如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需提供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号、开户行及账号。

信汇银行：中国银行杭州世贸支行	电 话：0571-87988086
收款户名：浙江图书馆	地 址：杭州市曙光路73号
账 号：366258326759	联 系 人：茅珍艳
邮局汇款：《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邮 编：310007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订购回执

订购单位/个人 (发票抬头)		
邮寄地址及邮编		
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订购份数及金额	份数：_____份	金额：¥_____元
合计金额 (人民币大写)	_____仟 _____佰 _____拾 _____元 _____整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 工作研究 ·

“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应用与思考

——以厦门市图书馆为例

汤青

(厦门市图书馆 福建厦门 361012)

摘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着巨大变革。只有把互联网的优势应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中,才能全面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文章以厦门市图书馆为例,分析了“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在现代信息技术、自媒体、互联网金融方面的应用,并就创新读者服务工作作出相关思考: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无押金信用借还;以用户为中心,构建个性化服务。

关键词: 互联网+; 图书馆; 读者服务; 服务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52;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The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Internet + Library" Service Mode——Take Xiamen Library For Example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ay people read. Only by apply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 can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e library be improved comprehensively. Taking the Xiamen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 library" service mode i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lf-media and Internet finance. Meanwhile, it makes thinkings about innovation of reader service work;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credit system to ensure the loan without deposit credit; builds personalized service taken user as the center.

Key words Internet+; library; reader service; service mode

1 引言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知识的重要集聚场所之一,肩负着人类社会文化、知识的组织、整理、加工、推送等信息服务重任。图书馆建设和服务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使人们生活节奏愈加快捷,而且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要求更加便捷、丰富、全面、系统。特别是随着2015年“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互联网+”在各行各业广泛推广使用,使得社会公众对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充电、汲取知识的要求愈来

愈多样化,要求的服务方式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图书馆应构建“互联网+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将互联网的优势应用到对图书馆的管理中去,全方位、高效率地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2 “互联网+”与“互联网+图书馆”概述

2.1 “互联网+”概述

“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从而在新领域创造一种新生态。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互联网+”概念,并明确提出要从国家战略角度制定“互联

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1]。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自此“互联网+”迅速在各行业间发展。

2.2 “互联网+图书馆”概述

2.2.1 “互联网+图书馆”概念的提出

2015年7月,浙江图书馆联合全省11个市级公共图书馆发布《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互联网+”行动计划》,正式拉开了国内图书馆领域“互联网+图书馆”行动计划实施的帷幕^[2]。“互联网+图书馆”,并非只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图书馆行业进行深度结合,以用户为中心,推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服务理念与思维模式的变革。“互联网+图书馆”有助于推动形成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生态系统^[3]。

2.2.2 技术架构

如何利用“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图书馆行业深度融合,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图书馆行业发展新形态,将是互联网时代下图书馆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互联网+图书馆”技术架构设计中,用户可以通过门户网站、微服务大厅等客户层的交互渠道获取业务应用服务。应用层具备松散耦合增减应用系统的灵活性,包含了业务系统、RFID设备、飞鸽传书系统、数字资源系统等图书馆多元化服务应用。读者只需要在客户层发送请求至逻辑层,逻辑层接受请求并进行分析,再发送命令给业务层执行业务。如图书检索、借还书、送书上门、访问数字资源等业务请求操作,业务层根据命令参数进行不同业务的处理,并调用相关的接口,完成后将结果返回给逻辑层;逻辑层获取到业务层的执行结果后,直接输出到客户层。业务层通过各种协议访问结构化的数据(ORACLE),对数据进行持久化操作。数据层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收割整合图书馆各种服务应用、读者行为信息等多维度、多结构化的数据,整合、分析并反馈给图书馆,作为精准决策参考(见图1)。

3 厦门市图书馆“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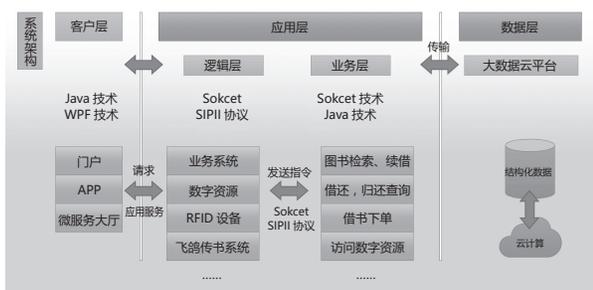


图1 “互联网+图书馆”技术架构图

3.1 现代信息技术方面

厦门市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信息化管理始于90年代,最初引进的是图书馆基础业务管理系统,之后,办公系统、数字资源、RFID、智能移动终端、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系统或平台逐步上线。目前建立了门户网站、掌上厦图APP,用户可通过门户网站及掌上厦图APP进行馆藏查询、借阅情况查询、预约图书、续借图书等操作,并与厦门市各区图书馆联网,形成资源共享;建设了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实现24小时通借通还服务。另外,我馆还外购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全文电子期刊等数字资源,并自建地方特色数据库,用户无论在馆与否,皆可登陆我馆官方网站进行数字资源检索。

3.2 自媒体应用方面

自媒体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有别于由专业媒体机构主导的信息传播。它是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传统的“点到面”的传播,转化为“点对点”的一种对等的传播概念^[4]。自媒体包括微博、微信、博客、官方贴吧、论坛等。

在自媒体应用方面,我馆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用以宣传图书馆的活动预告、进行阅读推广。用户还可通过我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馆藏查询、资源检索、图书续借、活动报名、借阅情况查询。截至2016年12月底,我馆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已达6万余人,并于2017年5月入选了第二届“大众喜爱的50个阅读微信公众号”。通过自媒体进行动态发布、阅读推广、品牌宣传、用户调查、活动宣传,不仅扩大了我馆的服务成效,而且提高了我馆的社会影响力。

此外,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不便到馆群体和因空余时间较少和交通拥堵无法到馆群体的阅读权利,丰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高文献利用率和流通率,我馆依

托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线上借阅、自付邮费、线下物流送书上门”的便民服务,于2017年7月1日起开通了“飞鸽传书”服务平台。“飞鸽传书”项目是“互联网+图书馆”借阅服务的模式创新,读者通过我馆微信公众号中的“飞鸽传书”入口即可借阅图书馆图书。网借流程为:读者通过移动终端、电脑访问“飞鸽传书”平台,检索图书、提出借阅请求并支付运费(运费为:3本以下3元,3本以上每增加1本增加1元;每单上限5本,每位读者单数不限)。图书馆工作人员找到图书后,通过同城物流配送到读者指定的收书地点,配送流程见图2。整个借书进度通过短信通知读者,读者也可以通过使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查询借阅状态。还书时,读者可就近到社区分馆或街区自助图书馆归还,也可付费由物流公司上门代还书。读者可在线上发表书评交流心得,实现网借服务从“线上到线下,再从线下到线上”的O2O借阅服务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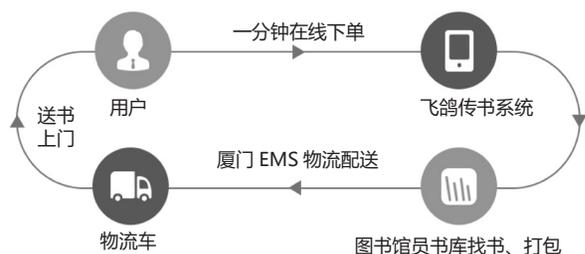


图2 飞鸽传书 O2O 图书配送流程

3.3 互联网金融方面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流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第三方支付(Third-Party Payment)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主要模式。狭义上讲,第三方支付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非银行机构,借助通信、计算机和信息安全技术,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在用户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间建立连接的电子支付模式,具有效率高、覆盖广、成本低、快捷化、互联化、移动化等特点。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总交易额为57.9万亿人民币,其中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为38.6万亿元,约为美国的50倍^[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与第三方支付结合,图书馆行业也不例外。

虽然我馆实行免费借阅,但是如果读者存在图书超期归还、图书损坏、丢失等情况,还需交纳罚款。目前,我馆推出微信缴交滞纳金服务功能,用户可通

过微信公众号的“滞纳金缴交”入口进行滞纳金查询和缴交。这一功能的推出,将为读者提供更快捷、更便利的支付方式,同时也减少了工作人员同银行的结算次数,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而微信缴交滞纳金服务功能主要是通过移动小额支付技术来实现,它采用了J2EE开放式多层体系架构,基于方便快捷的短消息机制,运用OTA空中下载技术,通过移动通信短信接口与手机进行安全加密通信,同时以专线/VPN连接不同的金融机构平台和应用方平台,将各方有机融合,最终完成移动手机的身份识别、小额支付、空中圈存、数据采集和对账清算等业务(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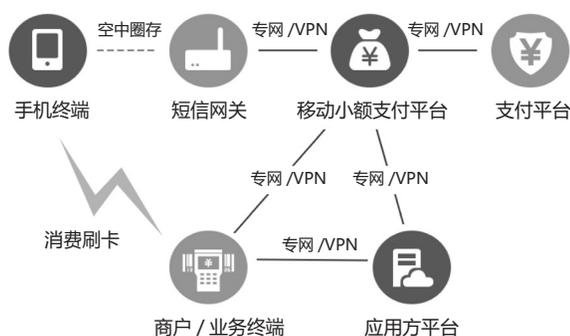


图3 小额支付技术网络架构图

4 “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思考

“互联网+图书馆”提出后,许多公共文化领域的专家、代表对此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衡定的标准,无法明确何为图书馆的“互联网+”建设必备模式。同时,很多图书馆在构建“互联网+图书馆”项目时,仅仅是安装堆砌多个系统,或只是开通微信公众号对外宣传,并没有对图书馆在交互、应用、数据等3方面进行整体运营建设。厦门市图书馆的“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虽然打破了图书馆服务固有的边界,改变了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形成了基于知识和技术进行服务提供与需求满足的新模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而图书馆作为社会行动主体,只有将其自身及用户置于信息技术革命中去锻造和锤炼,不断地塑造出新的服务模式,才能突破旧框架,实现创新。

4.1 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无押金信用借还

2015年1月,央行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等8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6]。参考美国的FICO信用系统,

芝麻信用创立了芝麻分这个评分系统。目前中国整个信用体系的覆盖度大约仅有35%。不过比起国外更成熟的信用体系,中国的信用体系显得更为多元化,也更具有中国特色。

图书馆借助芝麻信用的服务模式,除了能降低用户使用服务的门槛、提高效率之外,也可以优化图书馆资源配置。图书馆在开展无押金信用借还服务时可以省去筛选用户的步骤,增加读者持证量的同时也能避免与读者在押金问题上的纠纷,有效约束读者的借阅行为。可以说,个人信用已经成为了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评价体系。未来芝麻信用将对图书馆的其他服务进行更加广泛的覆盖,成为“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的一项重要补充。

目前我馆借阅证办理需要缴交押金,押金等级有50元至1 000元不等。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读者量增长、提高借阅率、促进全民阅读,我馆可借鉴上海图书馆推出的“信用图书馆”方式,使用芝麻信用积分代替押金办证。图书馆无需收取押金,直接进行诚信借还。例如,芝麻信用评分超过550分的用户,无需缴纳押金,即可办理读者证;评分为550分~600分的读者,一次最多可借阅3本书;评分为600~700分的读者,一次最多可借阅5本书;评分超过700分的读者,一次最多可借阅7本书。这种“互联网+图书馆”的信用借还模式,不仅可以省去与读者在押金上的纠纷问题,提高读者办证量,扩大服务范围,而且可以促进图书馆服务的创新,推动信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2015-03-17)[2017-05-20].<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17/c64094-26702593.html>.
- [2] 张兴旺,李晨晖.“互联网+图书馆”顶层设计相关问题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5(5):33-40.
- [3] 郭自宽,张兴旺,麦范金.大数据生态系统在图书馆中的应用[J].情报资料工作,2013(2):23-28.
- [4] 程超,仲多.基于自媒体的企业营销研究[J].时代金融,2013(4):278-279,285.
- [5] 2016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发展报告[EB/OL].(2017-03-10)[2017-05-20].<http://www.bigdata-research.cn/content/201703/396.html>.
- [6] 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EB/OL].(2015-01-05)[2017-05-20].http://www.gov.cn/xinwen/2015-01/05/content_2800381.htm.

作者简介: 汤青(1990—),女,厦门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17-07-31

4.2 以用户为中心,构建个性化服务

在“互联网+图书馆”的新型服务模式下,图书馆必须从自身着手,以用户为中心,主动为用户提供满足其个人偏好的个性化服务。一方面,通过对用户的检索日志、流通日志、浏览痕迹、下载数字资源等数据进行记录,分析并提炼成关键字,在图书馆信息库中进行全面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比对后,把形成的个性化检索结果推荐给读者。另一方面,图书馆系统在读者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记录一些关键字搜索、到馆状态等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比对、分析、挖掘,形成书籍闲置与时间的对应关系序列。图书馆系统就可以将这些闲置的书籍重新推送给相关读者,从而提高图书利用率并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5 结语

“互联网+图书馆”服务模式,顺应了时代潮流,稳定了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为推动全民阅读起到了促进作用。该模式在满足新媒体阅读需求、资源检索方式、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存在着优势,但也存在制度不健全、技术不完善、馆员信息素养不高、服务模式创新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图书馆应始终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贯穿于读者服务工作中,在保证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为其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针对性的服务,引领图书馆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 工作研究 ·

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与服务研究

——以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为例

韩小亚

(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 文章介绍了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色数据库“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的建设过程及深化特色服务的举措。建设过程包括:凝练选题特色,进行专家论证;多方共建共享,保障建设质量;线上线下同步建设,明晰建设规范;专设“本校研究学者”项目,彰显本校研究成果;检验建设成果,指引完善方向。服务举措包括:培育特色馆员,开展专项服务;融合学科服务,提供多元服务形态;增强服务功能,吸引用户参与;后续建设动态化、常态化,保障数据库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与服务的4点建议。

关键词: 特色数据库建设;数据库服务;地方高校图书馆;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

中图分类号: G250.74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Local University Library——Take the "Qin and H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ic Research Database"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Qin and H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ic research database" of th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measures to deepen its characteristic special servic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es: compa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rrying out the expert demonstr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nline and offline synchronous construction and clearing the construction norms, specifically setting up the scholar project of the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highlighting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verifying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 and guiding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 The service measures includes: cultivating characteristic librarians and carrying out special service, providing multiple subjects service and varied service forms, enhancing the service function to attract the users' particip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dynamic and normalization of the following construction to ensure the vitality of the databas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four suggestions about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local university library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construction; database service; local university library; qin and h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ic research database

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是高校根据其地域特色和学科特色,依托馆藏文献资源,针对师生教学科研需求,对特色专题资源进行收集、分析、整合、存储,并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本馆特色资源进行数字化,建成可满足师生科学研究的数据库^[1]。中国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专设“全国高校专题特色数据库”,倡导高校建设特色数据库。《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中,特色数据库建设是评估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指标^[2]。高校图书馆进行特色数据库建设,是顺应图书馆学领域发展

趋势,主动开展、深化特色专题服务的举措。“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始建于2014年11月,于2016年4月建设完成。该数据库基于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自身丰富的秦汉文献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汇集国内秦汉史研究文献、视频动画、图片信息资料等数据,融秦汉史学术文献研究、考古文物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典藏古籍研究、秦汉科普知识于一体,为咸阳师范学院秦汉文史学科建设以及学术研究提供学习、研究和交流的多媒体网络平台。本文旨在介绍该特色数据库的建设过程及深化特色专题服务的举措,以期为其他地方高校图书馆开展特色数据库建设和服务提供经验借鉴。

1 “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的建设过程

1.1 凝练选题特色,进行专家论证

在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切忌资源建设相近,特色不明。特色数据库之所以成为特色,在于其独一无二的“资源特征”,不仅是指特色数据库的内容,而且包括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及构架方式^[3]。独树一帜、特色鲜明的数据库不仅能够满足特定用户的特定需求,而且能够推进地方高校在特色学科研究领域的持续深入,提升高校在特色学科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咸阳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咸阳师范学院秦汉史研究氛围浓厚,学报设有“秦汉文史研究”专栏。图书馆充分挖掘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秦汉文史资源,传承并彰显秦汉文化精髓,致力于建设地域特色鲜明、内涵深厚的“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

专家论证是特色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进行特色数据库建设前,图书馆邀请了秦汉文史领域多名专家对数据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创新性、预期服务效果等进行了前期论证,以保障特色数据库的鲜明特色与建成后的服务效用。专家论证认为,该数据库选题特色鲜明,学术特色与地域特色兼备,研究领域用户需求强烈,数据库服务空间大,有建成特色数据库的必要性;图书馆具有秦汉文史各种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源,学校有秦汉文史研究领域专家,特色数据库建设具备可行性;前期调研未发现其他高校图书馆有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数据库,项目建设具有创新性;学校现有用户及潜在用户对秦汉文史资源需求较

强,特色数据库建成后服务效果预期良好。

1.2 多方共建共享,保障建设质量

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不能依靠图书馆单方面的力量。图书馆单方面的建设模式因受限于人员、技术、资源等多种因素,难以保障数据库的建设质量与后期服务效用。多方共建数据库的模式可有效发挥参与方各自的特长与优势,弥补图书馆单一建设数据库的不足。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根据特色数据库框架构建的不同领域,选择与文学与传播学院、资源环境与历史文化学院、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其他高校等多家单位,以及秦汉史研究专家等个人合作,共同建设特色数据库,以保障特色数据库各领域各类型资源的客观性与权威性,真实再现秦汉历史文化原貌,为学校学科研究与特色研究提供深度服务。根据“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的建设框架和具体内容,图书馆和参与方共同组建成“文献资源采集团队”“文献资源加工团队”“数据库平台建设团队”“数据库技术维护团队”,以保障数据库建设的质量与进度。

1.3 线上线下同步建设,明晰建设规范

在建设“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的同时,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还打造了互联网+线下秦汉文史纸质图书阅览库,目的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将“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线上电子资源与传统线下秦汉文史纸质资源进行深度融合,实施线下纸质资源与线上电子资源的对应建设与匹配建设模式。线上“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与线下秦汉文史图书阅览库融合发展,深层互动建设,形成具备一定学科影响力的秦汉文史特色资源体系,服务于学校特色学科建设,提升学校在秦汉文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标准化是数据库建设的前提条件,是实现数据库资源利用和共享的关键^[4]。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按照数据库管理系统标准和数据著录标准进行,以保证特色数据库的系统性、完整性、连续性和兼容性。在线上线下同步建设的同时,为了提高数据库的建设质量,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制定了《文献资源采集规范》《分类体系》《专业主题词表》等建设规范,并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资源采集严格按照《文献资源采集规范》操作,《数据著录标引规范》兼顾CALIS特色数据库建设规范与地方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特点,在对数据进行常规分类标引的同时,亦针对数据库特色进行了特色主题分类导航。

1.4 专设“本校研究学者”项目，彰显本校研究成果

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在特色数据库“研究学者”框架中专设“本校研究学者”项目，收集由本校学者发表的秦汉文史研究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收藏的图片视频、参加的会议资料等，共收集本校研究秦汉文史的20余位专家学者的资料。特色数据库彰显了本校的研究成果，将地域特色与学科特色有机兼容，有利于形成不同研究分支的研究团队、整合细化研究方向，拓展秦汉文史研究广度，深化秦汉文史研究深度，提升本校秦汉文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1.5 检验建设成果，指引完善方向

专家验收是数据库正式投入使用前至关重要的一环，既是对特色数据库建设成果的评价与反馈，也是对数据库后续完善的方向指引。在整个数据库建设完成后，图书馆组织秦汉文史领域专家对数据库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主要集中于数据库选题、特色、内容框架、模块、技术规范等方面。专家验收认为，“秦汉文史学术文献数据库”选题立足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鲜明；内容框架及模块科学规范，技术先进，是目前国内独一无二的秦汉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无论是其学术价值、应用价值还是市场经济价值，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2 深化特色服务的举措

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特色数据库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用户。数据库建设固然重要，建成后的使用也同样重要。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通过以下4种方式促进数据库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2.1 培育特色馆员，开展专项服务

图书馆培育特色馆员，开展特色数据库专项服务。特色馆员贯通式负责整个特色数据库的资源采集、数据录入、框架构建、师生沟通、推介宣传及规划发展等。服务采用“特色学科馆员负责、特色采访馆员参与、秦汉文史研究领域专家指导”机制，三方职责分明，目标明确，共同保障特色数据库的服务与利用。明确特色学科馆员在特色数据库服务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开展特色数据库服务工作的前提；强调特色采访馆员的参与性，可以充分调动采访馆员协作服务的积极性；强化秦汉文史研究领域专家在特色数据库服务中的指导地位，能够保障特色数据库建设与服务

工作的方向。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服务的顺利开展是特色馆员间相互支持、配合与协作的结果。

2.2 融合学科服务，提供多元服务形态

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提供的服务形态多元，虚拟数据库与实体阅览库并存，既提供线上数据库服务，亦提供互联网+线下纸质资源借阅服务。二种方式互为配合，共同满足秦汉文史研究用户不同载体、不同方式、不同习惯的需求。特色数据库服务融入学科服务，将特色数据库内容嵌入秦汉文史课堂，直接渗透到教学课堂、学习研讨活动等场合，使特色数据库内容的使用成为师生课堂教学的一部分，让图书馆成为学校学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不仅如此，秦汉文史纸质图书阅览库还成为教师、学生的上课场所，由图书馆特色馆员负责为学生讲解授课。这种方式使特色数据库和学科深度融合，同时也对特色馆员的秦汉文史素养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深化了学科服务的内涵。特色馆员在授课活动中进一步了解、掌握用户的需求，双方互相推动、互相支持，形成特色数据库与秦汉文史学科良性互动发展的模式。

2.3 增强服务功能，吸引用户参与

如果一个特色数据库服务功能过于简单，就无法有效吸引用户，从而导致特色数据库访问频率低下、利用效率不高^[5]。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分析用户使用需求，面向用户提供特色数据库的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①特色专题化服务，提供订阅需求推送、个性需求信息定制、秦汉文史专家咨询等功能；②多样化检索服务，提供高级检索、快速检索、结果检索、跨库检索等功能；③日志服务，向用户提供资源访问、信息检索、系统操作等详尽日志查询功能；④统计服务，向用户提供浏览、检索及下载等操作的系列统计功能；⑤特色文献传递与更新服务，“秦汉文史学术研究文献库”中没有或者不完整的文献资料，图书馆负责提供文献传递满足用户需求，并及时补充、完善更新功能；⑥特色课题跟踪支持和学科服务，依据本馆特色数据库及其他关联数据库信息资料数据，向用户提供深度课题分析、秦汉文史研究领域知识发现、秦汉文史主题推送等学科服务功能。在增强服务功能的同时，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非常重视用户建设特色数据库的参与度，与用户共建共享，以保持特色数据库

的持续利用率。

2.4 后续建设动态化、常态化，保障特色数据库生命力

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初建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整个数据库建设的结束，相反，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才刚跨出了第一步。建库时不可避免会遗留各种问题，如资料不全、文献载体单一、数据不规范等，在数据库的后续建设中，图书馆需持续补充完善资料、修正数据。对于秦汉文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资料、新情况、新问题、新数据、新观点、新的学术争鸣等，图书馆需及时、规范、客观使其全部进入特色数据库，使特色数据库处于持续更新的发展状态，保持活跃的学术生命力，保持原有用户，吸引新的用户，夯实特色数据库的根基，持续增强特色数据库的影响力。特色服务团队还与秦汉研究领域专家保持常态化合作发展关系。专家参与特色数据库的更新完善，既推荐最新资源，也指出不完整资源；既为数据库提供数据资料，也为数据库查漏纠错。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对特色数据库进行及时修正、维护并更新，是保障数据库生命力与系统稳定、安全与运行效率的基本措施。除了和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特色服务团队还动态关注特色数据库使用中出现的問題，及时总结分析并解决问题，使服务用户动态化、常态化，发挥特色数据库的最大效益。

3 对地方高校图书馆开展特色数据库建设和服务的建议

3.1 注重特色数据库的知识服务研究

建设特色数据库的最终目的是揭示某一学科领

域的知识关联与知识体系，构建具有知识框架、知识分析、层层递进、关系密切的知识集合体。对特色数据库建设的思考应跳出现有的层面，上升到知识服务与智慧服务的高度。因此，地方高校图书馆在建设特色数据库时，应注重数据库知识管理及知识服务等方面的研究，重视数据之间的关系多于数据本身，避免出现数据孤岛问题，从数据关联、数据整合等角度提升数据库服务教学科研的能力与水平。同时，特色数据库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对文献的表面描述上，而是要深度分析、挖掘、整合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通过分析融合预判学科的发展走向与趋势。

3.2 推进特色数据库的效益评价研究

推进特色数据库资源评价研究，优化特色数据库投入与效益比率。科学核算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成本、维护成本、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及隐含成本等，特别是特色数据库的存取成本，建立投入成本—服务效益模型，明确数据库的投入成本与服务目标效益。目标效益应该包括：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保障指数、服务内容与数据库功能提升指数、数据库知识服务对教学科研工作支持指数等。通过投入成本—服务效益评价，实现特色数据库投入与效益的最佳比率。

3.3 增强特色数据库社会价值研究

地方高校特色数据库应该集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于一身，它是以学术特色为支撑、以社会需要为对象的学术发展平台^[6]。建设好这样的平台离不开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双向支撑。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未来的发展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服务导向，重视社会效益，做到既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亦服务于社会需求，保障特色数据库的服务社会价值，对地方文化社会发展产生直接效果和影响。

参考文献：

- [1] 王喜和,傅林红.特色之困:国内大学特色数据库建设现状与反思[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4):47-58.
- [2]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修改稿)[EB/OL].[2017-06-22].<http://subweb.nctc.com.cn/twxzx/news.asp?id=373>.
- [3] 曹志梅.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之困境突围[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6):90-92.
- [4] 李辉,迟玉琢,胡乃志.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现状调查分析[J].图书馆建设,2014(8):64-66.
- [5] 王丽.全面质量管理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质量控制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7):105-108.
- [6] 刘青,高波.美国州立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J].图书馆,2017(3):72-80.

作者简介：韩小亚（1973—），女，咸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7-09-01

· 工作研究 ·

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华东杰

(宁波市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10)

摘要: 文章介绍了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现状,针对其存在的图书资源利用率不高、公共阅读管理不到位、阅读推广服务手段不丰富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统筹规划,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图书馆协调机制;精准帮扶,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机制;创新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供给机制;多措并举,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人才机制。

关键词: 公共阅读;农村工作;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59.2755 文献标识码: A

On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Public Reading Service System in Cixi and Measures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ural public reading service system in Cixi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main problems such as low utility of resources, public management out of place, poor means of reading promotion, and makes proposals on improvement of such a system: overall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ural public librar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argeted assist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ural public reading service mechanism,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ural public reading supply mechanism, and multiple measure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rural public reading talent mechanism.

Key words public reading; rural work; service system

1 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和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以促进全民阅读为宗旨的读书节等阅读推广活动,有力促进了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发展,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

同时,原本受城乡文化二元体制影响和制约的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活动也蓬勃兴起,国家相继启动了农家书屋、文化礼堂、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等一大批旨在保障基层民众文化权益、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的实事工程^[1]。2017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更是明确指出: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这些实事工程的推进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在推动文化精准扶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 本文系慈溪市2016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6SKY005)的研究成果。

2.1 总体情况

近年来,慈溪市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年,实现了镇(街道)公共图书馆市级分馆的全覆盖,形成了覆盖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依托镇公共图书馆、村图书阅览室等文化阵地,建设面向基层群众免费开放的公共电子阅览室,创建了全省第一家移动数字农家书屋,并向村民提供数字化阅读推广服务,较好地满足了基层群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2013年,慈溪市被评为“浙江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同时,慈溪市根据本地特色和群众需求,创新推出“送、办、创”三联动的文化阅读产品供给网络和“你点我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配送机制。2016年,向全市文化礼堂、村图书阅览室等文化阵地推送图书3万余册,为全民阅读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利用各类载体打造公共阅读服务新名片,扩大社会影响力。每年举办全民读书月、农民“种文化”暨新慈溪人文化活动月、兰街民俗文化节等各类面向农村的阅读推广活动,吸引了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参与,有力推动了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2.2 现状调研

为全面了解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状况,课题组选取了整体阅读氛围较好和文化气息较浓的慈溪市崇寿镇傅家路村、龙山镇西门外村、逍林镇振兴村等地为调研样本,于2016年10—12月间,通过现场访谈、问卷调查、实地察看和小组座谈等方式,开展农村公共阅读情况调研。

为更加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阅读情况和阅读需求,课题组开展了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测评,共发放纸质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8份,有效回收率93%。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89%的人知道本村有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63%的人表示去过农家书屋;74%的人认为建设农家书屋很有必要,14%的人认为没有必要,12%的人认为无所谓;63%的人对农家书屋的书刊较满意,23%的人认为一般,而14%的人表示不满意。其中在“您更喜欢阅读哪类书籍”的选项上,有31%的人表示喜欢故事类,27%的人喜欢娱乐类,19%的人喜欢历史类的,14%的人喜欢农技类,9%的人喜欢其他类。在“最希望开展阅读推广服务”选项中,有43%、31%、12%、8%、6%的人分别选择讲座、展览、阅读比赛、读书会和其他。

2.3 存在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可以看到,慈溪市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在设施保障、服务规范、资源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①图书资源利用率不高。有的图书阅览室虽然摆满了书,但借的人不多,能真正利用图书学习知识技能的人更少。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书籍不符合基层群众的需求。通过调研得知,基层群众最喜欢看故事类、娱乐类等消遣型书刊,但在农村图书阅览室里看到最多的是政治类、理论类专业型书籍。②公共阅读管理不到位,文化阵地效果发挥不明显。有的图书阅览室没有固定的开放时间,有的村没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有的图书管理员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不能开展相应的图书推荐活动。③阅读推广服务手段不丰富。有的图书阅览室有一定数量的电脑,但真正使用的不多,利用计算机进行数字阅读推广的更少。有的村虽然每年举行一定数量的阅读推广活动,但只限于征文、展览等内容,并没有很好地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

3 对策

3.1 统筹规划,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协调机制

目前,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基层图书馆建设,宣传部门牵头文化礼堂工作,新闻出版广电局实施农家书屋工程。由多个单位不同部门负责同一个行业的具体业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基层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整体规划、资源统筹、效能提升极为不利。

建立适应新时期农村发展需求的公共阅读服务体系需要理顺各方关系,明确各方职责,打破部门和行业壁垒,制定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在具体工作中可采取组团式服务和网格化管理的协调机制,通过协同共享模式,重新分配、整合、利用文化信息资源,将分散在不同行政层级和不同服务领域的公共阅读与信息资源整合成为一个高度共享、有序运行的集成系统,最大程度满足基层群众对公共阅读信息资源的需求,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的构建奠定良好的组织保障^[2]。

3.2 精准帮扶,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机制

多年的实践表明,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的關鍵在基层,效能发挥最大化在基层,建设难点也在基

层。基层文化建设特别是村级图书室、农家书屋由于受到经费、人才、图书流通更新、信息资源服务保障等制约,发展比较滞后。

应根据农村群众文化需求和基层文化建设现状,明确发展短板,制定帮扶规划,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通过设立农村公共阅读事业发展基金、建立基层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等形式加大扶持力度^[1]。同时,要建立城乡对口援助和帮扶机制,通过城乡点对点精准帮扶、志愿者行动计划等形式,形成合力,共同支持基层文化建设,创建“以城带乡、乡城互动、填平补齐”的良好局面,促进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

3.3 创新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向基层群众提供充足、优秀的文化产品,满足农村群众的阅读需求,提升文化生活品味,培养基层群众良好的阅读习惯。这就需要我们创新发展,整合各类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做好纸质图书实体服务与网络虚拟数字服务相结合的推广工作。一方面要向基层群众提供多类型、正能量、雅俗共赏的纸质实体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先进技术和手段,提供各类适合群众喜好的虚拟文化产品、数字文化资源,以满足基层群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和文化体验。

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供给机制,一要加强乡镇、村级图书馆农业科技信息数字资源建设,充分整合馆藏和网络两大信息源,形成范围广、时效强、多样性、易检索的数字资源库,提供网上信息导航、参考咨询和数字视频教学等个性化服务,使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4]。二要加强基层服务点的建设和整合,将共享工程和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共建共享,实现

互利双赢,开展网上预约借书,异地借还书等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和管理力度,定期推送优秀数字资源,开展数字文化推广活动,培养基层群众的网络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3.4 多措并举,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人才机制

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一支文化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热爱本职工作的队伍。基层文化设施特别是基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方面要懂得图书分类、编目、外借、保存等专业技术,另一方面也要充当窗口阵地宣传员和优秀文化传播员,引导、培养民众良好的阅读习惯。

各级文化单位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要承担起培养各乡镇、村级图书馆人才队伍的重任,真正把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构建落到实处、落到基层,切实提高基层图书馆的服务效率、服务质量和水平。开展阅读推广人培养计划,面向社会各界,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鼓励社会热心人士成为阅读推广志愿者。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建立健全优秀管理人才的培育、选拔和奖励机制,建设一支专业性强、业务素质高的基层文化管理队伍。

4 结语

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协作,要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公共阅读的协调机制、服务机制、供给机制、人才机制,全面打造成成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进一步整合基层文化资源,激发农村文化活力,消除城乡文化鸿沟,提升农村文化建设层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 [1] 欧阳红.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战略[J].图书情报工作,2011(2):1-6.
- [2] 张忠凤.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6(3):80-83.
- [3] 李艳英.河北省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长效运行机制建设[J].河北大学学报,2015(11):120-124.
- [4] 吴自勤.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体系问题之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5(10):71-73.

作者简介:华东杰(1979—),男,宁波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7-05-31

· 文献学研究 ·

论《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

——兼论《四库全书》的修书用意

顾一凡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主要由经、史、子、集各部的大序,各小类的小序以及诸书提要组成,而无全书总序。但是,卷首所载的历次圣谕实际上充当了全书的总序,《四库全书》就是在圣谕修书意见的指导下完成编纂的,这一点在凡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二十则凡例中,有八则是对历次圣谕所传达的修书意见的呼应。探究圣谕中所传达的修书意见以及凡例对此的呼应,亦可以管窥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圣谕;凡例

中图分类号: G257.3 **文献标识码:** A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Responding to Opinions of Imperial Edicts: On the Intents of Compiling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s composed of prefaces of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belles-letters, prefaces of subcategories and abstracts of all books, but has no general prefaces. However, the imperial edicts recorded in the beginning of each volume serve as a general preface.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was compil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imperial edicts, which can be seen clearly from the explanatory notes. Among the 20 notes, eight responded to opinions of the imperial edicts. An exploration of the opinions and responsive explanatory notes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Emperor Qianlong's intents of compiling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mperial edict; explanatory note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朝廷官簿,收书多达万余种,基本涵盖了清乾隆朝之前所有重要的古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以经、史、子、集四部为纲领,各有大序;四部之下又约分小类,各有小序。这些大、小序加上诸书提要,共同构成了这部目录学巨著。但与历代官修目录书略有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以凡例起始,并无特意撰写全书的总序。徐有富先生曾在《目录学与学术史》中提到这一现象,他认为:“《总目》没有序,卷首《圣谕》实即《总目》之序。”^[1]这一看法是十分精

当的,而卷首所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圣谕也可以解释未撰写全书总序的原因:“《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成书之日,篇帙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卷首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著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2][13]}由此可见,并非未撰写总序,实是有意为之,以圣谕代替全书总序。那么,为什么关于修纂《四库全书》的历次圣谕可以被视作全书总序呢?大致有3点原因:首先,乾隆皇帝对修纂《四库全书》认识的不加深,均以历次圣谕中所透露的修书用意为参

照^①；其次，各种体例的采用，譬如编排次序、版本著录、提要撰写，均以历次圣谕所传达的修书意见为指导；最后，对著录书、存目书的去取、酌改甚至销毁，均以历次圣谕中所隐含的修书理念为标准。可以说整部《四库全书》都是围绕着圣谕的修书意见进行编纂工作，而最能集中、直观地反映这一点的便是《四库全书》的凡例。二十则凡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和执行。于是，深刻理解圣谕的修书理念以及凡例对圣谕的呼应，既可以探寻乾隆皇帝对修书工程的意图，又可以从馆臣（或称皇家学派）的角度对圣谕有新的认识和思考。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圣谕提出了哪些修书意见以及凡例如何执行这些修书意见，并从中管窥乾隆皇帝对于修纂《四库全书》的用意。

1 圣谕中传达的修书意见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圣谕，武英殿本有20则，浙本有23则，下文均依据武英殿本进行考察^②。诚如上文所言，乾隆皇帝对修纂《四库全书》的认识不断加深，愈加坚定编修这一巨著的决心，因此为了清晰、直观地看出乾隆皇帝的整个认识过程，以下试将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分为两阶段，归纳出这两个阶段里乾隆皇帝所传达的具体的修书意见。

1.1 第一阶段：访书与辑佚

从历次圣谕来看，乾隆皇帝并非一开始就有编纂《四库全书》的意愿，起初乾隆皇帝只是致力于倡导文治，稽古右文，因此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下旨按重要程度^③不同购访藏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又因为朱筠上疏，意在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书。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的圣谕中应允这一提议，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六日下旨，不但要求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并且要效仿内府藏本，摘叙各书要旨。随后，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的圣谕中还指出类书有贪多务得、体例未允的弊端，辑出的书应以四部分类汇总。此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十七日的圣谕中，乾隆帝还提出所辑之书应当择善善录，而俚浅者只存书名，这为日后将所辑之书分为应刻、应抄、应存三类以及编纂《四库全书》时将书籍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二类的做法埋下伏笔。

数月之后，乾隆皇帝亲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并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圣谕中表示认可这些书目的编排体例和提要的撰写。

与此同时，搜访旧书的工作还在继续，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下旨表彰进书较多的藏书家，赐《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希冀其他藏书家能够踊跃献书。又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二十五日再次表彰进书较多的藏书家，赐名“藏书之家”。除此之外，还提出编纂《四库全书》提要的具体要求，并着手编纂《简书目》。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十七日，乾隆皇帝批阅所辑之书，发现书中有青词一体，词涉异端，应全部删去，以彰悉归雅正、鉴古斥邪之意。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初一日受所辑之书启发，下旨任命修书官员。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下旨，抄录《四库全书》时，将关帝谥号改易为忠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三十日降旨，将《四库全书总目》^④及提要编次刊行。

以上圣谕所反映的修书工作均属第一阶段，此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搜访旧书和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书。由此可见，进一步搜访旧书的关键在于鼓励各地藏书家进书，而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则初步反映了乾隆皇帝追求雅正忠义、大公至正的文治思想。

1.2 第二阶段：校勘与酌改

因各省遗书送到，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十七日下旨，要求区别甄核进呈书籍，酌情改易或销毁，以彰大公至正之心。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也亲览进呈的遗书，譬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初七日降旨，书中直呼汉武帝的名讳，于理不顺，故酌情改称为汉武。又如馆臣为求避讳，篡改儒家经典中所出现的“夷狄”二字，故乾隆皇帝特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四日降旨要求馆臣悉为更正，毋再轻率改字。再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二十六日降旨，认为馆臣选出的违碍应毁书中亦有切中时弊、匡正时艰者，毋庸销毁，应酌情改易。由此观之，乾隆皇帝的确披阅了大量书籍，正如凡例中认为《四库全书》与“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2]34}，此言不虚！

《四库全书》初稿约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十七日时，或已大致完成，因而下旨编纂《历代职官表》，以示沿袭

正统,并列入《四库全书》刊行。此外,也许因为编修工作接近尾声,乾隆皇帝及馆臣开始思考编排次序问题,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十三日降旨,将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将卷首所录乾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分列御制诗文名集之前,以彰大公至正之意。但两天后,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十五日,乾隆皇帝再次降旨,认为之前圣谕旨意于体例未协,应当按照撰述人生卒年份的先后顺序依次编纂。最终,馆臣正是依此旨意编排《四库全书》次序。

编修工作临近收尾时,乾隆皇帝对修书的认识已经成熟和完整了,对著录书目的去取与酌改已经十分熟稔了。譬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十六日降旨,称《契丹国志》“体例混淆”,当加以厘正;又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二十七日降旨,称明臣奏疏切中时弊,有裨本朝,不可以人废言,以求大公至正。再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要求撤出八咏诗之类有乖雅正的诗歌,当采有关世道人心的诗文。

以上是圣谕中反映的修纂《四库全书》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由对《永乐大典》的辑书转向对访求得来的遗文旧书进行校勘考察,对一部分有违碍字眼的内容酌情改易,对有乖雅正、有害于世道人心的书悉数删去不录,以此彰大公至正之善。当然,列于卷首的圣谕本身就是被美饰过的文化政策宣言,实际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改、所删、所禁、所毁之书不胜枚举,其原因也许只是莫须有地影响清王朝统治,因而被删,所以圣谕所说诸如“大公至正”“衡鉴千秋”之类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接受,而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2 凡例对修书意见的呼应

诚如前文所说,凡例是整部《四库全书》中最能集中反映馆臣对圣谕修书意见执行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1)所谓凡例,顾名思义,即发凡起例,今多指书前说明本书内容或编纂体例的文字^{[3]285}。上文提到整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都是围绕圣谕为核心展开的,那么,作为精要地说明整部书内容及体例的凡例,应当能够最为集中地反映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即

圣谕的修书意见。

(2)伴随着乾隆皇帝对修书认识的不断深化,《四库全书》的体例也是随之而变化的,而体例最后定稿为凡例,因此可以说凡例是圣谕修书思想的最终形态。譬如乾隆皇帝对于御制诗文编排次序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最终得出合乎体例、合乎历史规律的做法,凡例则顺应乾隆皇帝的旨意,以乾隆皇帝提出的编排次序为准。

(3)凡例由四库馆臣,特别是一批精通目录学、考据学的学者,结合多年修纂经验,汇总拟定而形成的。既有圣谕思想的指导与干预,又符合学术,特别是目录学本身的固有规律。既有推崇文治、政治百姓的意味,又可以视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坦途。既有帝王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又经过朴学家扎实的考据和不懈的努力而付诸实践。因此凡例既可以说是馆臣对圣谕的执行,亦可以说成馆臣对圣谕理解之后的再创造和实物化。

由此观之,凡例应当最能集中精要地反映圣谕所透露出的修书思想,也最能呼应圣谕中所传达的修书意见。凡例共有二十则,概括来说,即亲览圣裁,文治之功;乾隆御撰,仍从四部;特创新规,等差有辨;据典立目,择善而从;约分子目,条理秩然;考校原书,不失其真;注明底本,先后为序;笺释从注,辑旧为述;各撰提要,巨细不遗;源流正变,分并改隶;姓名爵里,不复赘述;考证精核,倡导实学;敦崇文教,去取谨严;摒弃空言,务求实用;杜绝朋党,务核其真;文德两分,彰善瘅恶;采录协中,兼收并蓄;伪书录存,讹妄注明;九流方技,不以为重;已有定论,不复赘议。以上二十则凡例并非全部与圣谕一一吻合,上文也提到了凡例还是要注重目录学本身的实际情况,对一些具体专业的学术问题,乾隆皇帝没有在圣谕中提到,但凡例却不能不列出。除此之外,有八则凡例可以直接从圣谕中找到源头和依据,因此特在表1^⑤中列出,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凡例对圣谕修书思想的呼应和执行情况。

除了上表中列出的八条凡例外,还有十二条凡例并未在圣谕中被明确地提到,分别是:据典立目,择善而从;约分子目,条理秩然;考校原书,不失其真;笺释从注,辑旧为述;源流正变,分并改隶;姓名爵里,不复赘述;考证精核,倡导实学;摒弃空言,务求实用;杜绝朋党,务核其真;采录协中,兼收并蓄;伪

表1 凡例对圣谕修书思想的执行

圣谕	凡例
举何为序? 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首卷以当序, 事属可行。	谨录历次恭奉圣谕为一卷, 载诸简端。
着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 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 俾各为卷首, 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	而我皇上道秉大公, 义求至当……特命各从门目, 弃于国朝著述之前。
择其中罕见之书, 有益于世道人心者, 寿之梨枣, 以广流传。余则选派善录汇纂成编, 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伪谬者, 止存书名, 汇为总目, 以彰右文之盛。	其上者悉登编录, 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录, 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 则附载其名兼匡厥缪。至于寻常著述……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
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 可称为藏书之家, 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 ……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 至我朝钦定各书, 仍各按门目, 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	每书名之下, 钦遵谕旨, 各注某家藏本, 以不没所自。 《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 于义为允, 今从其例。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
……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 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 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	今于所列诸书, 各撰为提要, ……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
其中有青词一体, 乃道流祈祷之意, 非斯文正轨。	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 其倚声填调之作……并蒙皇上指示, 命从屏斥。
即或其人品谊未醇, ……亦不可以人废言。	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 两擅厥长, 代不一二。
其历代流传旧书, 内有阐明性学治法, 关系世道人心者, 自当首先购觅。	盖圣朝编录遗文, 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 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

书录存, 讹妄注明; 已有定论, 不复赘议。

这十二条凡例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目录学分类的原则标准, 包括设立小类与子目、考核旧书原旨、编排次序问题、大小序及提要的撰写、采录书籍的标准、伪书的录存等问题; 另一类则有关治学理念, 比如提倡实学, 又如杜绝朋党, 再如不做翻案工作, 遵循定论等。诚如上文所言, 这些治学理念或者修纂目录学的细节, 并不是乾隆皇帝的关注重点。然而这十二则凡例是否就脱离了圣谕的指导思想, 成为单纯的学术观点了吗? 实则未必, 举例来说, 乾隆皇帝下旨编纂《历代职官表》, 以示沿袭正统, 那么据历代正史艺文志立目, 是否也有如此用意? 再举一例, 圣谕中反复提到“大公至正”的修书理念, 因而在采录书籍时修纂者便以此为标准, 凡离经叛道之伦皆不采录, 凡有裨实学之言亦不湮没, 既选择学术正统者收入《四库全书》, 又对各家的学说予以保留, 力求做到“大公至正”。要言之, 凡例二十则其实均是在圣谕的指导下拟定的, 有些非常明确地执行了圣谕的修书意见, 另外数则凡例则暗含了圣谕的理念, 同时也呼应了乾隆皇帝真实的修书用意。

3 圣谕反映出的真实修书用意

上文详述了历次圣谕中的修书意见以及凡例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由此观之, 无论是乾隆皇帝先后降旨20余次, 并且抽阅大量进呈书籍, 还是馆臣忖度圣谕中的修书意见, 并且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完成这部目录巨著, 《四库全书》的修书用意都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一批学者认为乾隆皇帝修书意在禁毁民间遗书, 譬如鲁迅先生就曾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提到: “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因为他们变乱旧式, 删改原文。”^{[41][91]}诚然, 修纂《四库全书》禁毁了大量书籍, 篡改旧书之例更是不可胜数, 但禁毁与篡改是修书过程中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 是实然的结果, 而乾隆皇帝无论是起初从《永乐大典》中辑书或是修纂《四库全书》, 其用意绝不仅限于此, 应然的、理想的修书活动应该以圣谕中的修书意见为参照, 并从中管窥乾隆皇帝真实的修书用意。

通览20则圣谕, 其中反复提到过几个词汇, 如“稽古右文”“大公至正”。起初这些概念或许只是无意提起, 但愈往后, 特别是《四库全书》接近完稿时, 这些词汇不但被多次提及, 而且皇帝也以此作为文化政策去衡量四库馆进呈的书籍, 再参照凡例对圣谕中重要旨意的呼应, 可以试着推测这些词汇或政策也许才是乾隆皇帝的真正修书用意,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1) 乾隆皇帝修书是为了倡导文治, 教化人心。清朝满族统治者虽以八旗铁骑征服了中原, 但并非像元朝早期那般不重视文治。与此相反, 自顺治帝入关以来, 历代清朝皇帝都以文治作为施政的方针, 以笼络士子之心, 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举例来说, 清朝首位入主中原的顺治皇帝曾谈到: “今天下渐定, 朕将兴文教, 崇经术, 以开太平。”^[5]以文教化, 尊儒尊经, 以求太平。康熙皇帝也继承了这一施政方针, 他认为: “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 欲正人心, 厚风俗, 必崇尚经学。”^[6]将“治天下——民风、人心——尊经”联系起来, 意图了然。到雍正皇帝时, 他对文治的看法更加深刻, 他认为: “若无孔子之教, 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序之经, 昧于民彝物则之理, 势必以小加大, 以少凌长, 以贱妨贵, 尊卑倒置, 上下无等, 于名犯分, 越礼悖义, 所谓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

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17]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能够看出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文治对于教化世道人心、长幼尊卑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大有裨益。而乾隆皇帝对这一施政方针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一方面,乾隆帝尽力宣扬、渲染乾隆朝文治之盛,营造出文化昌明的景象。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即《永乐大典》辑书伊始,乾隆就降旨称:“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21]随后,乾隆皇帝又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十七日的圣谕中反覆阐明“以彰右文之盛”的修书用意^[2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二十五日颁行的圣谕中传达了“用昭我朝文治之盛”的修书意图与初衷^[25]。另一方面,乾隆帝以修纂《四库全书》为依托,大力鼓吹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旧书遗文,从而践行文治、教化民众的文化政策。圣谕中多次提到应当收录有益于世道人心者,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降旨:“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21]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十七日下旨:“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24]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称:“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25]由此观之,乾隆皇帝无论是听从朱筠上疏、从《永乐大典》中辑书,还是进一步编纂《四库全书》,其实际用意都是沿袭清朝既定的文化教化政策,倡导文治,以文安天下、求太平,因而对于有益于教化世道人心的书籍也就格外看重。

(2) 乾隆皇帝修书也有嘉惠艺林、启牖后学之意。《四库全书》作为官修目录的集大成者,与其他官修目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四库全书》修纂工作结束后,并非秘不示人,藏诸深宫,而是放置七阁以示人,“南三阁”甚至准许士子赴馆阅录。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此举可以愚化士子,甚至如鲁迅先生所说:“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41][91]}但此举无疑打破了传统官修书目秘不示人的积弊,使广大学子能够从中受益。乾隆皇帝在历次圣谕中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这个问题。譬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下旨:“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24]不但充实内府藏

书,更欲使天下学子受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初一日下旨:“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27]打破官修目录秘不示人的窠臼,愿与士子公天下之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三十日再次降旨:“凡所藏书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27]总体看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一方面仍是为了彰显乾隆朝文治之盛;另一方面,此举透露着乾隆皇帝笼络知识分子、教化其守正志学的深刻用意。

(3) 乾隆皇帝在修书过程中着力阐发其衡鉴千秋、大公至正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常以“大公至正”为理由确定《四库全书》中的某些体例,改易进呈书籍中的某些“于理不顺”之处,甚至改易违碍字眼、禁毁某人的著述。实际上,乾隆皇帝衡鉴千秋所持准绳并不一定“公”“正”,但却是出于维护统治、表明正统的政治目的,大抵是无可厚非的。试举关帝谥号一例,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圣谕中,乾隆帝认为“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溢,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溢,应改为忠义。”^[27]再如乾隆帝认为书中直呼汉武帝刘彻名讳不妥,应酌改为汉武帝。乾隆皇帝作出这些改易,虽然打着衡鉴千秋、大公至正的旗号,但实则应当是出于维系清朝正统地位、维护统治合法性的目的。

总而言之,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文字清查工作”,而应该是出于倡导文治、嘉惠艺林、衡鉴千秋的修书用意。当然,这3点只是修书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作为官修目录,修纂工作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改易、禁毁大量书籍的文化浩劫,如同硬币之两面难以避免。

4 结语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卷首所载历次圣谕提出了许多修书意见,多精当恳切;包涵了丰富的修书思想,可以充作全书总序。而全书凡例则倾力执行了修书意见,呼应了乾隆帝的修书用意,因此将凡例与圣谕对照考察,可以从馆臣的角度更加深入地理解圣

(下转第91页)

· 文献学研究 ·

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的学术价值及其缺陷

廖章荣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 傅以礼系晚清浙东地区知名学者, 所著《华延年室题跋》颇受后人推重。该书考证精审、详辨版本源流、重视明末清初文献的研究及古籍辨伪, 学术价值颇高。但该书除所收题跋不全外, 还存在题跋落款缺失以及失考等缺陷, 一定程度上有损它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傅以礼; 《华延年室题跋》; 学术价值; 缺陷

中图分类号: G256.4 **文献标识码:** A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adequacies of Fu Yili'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Hua Yan Nian Shi*

Abstract Fu Yili is a famous scholar in eastern Zhejiang area in late Qing dynasty. His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Hua Yan Nian Shi* is highly recommend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his book stresses precise review and clarification of version origin. It emphasizes research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ocument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seudograph, which is of high academic value. The literatur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re highly regard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is book is featured with incomplet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s well as defects like absence of inscribers and wrong textual research, which has to certain extent undermined its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Fu Yili;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Hua Yan Nian Shi*; academic value; inadequacies

傅以礼一生勤于治学, 涉猎广博, 其外孙俞人蔚说: “公为学一以乾嘉诸老为宗, 多识博闻, 长于考订, 自历代典章制度, 以及故书雅记、金石谱录、逸史稗乘, 靡不博综, 参稽瓠析其同异得失, 而于明季掌故, 搜讨尤勤。”^{[1]230} 《华延年室题跋》一书则集中反映了傅以礼的治学风格及其成就, 近人余嘉锡、朱希祖、柳亚子、谢国桢等人研究明末清初文献时, 都曾从中采择史料, 其文献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但迄今为止, 学界关于此书学术价值的研究, 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对《华延年室题跋》的学术价值及其缺陷进行系统考察, 以期有裨于此一问题的探讨。

1 傅以礼其人

傅以礼, 字节子, 原名以豫, 字茂臣, 号小石, 又号

节庵学人, 浙江会稽人, 寄籍顺天府大兴县, 故傅氏常自署“大兴傅以礼”。

傅以礼出生于一个“累世宦仕”的缙绅之家, 其父傅士奎, 字瘦石, 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山东德州知州, 在官9年, “百姓安堵”, 有“傅青天”之誉^①。傅以礼长兄傅以凝, 字静川,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春任山东陵川县令^②。次兄傅以绥, 字艾臣,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 曾在湖南安仁、攸县两地任县令, 在任期间“善政颇多”^[2]。傅以礼在举业上颇不得志, 屡试不第后, 傅氏于咸丰年间报捐同知, 同治六年(1867年)以县丞分发福建, 同治十二年(1873年)署台湾海防同知, 次年又署凤山县知县。光绪年间, 先后在福建兴化府、建宁府、福州府等地任职。自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 傅以礼在福州主持武英殿聚珍版书闾刻本的修补工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完成该

项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傅以礼卒,享年72岁。

傅以礼一生以读书、藏书自娱,其友李慈铭说:“岁丙辰(1856年),予馆君(指孙廷璋——引者注)家,傅节子以礼者居亦相近,三人皆嗜书,日出阅市,以所得奇秘相角胜,或互讦戡,有所创获,相告则喜跃大叫,宾客仆隶见者,无不愕贻以为狂。”^{[3]213}《绍兴县志资料》也说傅以礼“性好聚书,并嗜金石,收藏之富,几与孙氏平津馆相埒”^[2]。孙氏平津馆藏书之富,在东南一带享有盛誉,说傅以礼藏书“几与孙氏平津馆相埒”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可见傅氏藏书之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傅以礼藏书在战乱中散失殆尽,时隔多年后,他仍难以释怀。尽管藏书散失对他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傅以礼仍勤于治学,在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南明史等领域造诣颇深,有《明史续编》《明溢考》《华延年室题跋》等书传世,经傅以礼辑校的书籍则有数十种之多。

2 《华延年室题跋》的学术价值

傅以礼歿后,留下的著述并不多,其中《华延年室题跋》是傅以礼最负盛名的著作,但此书的刊印过程却颇费周折。傅以礼死后留下大量未刊题跋,其子傅枋“方欲校梓,遽于癸卯下世”,而傅以礼之孙傅开寿又“频岁客游,未遑继志”,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由傅以礼外孙俞人蔚整理铅印,定名为《华延年室题跋》,附有傅枋《蒹庐题跋》。此书收入傅氏所作题跋凡170余篇,基本按经、史、子、集分类,将全书分为上、中、下3卷,但下卷为《残明大统历》及《残明宰辅年表》,故题跋实为两卷,题跋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及金石学等方面,是傅氏学问的粹所在,正如俞人蔚所说,此书“虽不足以尽公之学,生平精诣所萃,略具是矣”^{[1]230}。《华延年室题跋》考证精审、详辨版本源流、重视明末清初文献的研究及古籍辨伪,这是此书的特色所在,其学术价值也因此而彰显。

2.1 考证精审

傅以礼素以精于考据而名誉当时,时人李慈铭说“平景荪、傅节子以礼皆精于考据,而文笔非所长”^{[3]189},而俞人蔚也说他“长于考订”。这在《华延年室题跋》一书中也有所体现,如《弘光实录钞》的作者,素题“古藏室史臣撰”,但傅以礼通过查考相关资

料,考证出“古藏室史臣”即黄宗羲,傅氏这一结论,已成为今天学界的共识。又如傅以礼对《所知录》《粤行纪事》《东明闻见录》《汉曹全碑》等文献的考订,也彰显了他深厚的考据功底。需要指出的是,傅以礼在考据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严谨也值得称道,如《行在阳秋》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是刘湘客,温氏的说法对后世影响颇大,然而傅以礼却发现《行在阳秋》一书对“五虎”多有贬词,而刘湘客为“五虎”之一,实在有悖常理,“且所载事迹间有引湘客之言为证者,其非湘客所作明甚”。他又发现《苏州府志·艺文类》中著录了《行在阳秋》一书,题戴笠撰,但由于没有看到此本,故为谨慎起见,只好存疑^{[1]131}。但剑心却依据《苏州府·艺文类》这一记载,贸然将《行在阳秋》的作者定为戴笠,谢国桢则轻信了剑心这一说法,认为此书系戴笠所撰,“湘客所撰者则别为一书也”^{[4]538-539}。实际上,剑心并没有看到题为戴笠所撰的《行在阳秋》,从而也就无法将两书进行对比,正如顾诚所说,将《行在阳秋》的作者定为戴笠实际亦无确证^{[5]858}。与剑心、谢国桢相比,傅以礼这种存疑的态度显然更为可取。

2.2 详辨版本源流

傅以礼一生阅书无数,精于古籍版本之学,《华延年室题跋》即有不少相关例证。如王夫之《永历实录》一书,今天已是常见之书,但在二百年前却甚为罕见,此书虽成书于清初,但“二百年写本仅存,为世罕见”,不仅《南疆逸史》《小腆纪年》等书都没有征引过,“即杨凤苞《南疆佚史》十二跋牖列明季稗野书目至数百种之多,亦遗此书”,此书经曾国荃刊刻后“始见传本”^{[1]131}。《保越录》一书,傅以礼所见有两个版本,一为杭州吴氏瓶花斋旧抄本,傅氏指出“今著录《四库》者即祖是本”;另一本为明代越中刊本,“袖珍坊刻即祖是本”^{[1]155-156}。值得注意的是,傅以礼几乎在每篇题跋中都注明了该书的来源,这为考察古籍版本的流传情况提供了相关线索。

2.3 重视明末清初文献的研究

《华延年室题跋》共收入170余篇题跋,其中明末清初文献的题跋占了近70篇,这显然与傅以礼的研究取向有关,俞人蔚说傅以礼“于明季掌故,搜讨尤勤”,与傅以礼同时的萧穆也说:“傅君熟于明季时事,所藏明季人著述极多。”^[6]傅以礼对明末清初历史感兴趣应萌发于童年时代,傅以礼说:“余髫年(即

童年时期)即好读史,时是书(指《明季稗史汇编》)新出,伯兄以重直购归见贻,藏之二十余年矣。”^[112]傅以礼一生钟情于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与此事不无关系。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之前,傅以礼已搜集了上百种明季以来的野史,但不幸毁于“辛酉之乱”。傅以礼华延年室所藏明季文献,不仅数量众多,还有不少罕见之书,时人叶昌焘说:“杨秋室所见明季野史,外间不传之本,傅节子太守处有十余种。”^[17]后世学者对《华延年室题跋》所收的明末清初文献题跋颇为重视,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柳亚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收入《怀旧集》)等书都或多或少征引过《华延年室题跋》,其中也不乏推重之语,如柳亚子对该书所附的《残明大统历》和《残明宰辅年表》评论道:“《残明大统历》起弘光元年乙酉,至永历三十七年癸亥东宁沦陷为止,所见甚正。《宰辅年表》(即《残明宰辅年表》)则上起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安宗监国南都,下迄永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昭宗蒙尘缅甸……亦后人撰南明史者不可缺少之参考书也。”^[18]谢国桢则说:“(傅以礼)著有《华延年室题跋》三卷,考证明季野史甚详。”^[19]柳亚子、谢国桢均为南明史大家,他们对此书的评价值得重视。

2.4 涉及古籍辨伪的贡献

《华延年室题跋》对古籍辨伪也有涉及,其中最典型的是对二卷本《南渡录》的辨伪。李清《南渡录》因内容触及清廷忌讳,长期未公开刊刻,素以抄本行世。但当时坊间竟有二卷本《南渡录》销售,傅以礼经过对比后,指出二卷本实为贗本,“书贾因其流传不广,另从野史中杂刺福王事迹,编为上下卷,并割《也是录》旧序弁首,假托是书。自此遂有真贗两本。”^[1112]后世学者谈及《南渡录》版本时,多引傅氏此说,如朱希祖说:“数年前于友人处借得《南渡录》二卷,题李清撰,亦尝逢录一部,然不类清撰,以与清所撰《三垣笔记》语多抵牾,则正傅氏所谓贗本也。”^[10]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也说:“《南渡录》,记弘光一代时事最为详允,今流传者共有二本:一为二卷本,且傅以礼所谓刺取福王事迹为上下卷之伪本,二为五卷本。”^{[4]188}傅氏这一结论已为学界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华延年室题跋》正式刊刻之前,傅以礼所作题跋已引起了时人注意。如俞樾《茶香室三钞》就引用了傅氏题跋,该书“王冕事传闻之异”条

云:“傅节子跋云:‘意者冕为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从敌,文致其罪。’斯言得之矣。”^[11]俞樾所引实际上出自傅以礼的《保越录跋》。俞氏《茶香室三钞》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是时《华延年室题跋》尚未刊印,可见在《华延年室题跋》公开刊刻之前,其中的一些题跋已在学界传播。

3 《华延年室题跋》的缺陷

前辈学者对《华延年室题跋》的学术价值已多有肯定,此书若干论断也成为学界共识,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3.1 所收题跋并不齐全

俞人蔚在整理、刊印傅以礼题跋时,尚有部分题跋被遗漏,浙江图书馆就藏有5篇傅氏未刊题跋。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收入了傅以礼所作的《庄氏史案本末跋》,而此篇题跋《华延年室题跋》也未收入。

《华延年室题跋》未收的题跋还有《傅氏写本张忠烈全集题识》,民国时期,此篇题跋稿本曾藏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此外,该书所收题跋的撰著时间虽难以一一确认,但《明季稗史汇编跋》《华延年室金石拓本跋》《南渡录跋》《绍兴傅氏家谱跋》等近20篇系年可考的题跋均作于同治、光绪年间,这说明《华延年室题跋》所收题跋绝大多数是作于咸丰以后,而此前所作题跋则收入较少,可见漏收题跋不在少数。

3.2 所收题跋均无落款

此书所收170余篇题跋均无落款,但从此书漏收和已收题跋来看,都间接或直接证明傅以礼题跋稿本原有落款。从漏收题跋来看,宫云维《傅以礼未刊题跋辑释》^[12]一文收入了12篇浙江图书馆藏傅以礼题跋稿本,其中有5篇题跋为《华延年室题跋》所漏收,而浙江图书馆所藏的这5篇题跋稿本均有日期、撰者等落款信息。此书漏收的还有《傅氏写本张忠烈全集题识》,该篇题跋落款为“光绪甲申仲冬下浣,大兴傅以礼识于临漳行馆”^[13]。此外,《庄氏史案本末跋》亦为《华延年室题跋》所遗漏,而此篇题跋落款为“丙子重九节后二日,节叟又记”。

从《华延年室题跋》已收题跋来看,傅以礼题跋原稿也有落款。浙江图书馆所藏的12篇题跋稿本,其中7篇《华延年室题跋》也有收入,但《华延年室题跋》所收均无落款,而浙江图书馆所藏稿本则有落

款。崔富章所引用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跋》，题跋落款为“光绪乙未嘉平望日，大兴傅以礼节子谨识”^[14]，此篇题跋《华延年室题跋》虽有收入，但无落款，可见崔氏所引当另有所本。此外，《华延年室题跋》有一篇《掣经室经进书录跋》，这是傅以礼重编《掣经室经进书录》（又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时所作的序，但《华延年室题跋》所收的这篇题跋并无落款，实际上这篇题跋的落款为“时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六月朔，大兴傅以礼节子谨识”。

此类例证尚有不少，兹不赘举。《华延年室题跋》各篇落款之所以缺失，极可能是俞人蔚在整理、刊印此书的过程中将落款删去。由于题跋落款的缺失，导致题跋中涉及的一些史实难以得到确认，因此，《华延年室题跋》落款的缺失不仅损害了题跋自身的完整性，也损害了它的学术价值。

3.3 存在失考之处

尽管傅以礼精于考据，但此书亦有失考之处，如傅氏在《鲁春秋跋》指出郑成功沉鲁王于海之说来源于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并进一步指出《明史》沿袭其误，这点值得肯定。但傅氏说查继佐《鲁春秋》记鲁王朱以海去世的时间及地点可以订正歧说，实际却不然。1959年8月，金门出土的《皇明鲁王监国圹志》明确说：“王素有哮喘，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圹志》对鲁王朱以海的死因以及去世的时间、地点均有明确记载，足以订正查继佐《鲁春秋》之误。再如傅氏《江上遗闻跋》云：“记江阴城守者，此书（指《江上遗闻》）而外尚有韩菼、许重熙两《纪》，皆谓大兵围城者二十四万，战死七万有奇，其说殊不足信。考是时贝勒方征两浙，至城下者仅李成栋、刘良佐所统数千耳。迨秋后各兵四集，故一鼓而下。要之贝勒并未亲至江阴，其围城之兵，亦断不及所记十

分之二。”参加围城的清军人数，或可存疑，但傅以礼说参加围城的清军将领仅李成栋、刘良佐二人，此说有误。江阴之役期间，李成栋正奉命镇压侯峒曾等人领导的嘉定起义，根本无暇顾及江阴。而傅氏说“贝勒并未亲至江阴”，亦属失考，事实上，参加围城的清军将领除总兵刘良佐外，尚有恭顺王孔有德、贝勒博洛、贝勒尼堪等人^{[5]236-237}。

3.4 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

《华延年室题跋》存在常识性错误，如傅以礼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跋》说：“是编（即《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四十七年告成，由武英殿排印，通行即此聚珍本也”。此处存在两点错误：首先，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所完成的只是初稿，此后历有删补，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左右才定稿，并由武英殿刊刻；其次，武英殿刊刻之本是为武英殿本（即殿本），而非傅氏所说的聚珍排印本。此书也存在一些讹字，如书中将《续绥寇纪略》的作者叶梦珠误作“叶梦球”。再如《玉版十三行跋》（康熙中魏水村藏本）云：“余夙嗜是帖，咸丰己卯里居，尝得一乌金拓本。”查咸丰年间并无己卯年，只有乙卯年，可知“己卯”为“乙卯”之误，盖因“己”与“乙”形近而致误。这两处应该是《华延年室题跋》出版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讹。

4 结语

《华延年室题跋》是在傅以礼去世10年后，由俞人蔚等人整理、刊印，但那时傅氏手稿已有零落，且未经傅氏本人校勘、审定，因此存在所收题跋不全、题跋落款缺失以及失考等缺陷。尽管如此，此书的学术价值仍不可忽视，它对历史文献、南明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 ①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记傅士奎任德州知州七年，误。傅以礼《东魏高湛墓志铭跋》说：“道光丁酉，先大夫牧是州，历九载之久。”可知傅士奎任德州知州前后长达九年。
- ② 傅以礼《傅氏家训跋》说：“己酉春，伯兄宰陵邑。”可知傅以凝出任山东陵川县令是在道光二十九年春。

参考文献：

- [1] 傅以礼. 华延年室题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2] 绍兴县修志委员会. (民国) 绍兴县志资料[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83: 3025.

- [3] 李慈铭.越缙堂文集[M]//《续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5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5] 顾诚.南明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 [6] 萧穆.敬孚类稿:卷七[M].刻本.1906(清光绪三十二年).
- [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三[M].台北:学生书局,1964:94.
- [8] 柳亚子.怀旧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175-176.
- [9] 吴格.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M].睦骏,整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42.
- [10]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
- [11] 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九[M]//俞樾.茶香室丛钞: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1124.
- [12] 宫云维.傅以礼未刊题跋辑释[J].文献,2013(6):115-119.
- [13] 傅氏写本张忠烈全集题识[J].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季刊,1931(6).
- [14] 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文史知识,2007(12):44-49.

作者简介: 廖章荣(1992—),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历史文献研究。

收稿日期: 2017-07-31

(上接第86页)

谕。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的用意似乎可以推测,即倡导文治、嘉惠艺林、衡鉴千秋。尽管在实际编纂工作中出现了篡改、禁毁书籍的悲剧,但乾隆皇帝的修书本意以及文治功绩应值得肯定。

注释:

- ① 主要指从最早的圣谕来看,乾隆皇帝似乎并无编修《四库全书》的用意,只是为了“稽古右文”,推行文治,于是搜罗遗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后因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书,乾隆认为类书体例未允,应当“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加之进呈书目愈多,因而才产生了编修《四库全书》的想法。因此,参照二十则圣谕,可以了解乾隆皇帝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并愈加认识到这一文化工程的重要性。
- ② 浙本多出的三则圣谕对本文考察的重点影响较小,为了简省,故采用武英殿本。
- ③ 所谓“重要程度”,细言之,“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最为重要,“有裨实用”者次之,而历代名士文集则“均应概行查明”。
- ④ 此处所谓《四库全书总目》只是《永乐大典》所辑之书的目录,并不是最终编纂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
- ⑤ 圣谕与凡例的原文均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于表内恕不复注。

参考文献:

- [1] 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1.
- [2] 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二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285.
- [4]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5] 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一·选举一·学校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3114.
- [6] 清代实录馆.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五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552.
- [7] 清代实录馆.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五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905.

作者简介: 顾一凡(1994—),男,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目录学。

收稿日期: 2017-05-18

· 文献学研究 ·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调查与思考*

袁 硕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国家图书馆于2011年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为切入点对日本二战罪行档案文献进行征集、整理与编译。为深入推进该项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对各个大型档案馆及专业战争档案机构的调研工作已全面铺开。文章调查了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资料,对其相关档案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的征集获取、组织揭示以及推广利用工作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英国国家档案馆;日本二战罪行文献;乙级战犯;丙级战犯

中图分类号: G279.561

文献标识码: A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llections of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In 2011,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launched the “Minguo Documents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 and started to collect, collate and compile the records of Japanese war crimes take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work,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work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large archives and professional war archives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rchives, the collections of records of Japanese war crimes, especially the class B and C war criminals related war crimes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re scarce in domestic Japanese war crimes research fiel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collates and classifies the related records, content revelation, extens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cords of Japanese the records of Japanese war crimes war crimes.

Key words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ese war crimes; class B war criminals; class C war criminals

1 调查背景

日本二战罪行文献主要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所犯战争罪行相关的一系列审判文献档案,其类别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罪行调查资料、庭审记录、战犯名单及相关通信及会议记录。无论是作为抗日战争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一手资料,还是日本侵略战争罪

行的重要见证,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同时,我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中最大的受害国,更应该站在“为子孙后代保留关于本民族兴衰荣辱历史记忆^[1]”的高度,重视对相关罪行原始档案文献的征集、整理与利用,以史为鉴,以惠世人。

由于战火侵袭、证据保存意识淡薄等原因,战争罪行相关原始档案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国内日本战争罪行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为此,国家图书馆于2011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6KZD012)的成果之一。

年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史料为切入点，开始对日本相关战争罪行档案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征集与整理，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作为日本二战罪行档案相关工作的延续与深化，以国家图书馆为第一牵头单位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整理和数字化”与“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征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两个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已如期开展。此次调研工作正是后一项目的组成部分，其具体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各个大型档案馆及专业战争档案机构进行调查与研究，进一步挖掘、厘清日本二战罪行相关档案的分布、保存情况，并结合国内实际需求提出切实的征集方案。英国国家档案馆凭借其馆藏档案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成为首批调研对象之一。

英国国家档案馆因其悠久的历史、宏富的馆藏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型档案馆之一，其前身是英国公共档案馆，2003年4月改名为英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着自1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及许多重要部门的公共档案文件，馆藏量超过1 100万件。为了对如此浩瀚的馆藏进行有效的管理，英国国家档案馆采用了科学严格的分类体系，具体如下：部门代码（Department code），处于目录层级中的最高层，由档案被移交至国家档案馆保存前的所属政府部门决定，如藩政院代码为CO，FO代表外交部；其次是系列（Series），指基于档案常见功能或主题的主要分类；最后是卷宗（Piece），指一个有序的完整单元，可以是文件（file）、卷（volume）或箱文档（box of documents）等不同形式。三者合并成为固定形式的档案参考码（document reference），如档案WO 95/234，WO为部门代码，95为系列号，234为卷宗号。

作为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发起者、成员国，以及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代表国家之一，英国不仅直接参与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两大二战战争罪行审判，亦于1945年至1949年间在东南亚地区主导了一系列针对乙、丙级日本战犯的罪行审判，其中以纽伦堡审判等与英国更为切身相关的欧洲战场战争罪行档案为主。因此，在日本战争罪行相关馆藏的数量及丰富性上，相较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等档案机构略逊一筹，然而，英国国家档案馆相关主题馆藏中存在大量独特的资源，特别是关于乙、丙

级战犯罪行的相关调查及审判类档案。这些独特的档案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日军二战罪行相关档案进行调研，对相关档案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的征集获取、组织揭示以及推广利用工作进行了思考。

2 调查方法

对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日本二战罪行相关档案的调研，主要通过其官网在线馆藏目录“探索”（Discovery）展开。具体方法为根据前期调研对档案所属部门进行限定，并对时间范围限定为1940—1960，然后检索关键词“Japanese War Crimes” or “War Crimes”，根据检索结果的内容描述进行筛选，共获得日本二战战争罪行直接或间接^①档案702种。按照档案馆的分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战争罪行调查及审判相关的档案最主要收录于外交档案（FO）和陆军部档案（WO）的特定系列中。此次调研主要以联合国^②战争罪行委员会和东南亚联合陆军部队的战争罪行调查、审判资料为重点目标，辅以及其他类目下的相关罪行档案。

3 馆藏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种类及数量

3.1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战争罪行相关档案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相关档案主要保存于联合国档案与记录管理部。但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国及主要发起国，英国国家档案馆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相关特色档案馆藏。通过在线目录检索到相关档案共68种。该类档案均未数字化，需预定副本或到馆使用。其中，涉及日本二战罪行的文献类别包括：

（1）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一般性通信、报告及通告等系列文件。主要来自于TS 26中主题为1943年至1946年间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记录，如卷宗67至68“委员会会议记录”，卷宗78“审判及司法报告”等，共15种。

（2）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战争罪行调查文件及战犯名单。主要来自于FO 371中主题为“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建立与工作”的相关卷宗，包括卷宗51 009至51 042中由委员会于1945年开列的近万页的

战犯名单,卷宗51 571至51 573中的战犯新闻摘要及战犯字顺索引以及卷宗30 922中的战争罪行调查文件。其他相关主题文献还包括WO 106卷宗4 973“关于战争罪行的调查”,WO 229卷宗1/13“战争罪行”以及WO 361卷宗1 712中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的战犯名单、证人材料及关押于澳大利亚的日本战犯名单,共44种。

(3)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程序、政策性文件。此主题相关文献分布相对分散,包括财政部创建的T 220卷宗19“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注册文件”,大法官办公厅创建的LCO 2中卷宗2 977“对投降战犯及其他战犯的协定草案”,WO 310卷宗179“战犯移交政策”等,共9种。

3.2 英国主导东南亚地区二战罪行调查及审判相关档案

同盟国于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对日本所犯战争罪行进行调查与审判。1945年至1956年间,包括著名的东京审判在内,美、中、英、法、荷、澳、菲在亚洲设立的51个对日法庭的审判,加上苏联伯力审判以及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对日审判,同盟国对日战犯审判共涉及10余个国家、45个城市、54个

军事法庭。其中,英国先后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4国11地设立战争罪行法庭,主导了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并最终处决223人。此类档案文献资料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数量较多,根据检索获得日本战犯审判文献共536种。主要来源介绍参见表1。

其内容分类主要包括:

(1) 日军在亚洲地区二战罪行调查文档。主要来自东南亚联合陆军部队所创建的由该机构于1941年至1949年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对日战争罪行调查171种,记录于WO 325。调查通过照片、清单、记录及报告等形式,详尽记录了大量日军在东南亚地区虐待、杀害平民及战俘等战争罪行的相关证据档案,如与“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远东地区三大战争罪行的“泰缅铁路”及“巴丹死亡行军”惨案,在港大规模杀害英军伤员的“圣士提反惨案”以及在大屿山杀害平民的银矿湾惨案等案例的相关罪行记录。

(2) 英国主导东南亚地区军事法庭中的战争罪行审判庭审记录。由军法总署创建,记录于WO 235中的卷宗813至1 117,共305种。内容包括诉讼记录、控方和辩方的总结以及当庭展示的照片和地图等,涉及

表 1 英国主导东南亚地区战争罪行调查及审判相关档案主要来源

序号	档案参考码	档案总标题	日期	档案内容描述	文件数量	获取方式
1	WO 203	陆军部东南亚司令部——军事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法总署军事副部长及陆军部,部队法律及人员服务总署,战争罪行文件	1932年至1949年	大多为战斗指令,还包括行动和情报报告;计划组成员相关文件;装甲战车、炮兵,化学战、信号、装备和服装的运行研究报告;组织机构事宜;民政事务战俘(盟军和敌人)和战争罪,远东地区陆军调查团的报告。	16	未数字化 需预定副本 或到馆使用
2	WO 311	陆军部,部队法律及人员服务总署,战争罪行文件	1939年至1953年	大部分内容是军法总署对二战期间所有战区中的战犯的调查和起诉文档,也包括部队法律及人员服务总署有关战争罪行的文档,政策、案件和程序性文件等内容。	15	未数字化 需预定副本 或到馆使用
3	WO 325	陆军部军事总部,东南亚联合陆军部队战争罪行调查团文档	1941年至1949年	军事总部,东南亚联合陆军部队战争罪行调查团开展的关于日军在二战中所犯下战争罪行的调查文档,其内容是关于战俘营的事件和状况调查,不含战争罪行案例文件。	171	未数字化 需预定副本 或到馆使用
4	WO 356	军法总署军事副部长及陆军部,战争罪行卡片索引(东南亚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至1957年	包括5个独立的二战期间东南亚地区战争罪行的卡片索引,每个索引都包括与WO 311中日本战犯的相关档案参考,具体为:索引1(卷宗1-8)为犯人(P)、制定证人(W)及被告(A),包括日籍和非日籍嫌犯;索引2(卷宗9)为已死亡受害者(DV),主要指军事人员;索引3(卷宗10-21)战争罪行发生营地的军事人员中的证人(W);索引4(卷宗22)营地和位置,营地标识代码;索引5(卷宗23-24)用于识别日军的昵称,与索引1中的名称相互参照。其中,J(日军),JC(日军营地),JM(日军屠杀或谋杀)和JT(日军流放犯)。	24	仅有数字化格式,注册用户可在线免费下载
5	WO 357	陆军部,东南亚指挥部下属战争罪行分支调查机构:记录卡片	1945年至1948年	东南亚指挥部下属战争罪行分支调查机构展开的战争罪行调查和起诉过程的记录卡片集合,覆盖主题包括远东战争罪行,证据评估,嫌犯的处置,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判决细节与被判人员服刑记录。卡片包括受审、被判决及入狱的日军姓名,也包括因死亡而无法受审的日军姓名,卷宗3还包括了澳大利亚的案件。	5	仅有缩微格式,注册用户可在线免费下载
6	WO 235/813-1117	军法总署:二战战争罪行案例文件	1945年至1949年	该系列包括二战后英国在欧洲及远东地区设立的关于战争罪行审判的军事法庭中的受审人员个案记录,其中远东地区档案编号为卷宗813至1117。内容包括诉讼记录,控方和辩方的总结以及当庭展示的照片和地图等。	305	未数字化 需预定副本 或到馆使用

新加坡、科伦坡、仰光及中国香港等多个审判地，囊括了数百名受审的日本战犯。档案文献以审判地和受审日军战犯姓名为标题，便于检索及查阅。

(3) 东南亚地区战争罪行卡片索引。包括由军法总署军事副部及陆军部创建，记录于档案WO 356的1940年至1957年的记录相关被告、犯人、证人、营地位置及战犯昵称的24种卡片档案，也包括记录于档案WO 357的1945年至1948年关于审判过程、结果等相关内容的5种卡片档案，共29种。

(4) 其他东南亚地区战争罪行调查及审判相关文件。散布于WO 203和WO 311档案系列。内容包括新加坡、缅甸等地的各种对日军战争罪行的宣誓证词书，日本战犯的身份识别，日军主要战犯的罪行审判，战俘营士兵的调查问卷，关于战争罪行的调查及战犯审判的政策文件等，共计31种。

3.3 其他日本二战罪行相关档案

初步调研中还发现其他日本二战罪行相关档案共98种。其中主要来自于FO 371中“关于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法庭”专题档案，内容涉及远东军事法庭的设立、日本战犯名单、在和平条约框架下关于战犯问题的讨论、对于日本政府的索赔声明等。其余档案则零散分散在由大法官办公厅、内阁、财政部、首都警局、陆军部等多个不同部门创建的档案专题中。国内对于日本乙、丙级战犯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对于英国主导的日本二战罪行审判研究几乎更是一片空白，因此，该档案资料具有珍贵且独特的史料价值。

4 对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相关工作的思考

4.1 征集与获取

日本二战相关文献作为档案资源，在征集与获取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文献采访流程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档案流转历史悠久，分布情况复杂多样，内容揭示程度深浅不一，基本均未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整合，从而缺乏完整详尽的资源清单。因此，必须在掌握相关文献背景信息，并经过对档案内容的实际确认后方可作出决策，这也必然会导致数倍于常规性文献采访的时间及财政保障。方新德^[2]、陈谦平^[3]等学者曾在相关论文中，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征集的工作流程有所述及，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其次，档案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源，具有唯一性，通常也未经正式出

版发行，故对档案的获取主要指对档案复件的获取。本文所涉及的日本二战罪行相关档案几乎均未进行数字化。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政策，需提前预约原件并限定在馆区范围内使用或是在符合目标档案版权规定的情况下，申请购买档案的复件。

总体而言，规模化的档案征集工作本质上是在对目标档案馆藏情况、文献价值、用户需求等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征集渠道的定制化采访。这一过程对相关采访人员的学术素养、对外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知识组织能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由此可见，除了图书馆界自身的必要工作外，也需要学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通过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形成强有力的工作团队，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推进相关罪行档案的征集回归。

4.2 组织和揭示

从资源组织与揭示的角度来看，档案文献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并不适用于传统的编目模式。这主要是由于档案文献涵盖文档、照片、地图、缩微以及电子等多种数据类型，难以统一。同时，档案内容涉及主题庞杂，采取传统著录方式难以对档案资源进行充分的辨别与揭示，并可能造成资源管理的混乱，也势必将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因此，对于印刷型文献、缩微制品等传统资源，应采用与馆藏中其他资源相同的信息组织方法，但是要特别强化分析著录的功能。例如，档案类的缩微文献往往是多个文件的汇编。传统编目是以载体表现为编制书目记录的基础，即揭示仅到文献层，但是缩微制品中的每个文件才是用户感兴趣的目标，故对于该类文献，要强化分析著录，将汇编中的独立资源析出，为其建立检索点，细化描述的颗粒度，加强内容识别；相关档案之间还应增加关系揭示，以使用户快速地由此及彼，形成信息群。对于照片、数字文件等新型资源，由于这些资源的数量庞大，信息源复杂，利用方式与传统资源存在较大差异，不宜采用与传统资源相同的信息组织方法，而应更多的因地制宜，追求资源揭示的效率，采用DC等元数据方案加以组织，并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发布。国家图书馆在对日本二战罪行文献中征集所得的东京审判、马尼拉审判的照片档案的资源组织及揭示工作中，正是遵循上述思路，制定了相应的元数据字段类型及内容标准，并以在线数据库的形式整合发布，相较于传统方式，更为清晰明了且便于使用。

4.3 推广及利用

无论是档案的征集回归,还是对其进行的组织揭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史料价值与社会教育价值,利用和服务才是这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将这些档案资料结集出版是提供利用最常见的形式。目前,国家图书馆在对所征集资料的整理与发布上已取得了不少成果。2013年9月,国家图书馆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影印出版了80册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12月又推出了50册日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并据此建立“东京审判资源库”,全方位揭示对日战犯审判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随着《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全53册)、《横滨审判文献汇编》(全105册)、《丸之内审判文献汇编》(全18册)以及《伯力审判庭审记录》(全5册)的陆续整理出版,对于日本战犯审判文献的整理、回归、出版的系统性成果日趋丰富。但是,这一途径主要面向相关学界等专业受众群体,其作用更多还是体现在提高档案资源在学术研究中的利用率和便捷程度上。而对于档案在大规模宣传、推广工作中的价值挖掘上,还需深入思考,以创新而又“接地气”的思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实现档案的社会教育功能。例如,围绕抗战、反法西斯等相关主题活动,举办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专题展览。2013年,国家图书馆曾举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展览,吸引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伴随着技术

的飞速发展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日趋完善,未来的展览形式也必将更为现代、新颖,如在展览中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体验式展览”的形式模拟庭审现场,使参观者能够最大程度地身临其境,亲历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除此之外,通过网络平台等多种数字化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也是未来档案宣传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方向。实际上,国家图书馆为此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自2015年12月开始,国家图书馆推出了在线专题,在对“日本战犯审判”史料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严谨考证、筛选、翻译与编辑的基础上,以“每日一则”的形式通过官网主页、微博、微信等多种数字平台进行宣导,目前已完成510条日本战争罪行审判史料的发布^[4],在加强公众对于抗战历史的认知、树立民众正确的价值导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结语

英国将档案视为人们集体记忆的家园,认为档案使人们理解过去与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指导与帮助^[5]。日本二战罪行档案不仅是相关学界所亟需的独特文献史料,也是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教育资源,特别是在近年来日本右翼思潮日渐涌动之际,更需要“以史为鉴”,绝不能“缄默不言”,加大对档案资源的挖掘与揭示,扩大对历史真相的宣传与教育。

注释:

- ① 根据在线档案数据揭示程度,无法对档案内容进行确切判断。
- ② 联合国在此指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非1945年成立的正式国际组织“联合国”。

参考文献:

- [1] 雷亮.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二战罪行文献档案馆藏情况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2):38-42.
- [2] 方新德.英国国家档案馆见闻[J].浙江档案,2014(3):26-30.
- [3] 陈谦平.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史料概述[J].民国档案,1993(1):58-65.
- [4] 日本战争罪行审判史料编译[EB/OL].[2017-05-04].<http://www.nlc.cn/zxxz/wqhg/wqhg2017/zl/>.
- [5]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5-16[EB/OL].[2017-04-08].<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ocuments/annual-report-and-accounts-2015-2016.pdf>.

作者简介:袁硕(1988—),男,国家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与信息组织、文献资源建设、文献标引与编目。

收稿日期:2017-07-20